

- 1 作为语言学问题的失语症
- 2 语言的两面性
- 3 相似性紊乱
- 4 临近性紊乱
- 5 隐喻和转喻的两极

### 作为语言学问题的失语症

如果失语症是一种语言障碍——正如这个术语本身所暗示的那样——那么对失语症状的任何描述和分类都必须始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不同种类的失语紊乱中，语言的哪些方面受到了损害？休林斯·杰克逊很久以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熟悉语言构成和运作的专业语言学家的参与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充分研究交流中的任何断裂，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已经停止运作的特定交流模式的性质和结构。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的各个方面——运行中的语言、流动中的语言、萌芽中的语言和消亡中的语言。

有些精神病理学家高度重视在对语言障碍的研究中所涉及到的语言学问题，一些关于失语症的优秀论文已经提到了这些问题。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坚持语言学家对失语症研究的贡献的合理主张仍在被忽视。例如，有一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了错综复杂的婴儿失语症问题，并且呼吁协调不同学科，呼吁与耳鼻喉科医师、儿科医生、听力学家、精神病学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合作。但是语言科学在这种沉默中被忽略了，好像言语感知紊乱与语言毫无关系一样。它的作者是西北大学儿童听力和失语症诊所的主任，该诊所的语言学家维尔纳·F·利奥波德是美国迄今为止水平最高的儿童语言专家。

对失语症的联合研究迟迟未能进行，语言学家也应对此负责。在失语症方面，没有任何研究可以与对各国婴儿细致的语言观察相媲美。也没有人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各种类型的失语症临床资料进行再阐释以及系统化。在一方面，结构语言学的惊人发展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用语退行的有效工具和方法，以及另一方面，用语样式的失语式解体可能为语言学家提供对语言普遍法则的新见解。

将纯粹的语言学标准应用于失语事实的解释和分类可以极大地促进语言和语言障碍的科学，当然这样的前提是语言学家在处理心理和神经科学的数据时要像他们在自己的传统领域一样小心谨慎。首先，他们应该熟悉医学用以描述失语症的技术术语和以及针对失语症的专业手段，然后，他们必须提交临床病例报告并进行语言学的分析。此外，他们自己也应该与失语者一同工作，以便直接接触病例，而不是仅仅去再阐释已有的记录，因为这些记录有着不同的构思和阐述。

在失语现象的一个层面上，精神科医生和语言学家之间达成了惊人的共识，即声音样式的解体。这种解体表现出极有规律的时间次序。失语退行被证明是儿童学习语音的一面镜子：它呈现出了与儿童的发展相反的方向。此外，通过对儿童语言与失语症的对比，我们可以建立一些含义的法则。对这种获得和损失的次序以及其所蕴涵的一般规律的探索不能局限于音位样式，而必须要扩展到语法系统。在这方面人们只作了几次初步尝试，这些努力值得继续下去。

### 语言的两面性

言语意味着对某些语言实体的选择，并将它们组合成具有更高复杂性的语言单体。在词汇层面，这一点很明显：说话者根据所使用语言的句法系统来选择词语并将它们组合成句子，句子反过来被组合成言辞。但是说话者在选择词语时绝不是完全自由的：他的选择（除非是真正的新词新意）必须从他和受话者共同拥有的词汇库中进行。当通信工程师假设说话者和受话者可以使用的最佳信息交换时，他最恰当地接近了言语事件的本质：说话者和受话者拥有或多或少相同的“‘预制’表征档案橱”：语音消息的发送者从这些“预先设想的可能性”中选择一个，而接收者应该从同样的“已经预见和提供的可能的”组合中做出相同的选择。因此，言语活动的效率要求使得参与者使用共同的语码。

猫说：“你说的是 pig 还是 fig？”，爱丽丝回答说：“我说的是 pig”。在这种奇特的言辞中，猫试图重新捕捉受话者的语言选择。在猫和爱丽丝的共同语码（英语口语）中，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停顿和连续之间的差异可能会改变消息的含义。爱丽丝使用了有明显停顿与连续的特征，否定了后者而选择了前者。并且在同一次言说行为中，她将这个解决方案与某些其他同时发生的特征结合起来，利用/p/的重度和紧度，与/t/的尖锐以及/b/的松弛形成对比。因此，所有这些属性都被组合成一组独特的特征，即所谓的音素。音素/p/之后是音素/i/和/g/，这两个音素同时产生不同的特征。因此，同时并发的实体与依次串行的实体是我们说话者组合语言成分的两种方式。

像/p/或/f/这样的束，或者像/pig/或/fig/这样的束列，都不是使用它们的人发明的。停顿与连续不能同时出现，音素/p/也不能脱离语境而出现。停顿特征与某些其他并发的特征结合出现，这些特征组合成音素（如/p/，/b/，/t/，/d/，/k/，/g/等等）。受到给定语言语码的限制。语码对音素/p/与其他后面和/或前面的音素的可能组合设定了限制；在特定语言的词汇库中，被实际使用的只有部分被允许的音素序列。即使理论上可能存在其他音素组合，说话者通常也只是词语的使用者，而不是词语的创造者。在面对单个词语时，我们希望它们是被编码了的单体。为了掌握“nylon”这个词，人们必须知道在现代英语的词汇语码中分配给这个词的含义。

在任何语言中都存在被称为短语的被编码了的词组。习语“how do you do”的含义不能通过把它的词汇成分的意思组合在一起得到，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在这方面表现得像单个词语的词组虽然常见但仍然只是边缘情况。我们只需要熟悉词语成分及其组合的句法规则，就能理解绝大多数词组。在这些限制范围内，我们可以自由地将词语置于新的语境中。当然，这种自由是相对的，当下的陈词滥调对我们选择组合的压力是相当大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它们发生的统计学概率相对较低，但组成全新语境的自由是不可否认的。

因此，在语言单体的组合中，自由度是呈上升趋势的。在将不同的特征组合成音素时，个体说话者的自由为零，语码已经确定了在给定的语言中可以利用的所有可能性。把音素组合成词语的自由受到限制，它仅限于造词这种边缘情况。在用词语造句时，说话者受到的约束更少。最后，在将句子组合成言辞的过程中，强制的句法规则的作用停止了，任何个体说话者创造新语境的自由也大大增加了，尽管无数刻板的言辞仍不容忽视。

任何语言符号都涉及两种排列方式：

①组合：任何符号都由其他符号成分组成和/或仅在与其他符号的组合中出现。这意味着任何语言单体都同时作为更简单的单体的语境和/或在更复杂的语言单体中找到自己的语境。因此，任何语言单体的实际分组都将它们绑定到一个更高等级的单体上：组合和组织是同一操作的两个方面。

②选择：在选项之间的选择意味着以其中一种替换另一种的可能性，它在某一方面等效而在另一方面不同。实际上，选择和替换是同一个操作的两个方面。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清楚地认识到这两种操作在语言中所起的基本作用。然而，在组合的两种变体——并发和串行——之中，只有后者，即时间顺序，被这位日内瓦语言学家承认。尽管他自己认为音素是一组并发的显著特征（音素的微分元素），但这位学者还是屈服于语

言的线性特征的传统观念，“这排除了两个元素同时发音的可能性”。为了界定我们所描述过的组合和选择这两种排列模式，德·索绪尔指出前者“在当前：它基于两个或多个连带的出现于实际序列中的项”；而后者“将缺位的项连接为虚拟助记符序列的成员”。也就是说，选择（以及相应的替换）处理的是在语码中被联结了的实体，而不是在给定的消息中被给予的实体；而在组合的情况下，实体在两者间相互或仅仅在实际的消息中被联结。听话者认为被给定的言辞（消息）是从所有可能成分（语码）的存储库中选择的组成成分（句子、词语、音素）的组合。语境的组成成分处于临近状态，而在选择集中，符号则通过不同程度的相似性联系在一起，这些相似在同义词的等价性和反义词的同心性之间波动。

这两个操作为每个语言符号提供了两组释义，用以应用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引入的有效概念：有两种用以解释符号的基准——一种是语码，另一种是语境。无论是被编码了的还是尚且自由的，在这两种方式中的每一种中，通过前者中的更迭和后者中的排列，符号都与另一组语言符号相关。一个给定的意义单元可以被同一语码的其他更明确的符号所替代，从而揭示其一般意义，而其语境意义则由它与同一序列中其他符号的联系所决定

任何消息的组成部分都必然通过一个内部关系与语码相关联，并通过一个外部关系与消息相关联。语言在其各个方面都涉及关系的不同模式。无论是消息的交换，还是从说话者到听话者的单向交流，为了保证消息的传递，在任何言语事件的参与者之间都必须有某种邻接性。说话者和听话者在空间、时间上的分离，是由一种内在关系桥接起来的：说话者使用的象征与听话者对其的认知和释义之间必须存在某种确定的等价关系。没有这样的对等，消息就没有结果：即使到达听话者那里，也不会影响到他。

### 相似性紊乱

显然，言语障碍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个体对语言单体的组合和选择的能力，而且事实上，在描述、分析和分类不同形式的失语症时，这两种操作中哪一种主要受损的问题被证明具有深远的意义。这种两分法也许比传统的说明语言交换中的两种功能——语音消息的编码或解码——中哪一种格外受到了影响的发送型失语症和接收型失语症的区分更具有启发性。

海德试图将失语症归进特定的类别，并且给每一种类型的失语症“选择一个名称，以表示在词语和短语的管理和理解方面最突出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我们区分了两种基本类型的失语症——具体取决于主要缺陷在于选择和替换上，而组合和组织相对安定；还是相反，主要在组合和组织中，而选择和替换相对正常。在概述这两种相反的失语症样式时，我将主要利用戈德斯坦的资料。

对于第一类失语症（选择缺陷）来说，语境是不可或缺且决定性的因素。当这样的患者看到一些词语或句子的片段时，很容易配齐它们。他的言语只是被动的：他很容易参与交谈，但在发起对话上存在困难。当他是或想象自己是消息的听话者时，他能够回应真实的或想象的说话者。像独白这样的封闭式话语，他尤其难以完成，甚至难以理解。他的言辞越依赖于语境，他就越能更好地应对他的语音任务。他感到无法说出一个既不是给对话者的回应也不是回应实际情况的句子。除非说话的人看到确实在下雨，否则“下雨了”这个句子是不会产生的。言辞在语音或非语音的环境中嵌入得越深，这类患者成功表达的机会就越大。

同样，一个词越依赖于同一句子中的其他词，越依赖于句法语境，受言语障碍的影响就越小。因此，在句法上从属于语法协议或体制的词更加顽固，而句子的主要从属代理，即主语，往往被省略。只要患者的主要困难位于起始部分，那么很明显，他恰恰在作为句型的基石的起始处失败了。在这种类型的语言障碍中，句子被设想为是由——如果是想象的，失语者自己，或如果不是想象的，他谈话中的其他同伴——所提供先行说的句子中被省略部分的续篇。关键词可能会被抽象的回指替代物所放弃或替换。正如弗洛伊德所注意到的，一个特定的名词会被一个非常普遍的名词所取代，例如法语失语者说话时所选择的“machin”或

“chose”。在戈德斯坦所观察到的“遗忘型失语症”的德语方言样本中，“ding”或“stückel”被替换为所有无生命的名词，而“überfabren”被替换为从语境或情境中可以识别的动词，因此对患者来说似乎是多余的。

与语境有内在联系的词，如代词和代副词，以及仅用于构建语境的词，如连词和助动词，尤其容易留存下来。由昆塞尔记录并由戈德斯坦引用的一位德国病人的一个典型言辞可以作为例证：

Ich bin doch hier unten, na wenn ich gewesen bin ich weess nicht, we das, nu wenn ich, ob das nun doch, noch, ja was. Sie her, wenn ich, och ich weess nicht, we das hier war ja...

因此，在这类失语症的临界阶段，只有框架，即交流的连接环节没有受到影响。

在自中世纪早期以来语言理论中，就一再断言语境之外的词是没有意义的。然而，这种说法的有效性仅限于失语症，或者更确切地说，仅限于一种失语症。在对病理案例的讨论中，一个孤立的词实际上仅表示“胡扯”。正如无数的测试已经揭示的，对于这些病人来说，同一个词语在两种不同的语境中出现仅仅是同音异义。由于不同的词比同音异义词携带更大量的消息，一些这类失语者倾向于用不同的术语取代一个词的语境变体，每个术语都针对给定的环境。因此，戈德斯坦的病人从来没有单独说过“刀”这个词，而是根据它的用途和环境，交替地称其为“铅笔刀”、“苹果刀”、“面包刀”、“刀叉”。所以“刀”这个词从一种可以单独出现的自由形式，变成了一种束缚形式。

戈德斯坦的病人说：“很棒的公寓、门厅、卧室、厨房，还有公寓，只是在后面住着单身汉。”“未婚男人”这个词可以被替换成“单身汉”这个更明确的形式，但这个通用项是由说话者选择的。当被反复询问什么是单身汉时，这位病人没有回答，而且“显然处于困境”。像“单身汉是未婚男人”或“未婚男人是单身汉”这样的回答会呈现出一个等式性判断，从而从英语的词汇语码中将一个替换集投射到给定的消息的语境中。等价的措辞成为句子中相互关联的两个部分，并因此临近性而被连结。当关于“单身公寓”的习惯性对话的语境的支持“单身汉”这个适当的言辞时，患者可以选择它，但无法使用“单身汉=未婚男子”这个替代集作为句子的主题，因为自主选择 and 替换的能力受到了影响。病人徒劳地要求等号句只携带了这样的信息：“单身汉的意思是未婚男子”或“未婚男子被称为单身汉”。

当患者被要求说出检查者指向或处理的对象的名字时，也会出现同样的困难。有替换缺陷的失语者不会以所指对象的名称来补充考官的指点或处理手势。他不会说“这（叫）铅笔”，而只会添加一个关于它的用法的省略注：“用来写”。如果存在一个同义的符号（例如，词语“单身汉”或指向铅笔），则另一个符号（例如短语“单身男人”或“铅笔”一词）就变成多余且因此不必要的。对于失语者来说，这两种符号的是互相补足的：如果一个词是由检查者做出的，患者会避免它的同义词：“我都明白”或“我已经知道了”将是他的典型反应。同样，一个对象的图像会导致其名称被抑制：词语符号被图像符号所取代。当有人把指南针的照片拿给罗特玛的一位病人看时，他回答说：“是的，这是一个……我知道它属于什么，但我想不起具体的表达方式了……方向……为了指示方向……一块磁石指向北方。”正如尔斯所说，这样的病人无法从索引或图标转换到相应的语音象征。

即使是简单地重复检查员所说的词语，在患者看来也是不必要的冗余，尽管收到了指示，他也无法重复。被要求重复“不”这个词：海德的病人回答说“不，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虽然在他的回答的语境中自发地使用这个词（“不，我不……”），但他无法生产最纯粹形式的等式性判断，即重言式“ $a = a$ ”： $/no/$ 是 $/no/$ 。

符号逻辑对语言科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它强调对象语言和元语言之间的区别。正如卡尔纳普所说，“为了谈论任何对象语言，我们需要一种元语言。”在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层级上，可以使用相同的语系。因此，我们可以用（作为元语言的）英语谈论（作为对象语言的）英语，并通过英语同义词、迂回和释义来解释英语词语和句子。显然，这种被逻辑学家贴上元

语言标签的操作并不是他们的发明：它们远非局限于科学领域，而是我们习惯语言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话的参与者经常会检查他们是否在使用相同的语码。说话者问：“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或者听者自己插嘴说“你是什么意思？”然后，通过用来自同一语言的一个或一组语码的另一个符号替换有问题的符号，消息的说话者试图让解码人更容易理解它。

通过同一种语言的另一种在某些方面同质的符号来解释一个语言符号是一种元语言操作，它在儿童的语言学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观察表明，元语言在学龄前儿童的言辞行为中占有相当大的地位。无论是语言的习得还是语言的正常运作，元语言都是必要的。“命名能力”的失语缺陷恰恰正是元语言的缺失。事实上，上面提到的病人徒劳地寻找的等式性判断的例子是指英语的元语言命题。它们的明确说法是：“在我们使用的语码中，所指示对象的名称是铅笔”，或“在我们使用的语码中，‘单身汉’这个词和迂回的‘未婚男人’是等价的。”

这样的失语者既不能从一个词转换到它的同义词或迂回词，也不能从它的同形异音异义词，即其他语言中的等价表达。双语能力的丧失和局限于单一语言的单一方言变种是这种紊乱的表现症状。

根据一种古老但反复出现的偏见，一个人在特定时间的说话方式——常被称为个人习语——被视为唯一具体的语言现实。在一次对这一概念的讨论中，以下反对意见被提出：

每个人在与另一个人说话时，都会有意或无意地试图找到一种普遍的词汇：要么是为了取悦他人，要么只是为了被理解，或最终是为了让对方明白，他会使用对方的术语。语言中没有私有财产：一切都是社会化的。语音交流，和任何形式的交流一样，需要至少两个交流者，而个人语言被证明是一种反常的虚构。

然而，这种说法有一点需要保留：对于一个失去了语码转换能力的失语者来说，“个人语言”确实成为了唯一的语言现实。只要他不把他人的言语看作是用他自己的语音样式传达给他的消息，他就觉得——就像亨菲尔和斯坦格爾的一位病人所表达的那样——“我听得清清楚楚，但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听到你的声音，却听不到你的词语……它不发音。”他认为对方的言辞是胡言乱语，要么至少是用一种未知的语言。

如上所述，是临近性的外部关系将语境的成分整合起来，而相似性的内部关系则是替换集的基础。因此，对于替换能力受损但组织能力完好的失语者来说，涉及相似性的操作会产生这些基于临近性的操作。可以预测，在这些条件下，任何语义分组都将由空间或时间临近性而不是相似性来指导。实际上，戈德斯坦的实验证实了这一预期：这一类型的女性患者当被要求列出一些动物的名字时，她们会按照在动物园里看到她们的顺序来排序。同样，尽管有指示要根据颜色、大小和形状来排列某些物品，她还是根据它们的空间临近性将它们分类为家居用品、办公材料等，并通过参考展示橱窗来证明这种分组的合理性，其中“事物是什么并不重要”，即它们不必相似。同一位患者愿意命名主要原色——红色、黄色、绿色和蓝色——的名字，但拒绝将这些名称扩展到过渡色，因为对她来说，词语没有能力通过与原色的相似程度来承担额外的、转移的意义。

我们必须同意戈德斯坦的观察，即这类患者“按字面意思掌握了词语，但无法理解相同词语的隐喻特征”。然而，如果认为比喻性的言语对他们来说完全无法理解，那将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概括。在言语的隐喻和转喻这两个极端的修辞格中，后者以临近性为基础，且被选择能力受到影响的失语者广泛使用。叉子代替刀子、桌子代替灯、烟代替烟斗、吃代替吐司炉。海德报道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当他记不起‘黑色’的名字时，他将其描述为‘你为死者做的’，缩写为‘死’”。这种转喻的特征可以被描述为是由习惯语境向替换和选择轴上的投射：通常与另一个符号（刀）一起出现的符号（叉）可以用来代替这个符号。诸如“刀叉”、“台灯”、“抽烟斗”这样的短语产生了对“叉子”、“桌子”、“抽烟”的转喻。一个对象（吐司）与其生产方式之间产生了对“吃”向“吐司炉”的转喻。“什么时候穿黑色？”

——“哀悼死者时”：用颜色的传统用途来代替它的名字。在戈德斯坦的病人身上，从相同到临近的转变表现得尤为突出，当被要求重复一个给定的词语时，他会用转喻来回答，比如，他会说“玻璃”代表“窗户”，“天堂”代表“上帝”。

当选择能力严重受损，而组合能力至少部分地得到保留时，临近性决定了患者的整个言语行为，我们可以将这种类型称为相似性紊乱的失语症。

### 临近性紊乱

从 1864 年起，休林斯·杰克逊在其对现代语言和语言障碍研究的先驱性贡献中一再指出：仅仅说言语是由词语组成是不够的。它是由以特定方式相互指代的词语组成的。而且，如果其各部分之间没有适当的相互关系，语音言辞将只是一连串不包含任何命题的名称。

言语的丧失是失去提出命题的能力……无言并不全意味着无词。

命题能力或将更简单的语言实体组合成更复杂的单元的能力受损的这种情况实际上仅限于一种与上一节中讨论的失语症类型相反类型的失语症。这并不是无词，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保留的实体是词语，它可以被定义为被强制编码的语言单体中最高级的——我们用语码提供的词库组成自己的句子和言辞。

这种可称为临近性紊乱的组织缺陷型失语症，可以使得句子的范围和种类减少。将词语组织成更高单体的句法规则丢失的这种缺失被称为语法缺失，其会导致句子退化成——用杰克逊的形象来说——只是一个“词堆”。语序变得混乱，语法上的协调和从属关系——无论是一致性还是统一性——都被打破了。正如所料，首先消失的是具有纯语法功能的词语，如连词、介词、代词和冠词，这导致了所谓的“电报风格”，而在相似性紊乱的情况下，它们是最有抵抗力的。在临近性紊乱的失语者的言语中，在语法上对语境的依赖越小的词的韧性越强，而在相似性紊乱的患者中，这个词越早被抛弃。因此，在相似性紊乱的情况下，“核心主词”是第一个从句子中消失的，相反，它在相反类型的失语症中是最不容易破坏的。

影响组织能力的失语症类型往往会导致婴儿式的单句言辞和单词句。只有一些更长的、刻板的、现成的句子能够被留存下来。在这种疾病的晚期病例中，每个言辞都被缩减为词语句。即使组织受到障碍，选择运作依然继续进行。杰克逊指出：“说出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说出它是什么样子。”被限制在替换集中（组织能力缺陷）的患者处理相似性问题时，他的近似认同具有隐喻性质，这与在相反类型的失语者所熟悉的转喻性认同相反。用“望远镜”来表示“显微镜”或者用“火”来表示“煤气灯”都是类似的隐喻表达的典型例子。因为它们与修辞或诗意的隐喻不同，它们没有有意的意义转移，所以杰克逊将它们称为一种准-隐喻性表达。

在正常的语言样式中，词语和句子都同时是叠加语境的组成部分和一个叠加在更小的成分——音素和语素（赋予意义的最小单体）——上的语境。我们已经讨论了临近性紊乱对词语向更高单体的组合的影响。虽然是以某种不同的方式，但这个词和它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同样的缺陷。语法缺失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对词形变化的废除：用不定式等无标记的范畴来代替各种有限的语音形式。在词形变化的语言中，用主格代替所有的间接格。这些缺陷部分是由于体制或同一性的消失，部分是由于丧失了将词语分解为词干和词意的能力的消失。最后，一个范例（特别是一组语法案例，如 *he-his-him* 或时态，如 *he votes-he votes*）从不同的视角通过临近性相互关联，呈现相同的语义内容。因此，对于临近性紊乱的失语者来说，有一个动力来排除这些组合。

同样，从同一个词根衍生出来的词语，如 *grant-grantor-grantee*，在语义上具有临近性的关联。在谈话中的患者要么倾向于去掉派生词，要么倾向于把词根和派生词后缀组合在一起，甚至两个词的复合词对他们来说也无法分解。那些理解和说出如 *Thanksgiving* 或 *Battersea* 这样的复合词，但无法理解或说出 *thanks* 和 *giving* 或 *batter* 和 *sea* 的患者经常被引用。只要

派生的意义还存在，那这个过程对于生产语码的创新来说仍然是可用的。人们可以观察到一种过度简化和自动化的趋势：如果衍生词构成的语义单体不能完全从其组成部分的意义推断出来，格式塔就会被误解。因此，俄语词“mokr-íca”表示“木虱”，但俄罗斯失语者将其解释为“潮湿的东西”，尤其是“潮湿的天气”，因为词根 mokr-表示“潮湿”，后缀-ica表示给定属性的载体，如“nelépica（荒谬的事物）”、“svetlíca（明亮的房间）”、“temníca（牢，字面意思是暗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音位学是语言科学中最具争议的领域，一些语言学家对音位是否真的在我们的语音行为中发挥自主作用表示怀疑。甚至有人提出，言语语码的有意义的（有意指的）单体，如语素或词语，是我们在言语事件中实际处理的最小实体，而仅仅有区别的单体，如音素，是为了便于科学描述和分析一种语言的人工构造。然而，这种被萨皮尔污蔑为“现实的逆向”的观点对于某种病理类型仍然完全有效：在一种有时被贴上“无语法”标签的失语症中，词语是唯一被保留下来的语言统一体。患者对任何熟悉的词语只有一个完整的、不可分解的形象，而所有其他的声音序列对他来说要么是陌生的、不可理解的，要么是他通过忽略它们的语音偏差而将它们合并为熟悉的词语。戈德斯坦的一个病人“感知到了一些词，但是……组成它们的元音和辅音没有被感知到。”一个法语失语者能认识、理解、重复并自发地说出“café（咖啡）”、“pavé（道路）”这些词，但是无法掌握、辨别或重复诸如“féca”、“faké”、“kéfa”、“pafé”之类的无意义的序列。对于一个讲法语的普通听者来说，只要发音序列及其组成部分符合法语音素样式，这些困难都会不存在。听众甚至可能将这些序列理解为他不知道但似乎属于法词语汇，虽然它们可能在意义上不同，因为它们在音素顺序或音素本身上彼此不同。

如果失语者无法将词语分解成音素成分，他对词语结构的把握能力就会减弱，很容易对音素及其组合造成可察觉的损害。失语者声音样式以与儿童音位习得顺序正相反的顺序逐渐退行。这种退行导致到同音异义词的增多和词汇量的减少。如果这种双重音位和词汇障碍进一步发展，言语的最后残余就是一个音素、一个词、一个句子的言辞：患者会回到婴儿语言发展的初始阶段，甚至是前语言阶段：他面临着普遍性的失语症，完全丧失使用或理解言语的能力。

差异与意义这两种功能的分离是语言相对于其他符号学系统的一个独特特征。当组织能力缺陷的失语者倾向于取消语言单体的等级并将其规模缩小到一个级别时，这两个语言级别之间就会发生冲突。在后一种情况下，患者仍然能够识别、区分和复制音素，但失去了用单词做同样事情的能力。在中间案例中，词语被识别、区分和复制：根据戈德斯坦的尖锐表述，它们“可能被理解为已知的，但未被理解”。在这里，词语失去了正常的指称功能，而承担了通常与音素有关的纯粹的差异性功能。

### 隐喻和转喻的两极

失语症的表现虽然多种多样，但都不外乎我们刚才描述的两种极端的类型。任何失语症状，其实质都是程度不同的某种障碍：负责选择和替换的功能或是组织和组合语境的官能。在前一类型的失语症当中，受到影响的是元语言行为，后一类型则表现为维持语言单体等级体系的能力出现退化：在前者中，相似性关系被抑制，而在后者中，则是临近性关系被抑制。相似性紊乱与隐喻不相容，临近性紊乱则是与转喻不相容。

话语的发展可以沿两条不同的语义路线进行：这就是说，一个主题是通过相似性关系或者临近性关系引导出下一个主题的。由于这两种关系分别在隐喻和转喻当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所以最好用“隐喻式的”来表达前者，用“转喻式的”来表达后者。在失语症当中，这两个过程非此即彼地受到抑制，甚至会完全停滞——这一事实使失语症研究对于语言学家来说非常具有启发性。然而，在正常的语音行为当中，这两个过程都是持续运作的，但如果仔

细观察便会发现，在不同的文化样式、个性和语音风格的影响下，往往是其中一方——不是隐喻过程便是转喻过程——取得相对于另一方的优势。

在一次著名的心理学测验当中，人们把一个名词展示给几名儿童，并要求他们说出现在头脑里最初出现的语音反应。两种相反的语言偏好在这次实验过程中始终出现：所有回答，不是对刺激物的替换，便是对它的补足。在后一种情况下，刺激物和补足语一起正好组成的某种句法结构，往往是一个语句。这两种类型的反应被贴上“替换型的”和“谓语型的”的标签。

对于刺激物“棚屋（hut）”，反应之一是“烧毁了（burnt out）”；反应之二则是“是一种蹩脚的小房子（is a poor little house）”。这两个反应都是谓语型的。然而，第一个反应制造出一个纯粹叙述式的顺序性语境，而在第二个反应中则存在与主语“棚屋”相关的双重联系：位置上的临近性（或句法临近性）和语义上的相似性。

同一刺激还引起了下列替换性反应：同言重复“棚屋（hut）”、同义词“窝棚（cabin）”和“茅屋（hovel）”、反义词“宫殿（palace）”以及“山洞（den）”和“地穴（burrow）”的隐喻。两个词所具有的相互替代的能力便是位置相似性的例证。并且，所有这些回答均在语义相似性（或反差性）上与刺激物相互联系。而且，刺激所引起的转喻式反应，即如“草屋顶（thatch）”、“稻草”（litter）和“贫穷（poverty）”等，则把位置相似性和语义临近性结合起来并形成反差。

特定的个人正是在其两个方面（位置和语义上的）——通过将其选择、组合或排位——运用上述两种类型的联系（相似性和临近性），从而显示出个人风格、趣味和语言偏好的。

上述两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语音艺术上表现得尤为显著。在诗歌格律的各种形式里可以找到可供研究这一关系的丰富的材料。在诗歌格律上，前后相继的诗句必须遵从对偶的原则，比如在圣经诗歌或西部芬兰的口传诗歌当中和在某种意义上的俄国口传诗歌当中。这样便为我们在给定的言语集团当中判断哪些是对应现象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因为，上述两种关系（相似性和临近性）之一在语言的任一层面上——无论形态的、词汇的、句法的，还是措辞上的——都会以两者之一的方式出现，从而产生了引人注目的一个完整系列，其中包括可能出现的各种构形。在这系列中取得优势地位的可以是上述两大主要类型的关系当中的任何一种类型。例如，在俄国抒情诗歌中是以隐喻结构居多，而英雄史诗则以转喻手法为主。

在诗歌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决定了这两种独立的选择。人们已经多次指出过隐喻手法在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流派当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然而却尚未充分认识到：正是转喻手法支配了并且实际上决定着所谓“现实主义”的文学潮流。后者属于介乎浪漫主义的衰落和象征主义的兴起之间的过渡时期，并与两者迥然不同。现实主义作家用转喻的方式从情节转向气氛，从人物转向空间和时间上的背景。他们十分讲求提喻式的细节。例如，托尔斯泰在描写安娜·卡列尼娜自杀的一幕时，其艺术上的注意力便集中在女主人公的手提包上。同样，他在《战争与和平》里使用了诸如“上唇边的汗毛”和“赤裸的臂膊”一类提喻手法，用来意指具有此类特征的女性人物。

其实，这两种手法相互之间非此即彼的优势绝非为语音艺术所独有的现象。在非语言的其他符号系统中，这一摇摆于两极之间的现象同样存在。譬如，作为绘画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我们可以发现立体主义具有明显可见的转喻倾向：它把物体转变为一系列提喻，而超现实主义绘画则以一种明确的隐喻态势做出了反应。电影艺术自从 D.W. 格里菲斯的影片产生以来，因其具有变换角度、景深和调节镜头的高度发展的能力，便与舞台传统分道扬镳，并且采用了诸如提喻式的特写镜头和通常为转喻式的剪辑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手法。然后，在查理·卓别林和爱森斯坦的影片当中，这些手法又被一种全新的隐喻式的“蒙太奇”所取代，即“淡化出入”——电影的直喻手法。

语言当中的这一两极结构（在其他符号学系统当中亦如此），以及在失语症当中存在的固滞在其中一极上面而排斥另一极的现象，都值得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应当把在两种类型的



失语症当中存在的维持两极之一的现象，放到它们与该极在某些风格、个人习惯、流行时尚等的优势之间的联系当中加以考察。对于由心理病理学、心理学、语言学、修辞学和符号学——关于符号的一般科学——的各学科的专家们协同进行的研究来说，对这些现象和相应类型的失语症所具有的全部病症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比较乃是一项不可推卸的任务。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二分法对于了解语音行为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行为无疑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和影响。

为了说明我们提出的比较研究所开拓的领域，我们从俄国民间故事当中选取一例。这个故事采用了对偶结构，以作为取得戏谑效果的手法叙述“托马是个单身汉，杰列米尚未成婚。”这里的两个对偶子句当中的两个谓语是按照相似性原则取得一致的，实际上它们是同义词。两个子句的主语均为阳性专有名词，因而在形态上相似。此外，它们分别指称同一故事里的两个相邻的主人公，他们将完成一模一样的业绩，从而照应这里所使用的一对同义谓语。另外在一首民间婚礼歌曲里，有着同一结构的几乎原封未动的翻版。歌中轮流呼唤每一位婚礼来宾的姓和父称，如“格列普是个单身汉，伊万诺维奇尚未成婚”。这其中两个谓语仍为同义结构，而两个主语的相互关系改变了：它们均为专有名词，但称谓的是同一个人，并且以相毗邻的方式合乎规范地用作致意的礼貌语式。在上述民间故事里，呈对偶排列的两个子句分别指称不同的事实，即托马的婚姻状况和杰列米的同一状况。然而在那首婚礼歌曲当中，两个子句互为同义语，它们不过重复了同一主人公的单身状况，尽管该主人公被分别置于两个语言位格当中。

俄罗斯小说家格列普·伊万诺维奇·乌斯宾斯基（1840-1902）在晚年遭受着精神病的折磨，并且伴有言语紊乱。格列普·伊万诺维奇是他的名字和父称，习惯上在礼貌交谈当中不可分离，但此时在他的眼中却变成了分别称谓两个人的名字：格列普具有高尚的品行，而本来是把儿子同父亲联系起来的父称伊万诺维奇，这时却变成了代表乌斯宾斯基所有恶习的名字。这种同一人格的割裂在语言学上的意义就是患者无法使用同一象征去代表同一事物，因此这也是一例相似性紊乱。既然相似性的障碍是同倾向于转喻的现象相联系的，如果考察一番乌斯宾斯基青年时代的文学风格，那将会十分有趣。阿那托尔·加米古洛夫曾经分析了乌斯宾斯基的风格，他的研究证实了我们的理论设想。加米古洛夫指出乌斯宾斯基对于转喻，特别是对于提喻具有特殊的偏好。他甚至认为：“读者被作家充塞在有限的语言空间当中的大量细节描写压得透不过气来，从生理上便感到无法抓住整体，以致画面本身往往失落了。”

无疑，乌斯宾斯基的转喻风格明显受到当时取得支配地位的文学典则，即 19 世纪末叶的“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是格列普·伊万诺维奇的个人性情尤其使他去追随这一艺术潮流的最为极端的表现形式，以致最终使得他的特点在其精神病的言语表现方面显得十分突出。

转喻和隐喻这两种手法之间的竞争无论在个人还是社会的所有象征过程当中都有所表现。因此，在对于梦的结构的研究中，关键的问题是须了解梦所使用的象征和时间序列是否基于临近性（即弗洛伊德之转喻式的“移置”和提喻式的“凝缩”——见弗洛伊德《释梦》，维也纳 1950 年第九版），抑或基于相似性（即弗洛伊德之“认同”和“象征”）。弗拉采尔也曾把巫术仪式的支配原则归纳为两大类型：以相似法则为依据的咒语和建立在临近性的联想的基础上的咒语。这两类交感式的巫术，其第一类被称为“顺势”或“模仿”巫术，其第二类被称作“接触巫术”。这种两分法确实说明问题。然而，有这关两极的问题虽然实际上对研究所有象征物，以及特别是对于研究言语行为及其障碍具有深远的意义，却仍然为人们所忽视。那么造成这种忽视的原因何在呢？

元语言象征和元语言所解释的语言象征是通过其在含义上的相似性联系起来的。隐喻项和它所替换的另一项亦通过相似性相互联系。因此，在构建解释隐喻的元语言时，研究者有了更多的同质处理隐喻的手段，而基于不同原则的转喻则不易被解释。因此，相对于转喻理论而言，丰富的隐喻文献是无可比拟的。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普遍认识到浪漫主义与隐喻密切相关，而现实主义与转喻同样密切的联系却常常被忽视。这种在学术研究当中的隐喻对于

转喻的优势并非仅用研究方法便可解释，它还有一个研究对象的问题。由于诗歌的注意力集中在符号本身，而注重实际效用的散文则首先集中于所指物，人们以往便主要地把比喻手法和修辞格作为诗学手段来研究。在诗歌当中支配一切的原则是相似性原则，诗句的格律对偶和韵脚的音响对应关系引起了语义相似性和相悖性的问题。譬如，有合乎语法的韵脚，也有违背语法的韵脚，但从未有过无语法的韵脚。散文则相反，它主要在临近性关系上面做文章，结果使隐喻对于诗歌、转喻对于散文分别构成阻力最小的路线，这便是对诗歌比喻手法的研究主要围绕着隐喻的缘由。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中，实际存在的两极结构人为地被残缺不全的单极样式所取代。而后者令人吃惊地恰恰与失语症的两种表现之一，即本文所说的临近性紊乱相吻合。

目录：

- 1 演讲
- 2 2
- 3 3
- 4 4

演讲

教授们，女士们，先生们。

在我接下来的发言中我想从你们之中挑出那些定期在星期三来听我讲课的人，以表达我们对我首先提到的那个人的感激之情。让·底雷，是他同意为这一系列的讲座揭幕。他来出席这次会议是我们的荣幸。

就我个人而言，我要感谢他为我过去两年在这里举办的研讨会提供了一个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屋檐，通过在屋檐下积累的所有记忆为这一教学增添了声誉，并使其与他自己的演讲产生共鸣。

今天我想谈谈精神分析和控制论。由于它涉及到将精神分析和各种人类科学结合在一起，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我马上就告诉你，我不会谈论那些或多或少有些时髦的各种控制论，也不会谈论大机器或小机器。我不会用它们的名字来称呼它们，我不会告诉你它们所创造的奇迹。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但尽管如此，在我看来，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从这两种大致同时代的技术中得到，这两种思想和科学的秩序：精神分析和控制论。不要指望任何声称是详尽无遗的东西。我们所关心的是找到一个轴心，通过这个轴心，我们可以对这两者的部分意义进行一些说明。这个轴心不是别的，就是语言。我将给你们一个关于语言本性的快速一瞥。

我们将开始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研讨会上提出的。通过一系列的关联。我们到达了一个位置，我们问自己，用机器玩碰运气的游戏意味着什么。

偶然的的游戏是偶数和奇数的游戏。这在一个讨论精神分析的研讨会上很有趣，这似乎是令人惊讶的。偶尔我们也会谈论牛顿。我不认为这些东西是偶然出现的——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研讨会上谈论偶数和奇数的游戏以及牛顿，精神分析的技术才会有偶然，而不至于年久失修，甚至名誉扫地。

好了，在这个偶数和奇数的游戏过程中，我们想提醒自己——我们这些分析师——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发生的，但也有可能从中产生一些与最纯粹的偶然有关的东西。

结果是惊人的。在这群分析家的听众中，我们遭遇了真正的愤怒。因为有人告诉我，他们认为，我想消除偶然。事实上，告诉我这些的人是一个有着坚定的决定论信念的人。而这正是真正令人恐惧的地方。这个人是对的——偶然的的存在和决定论的基础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让我们想一想偶然的问题。当我们说某件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可能是指两件事中的一件。这两件事可能非常不同——要么是没有意图的，要么是有法则的。

现在，决定论的思想本身就意味着法则是没有意图的。这就是为什么决定论总是试图从最初没有无分别东西开始，然后找出在依据法则运作的在实在中被构成的东西——偶然是没有意图的。决定论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事情的发生是无原因的，但它是一个无意图的原因。

这个典范性的实验可能会让我的对话者——上帝知道，当涉及到这种问题时，思想是多么容易滑落——认为我即将把决定论重新引入正或反的游戏中。如果连正反的游戏都被确定了，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真正的决定论将不再可能了。

这个问题开启了发现决定论的性质，我们的分析认为这是我们技术的根本。我们试图让主体在没有任何意图的情况下向我们提供他的思想，正如我们所说的，他的评论，他的认可。换句话说，他应该有意的尽可能地接近偶然。在这里，偶然的意图所追求的决定论是什么？正是在这一点上，控制论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控制论是一个边界非常不确定的领域，为了找到它的统一性，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各种理性化的领域，从政治，通过博弈理论，到通信理论，甚至到信息概念的某些定义。

我们被告知，它是在工程师的工作中非常直接地诞生的，他们的工作是研究通过导线传递信息的经济学。关注人们可以将消息传输模式简化为基本要素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它大约有十年的历史。它是由最杰出的工程师之一——诺伯特·维纳命名的。我认为这限制了它的重要性，而我们应该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它的诞生。

为了理解控制论的内容，我们必须在对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主题中寻找它的起源。控制论的过去不外乎是合理化的形式，我们称之为“精确科学”和“推测科学”的对比。

推测科学，它，我认为，是一个真正的名称。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给一组特定的科学以真正的名称，这些科学通常被称为人文科学。不是说我认为这个词用得不恰当，因为事实上，人类的行为会涉及到任何情况。但我认为它太含糊了，太被各种来自伪启蒙科学的混乱的呼声所束缚了，这只能降低它的张力和层次。我们只能通过更加严格和更加具体的对推测科学进行定义来获得好处。

如果这就是我们对控制论的定位，我们将很容易找到它的祖先。比如孔多塞，他的投票和联盟理论，还有他所说的政党理论，再往前追溯，帕斯卡，他是这个理论的创始人，也是这个理论真正的起源。

我将从另一个科学领域的基本概念开始，即精确科学，其现代形式的实现并不比猜想科学的实现更早。前者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后者，使之黯然失色，但它们彼此是不可分割的。

## 2

我们该如何定义精确科学？我们是否应该说，与猜想科学不同，它们关注的是实在？但什么是实在？

我认为，在这方面，人们的观点从未发生过很大的变化，这与人类思想的心理学谱系所要我们相信的相反，根据该谱系，早期人类生活在梦中，并声称儿童习惯性地被他们的欲望所幻化。这是一种奇怪的观念，它与我们所观察到的完全相反，所以只能把它描述成一个神话，一个我们应当探究其起源的神话。

人类一直赋予实在以如下意义——无论人们是否去过那里，它是人们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发现的东西。这个实在可能已经移动了，但如果它已经移动了，人们会在其他地方寻找它，寻找它被干扰的原因，人们也会告诉自己，有时它在自己的动力下移动。但不管我们是否在那里，它总是很好地、真正地在它的位置上。而我们自己的移动，除了某些例外，原则上对这种位置的改变没有有效的影响。

可以肯定的是，精确科学与实在的这种功能紧密相连。这是否意味着，在它们发展之前，人类缺乏这种功能，人类被这种所谓的思想的全能所说服，而这种全能是与所谓的万物有灵论的古老阶段相联系的？事实并非如此，人类以前生活在一个拟人化的世界的中心，他期望

从那里得到人类的回应。我认为这种观念是完全愚蠢的。人类的婴儿期的概念与历史无关。在精确科学出现之前，人类和我们一样认为，实在就是在人们期待的地方不断出现的东西。在夜晚的同一时间，人们总是能在特定的子午线上找到一颗特定的星星，它将在那里再次出现，它确实总是在那里。我把天体的标记放在地面的标记之前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事实上，天空的地图是在地面的地图之前绘制的。

但人也认为，他的行动与维护这种秩序有关。长久以来，人类一直认为，他的仪式，他的典礼——皇帝打开春天的沟渠，春天的舞蹈，以保证自然界的肥沃——他的有序和重要的行动——真正意义上的行动，即语言的行动——对于维持事物在其位置上不可或缺。他不认为如果他不以这种有秩序的方式参与，实在就会消失。但他认为实在会受到干扰。他没有在假装制定法，而是在假装他对法的持久性来说不可或缺。这是一个重要的定义，因为事实上它完全保证了实在的存在的严谨性。

当人们意识到他的仪式，他的舞蹈和他的祈祷与事物的秩序没有任何关系时，这个极限就被超越了。他是对还是错？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再保有旧的信念了。从那时起，精确科学的视角诞生了。

从人们认为即使自己不在那里继续标记时刻，自然的伟大时钟也在自行转动的那一刻起，科学的秩序便诞生了。科学的秩序取决于以下几点：在统治自然的同时，人类已成为其公职的仆人。他不能统治它，除非服从它才可以。就像奴隶一样，他想通过服侍主人好让主人依赖他。

人知道大自然会准时赴约。但这种精确性是什么呢？正是自然界中两个时间（临时）的相遇。

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时钟，它就是太阳系，一个必须破译的自然时钟，毫无疑问，这是构成精确科学的最具决定性的步骤之一。但是人也必须有他的时钟，他的手表。谁的更准时（准确）？自然？还是人？

目前尚不清楚大自然是否会安排每一次约会。当然，人们可以把自然定义为准时出现在约定地点的东西。当德伏尔泰先生谈到布封的自然史时说它并不像那些东西那样自然，他是想说这种话的。这是一个定义问题——我所爱的人总是与我约会，因为当她不来时，我不再称她为我所爱的人。准时的是人吗？如果不是精确的同步手表，那么准时（精确性）的来源是什么？

请注意，手表，可靠的手表，仅存在于在惠更斯于 1659 年成功制造出第一个完美的等时时钟的时候，这开启了宇宙的精确性——用亚历山大·科瓦雷的说法，没有它，就不可能有真正精确的科学。准时（精确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它包括我们在这个时钟、在这个手表中找到的某种东西，即从自然时间借来的一个系数——系数  $g$ 。你知道，它是由重力引起的加速度，总而言之，是一种时空关系。它是从某种思想实验发展而来的，用伽利略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体现在仪器中的假设。如果仪器被构造为证实假设，则无需进行任何实验来证实它，因为它起作用的事实证实了假设。

但人们仍然必须用一个时间单位来校准这个仪器。而时间单位总是从实在借来的，它总是指的是实在，也就是说，它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再次出现。时间的单位是我们的恒星日。如果您是一名物理学家——例如让我们以 M.波莱尔为例——他会坚持认为，如果地球自转发生了难以察觉但从长远来看并非不可察觉的减速，考虑到这种自转支配着我们的恒星日，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绝对无法找到它的证据，因为我们现在是将我们的时间作为我们无法控制的这个恒星日的函数来调节的。

在这些条件下，如果我们精确科学的某个部分被总结为非常少的符号，那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我们要求用物质和运动来表达一切的原因，我的意思是用物质和时间来表达，因为就运动而言，是实在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已经成功地消除了它，减少了它。

牛顿系统和爱因斯坦系统的小小象征游戏，最终与实在没有多大关系。把真实还原成几个小字母，还原成一捆小公式的科学，在后世看来，可能会像一部惊人的史诗，也会像史诗一样逐渐消失，变成一个相当短的回路。

考虑到精确科学的精确性的基础，即仪器。我们很可能会继续问其他问题。即，这些地方是什么？换句话说，是什么让我们把这些地方作为空的地方来关注的？

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是在精确科学诞生的同时提出的，才开始出现这种被误解而不是被很好理解的微积分——概率微积分。时间在 1654 年，随着帕斯卡关于算术三角形的论文，以计算的形式出现，不是随机性，而是偶然性，是相遇本身。

帕斯卡开发的算术三角形，即第一台机器，引起了科学界的注意，因为它使人们能够立即确定，当构成游戏的一连串回合被打断时，赌徒在任何特定时刻有权期待什么。一连串的回合是人们可以能给出的相遇的想法的最简单形式。只要玩家还没有按照惯例到达回合序列的末尾，便可以评估某些内容，即相遇的可能性。问题在于地点，在于什么可以或不可以填补它，这就等同于它自身的不存在。在同一地点所发现的事物的科学被地点的组的科学所代替。它产生于一种有秩序的领域，这种领域假定了转折的概念，即扫掠的概念。

在此之前一直是数字科学的一切都变成了组合科学。象征世界的或多或少的混乱、偶然的穿越是围绕着缺席与在场的相关性来组织的。对在场与缺席的规律的探索将倾向于建立二元秩序，这导致了我们的控制论。

为了保持这个前沿性，以控制论的形式出现在我们世界中的事物的独创性，我把将它与人类的等待联系起来。如果扫描相遇组合的科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是因为它深深地与人有关。它并非无缘无故产生于机会游戏。博弈论与我们经济生活的所有功能、联盟理论、垄断理论和战争理论有关，这并非毫无意义。是的，战争本身，在它与任何可能实在的事物分离的方面被视为游戏。同一个词指代如此多样化的领域以及机会游戏并非毫无道理。现在，在我提到的第一个游戏中，涉及到的是主体间的协调关系。人是否对某些东西——以及在他为之献身的计算中——其语义的同音异义词表明，它必须与主体间性有某种关系作出了判断，是否是在机会游戏中寻找某些东西——尽管在机会游戏中它似乎已经被消除了？在这里，我们非常接近我开始提出的中心问题，即，无意识的机会是什么，它在某种程度上位于人的背后？

毫无疑问，在机会游戏中，人会考验自己的运气（机会），但他也将在其中解读自己的命运。他有一种想法，那就是那里透露了一些属于他的东西，而且，我想说，鉴于没有人与他对峙，所以更是如此。

我已经告诉过你理论的整个运动是如何汇聚于一个二进制符号的。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用 0 和 1 表示。在我们所谓的控制论出现之前，还需要什么？它必须独立于任何主体性，在实在中发挥作用。这门关于空位的、遭遇的以及它们自身的科学必须结合起来，必须被整体化，并且必须开始自行发挥作用。

那需要什么？为了支持这一点，必须从实在中提取一些东西。从一开始，人类就试图在象征的游戏加入实在。他把东西写在墙上，他甚至想象、梅内、特克尔、乌法尔辛这样的东西会自己写在墙上，他把数字放在一天中每个时刻太阳的影子所停留的地方。但最终，这些象征总是停留在它们所要放置的地方。卡在这个实在的，人们可能认为它们只是它的地标的地方。

新鲜的是允许它们用自己的翅膀飞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种简单、普通、任何人都能使用的装置，一种你只需要转动把手的装置——门。

请仔细想想——门并不完全是实在的。把它当作这样会导致奇怪的误解。如果你观察一扇门，并从中推断出它会产生气流，你就会把它夹在腋下到沙漠中让你凉快一下。

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所有字典中查找门的含义。利特雷词典中有两页关于门——从作为开口的门到作为或多或少的铰链式关闭手段的门，从高门到人们“用它来做鼻子上的面具”——正如勒尼亚尔所写的那样，如果你回来，我会用它遮住你的脸。在此之后，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利特雷词典写道，一扇门要么是开着的，要么是关着的。这句话并没有让我完全满意，尽管它有着文学上的呼应，因为当涉及到国家的智慧时，我天生就是怀疑的——有很多东西写在里面，但形式有点混乱。这就是精神分析存在的原因。的确，要么打开，要么关闭，门必须这样，但它们并不等价。

语言可以在这里帮助我们。我的上帝，一扇门，通向田野，但我们并没有说它通向羊圈，它也不通向围场。我知道我在这里混淆了门和围场的门，但现在再混淆也不会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要继续对门进行调研究。

有人可能会认为，因为我已经谈到了田地和羊圈，所以问题是内部和外部。我认为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生活在一个足够伟大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代可以想象一条能绕地球一圈的长城，如果你敲门穿过它，哪个是里面，哪个是外面？

你不会认为一扇门会因为打开而变得更加宽大吧。我们说，一扇窗子可以通向开放的国家。比较奇怪的是，当我们说一扇门通向某个地方时，它通常是一扇大部分关闭的门，有时甚至被完全堵住了……

人有时会去开门，这总是一个相当果断的行为。而更多时候，一扇门是拒绝你的。

门的两边可能有两个人在看着，但想象一下，如果是一扇窗户，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你可以破门而入——即使门是开着的。当然，正如阿尔封斯·阿莱过去常说的那样，这既愚蠢又残忍。相反，从窗户进去总是被认为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行为，而且总是有意为之的。然而，人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穿过一扇门。因此，初步推断，门不具有与窗相同的工具性功能。

就其本质而言，门属于象征秩序，它向实在或想象敞开。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但它不是一个就是另一个。开与关之间存在不对称性——如果门的打开控制了通道，那么当它关闭时，它就关闭了电路。门是一个真正的象征，一个卓越的象征。人们通过它所描绘的十字架，总是可以识别交错的连接和闭合。

一旦有可能将这两个特征折叠在一起，构建一个封闭空间，也就是说一个电路，这样当它闭合时是某物可以通过的，而当它断开时则是无法通过的，这时，连接的科学就进入了控制论的实现境界。如果有机器可以自己计算、加法、求和，做这些在此之前认为是他们所特有的思维所做的事，这便是因为我们拥有优雅的电学。正如我们所说的，它使我们能够建立电路，电路可以打开和闭合，可以自我中断或自我恢复，它可以是作为一个功能性存在的控制门。

请注意，这里重要的是开通和关闭的关系。一旦门开通，它就会关闭。当它关闭时，它会开通。一扇门不是开也不是关，它必须是先开后关，再开再关。多亏了电路以及连接到其上的感应电路，即所谓的反馈，门闭合后电磁铁返回到打开状态就足够了，即它再次关闭，再次断开，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的振荡。这种振荡是扫描。扫描是人们可以通过使用一系列蒙太奇而无限期地记录有序动作的基础，而这只不过是儿戏。

以下是门的四种情况——在前两种情况下，门是关闭的，在其他情况下，门是打开的。

0

0

1

1

对于另一扇门，我们可以选择打开或关闭一扇门。

0  
1  
0  
1

例如，你现在决定，在某些情况下，第三扇门将被打开或关闭，这取决于前面两扇门的位置。

00:0  
01:1  
10:1  
11:1

要想让第三扇门打开，只需要前面的门中至少有一扇是打开的。

还有其他形式，你可以决定这两扇门必须打开，第三扇才会打开。

00:0  
01:0  
10:0  
11:1

第三种形式是很有趣的：

00:0  
01:1  
10:1  
11:0

在这里，你决定第三扇门只有在两扇门中只有一扇是打开的时候才会打开。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任何一个人的愿望。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形式 1 可以称为合取。形式 2 也有逻辑解读，由于其定律与算术乘法的定律相吻合，因此有时也称为逻辑乘。最后，形式 3 是对 2 的模数加法，当您将 1 和 1 相加时，在二进制表示法的世界中，你会得到 1 后面带一个 0。

一旦我们有在节律中的一次基本扫描中体现这个 0 和 1——实在的在场和缺席的记号——的可能，一些东西就会进入实在，我们会问自己——也许不是为了很长，但毕竟一些重要的思想正在这样做——我们是否有一台会思考的机器。

我们非常清楚，这台机器并不思考，我们制造了这台机器，它思考着被告知要思考的东西。但如果机器不思考，那么很明显，我们在进行操作时也不思考。我们所遵循的程序与机器完全一样。这里重要的是意识到，这一连串的相遇的可能组合可以作为一种秩序来研究，这种秩序在它的严密性中独立于一切主体性而存在。

通过控制论，象征体现在一种装置中——不要与它混淆，装置只是它的支撑，它以一种字面意义上的跨主体的方式体现在其中。

我不得不走在你看来似乎很长的路上。但是，您必须将它们牢记在心，才能理解控制论的贡献的真正含义，尤其是消息的概念。

#### 4

在控制论中，消息的概念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消息毫无共同之处，后者总是有意义的。控制论的消息是一连串的符号。而符号的序列总是归结为一系列的 0 和 1。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消息单位，也就是说，任何种类的符号的效力都是根据它来衡量的，它总是回到一个叫做键盘的主要单位，而键盘只不过是替代物，这非常简单。



在这个象征系统中，消息被捕获到一个老套的网络中，即在一个统一的音节基础上的相遇组合，也就是说，一个 1 就是音节本身。

另一方面，消息的概念就像我为你画的这些小表格中的那一样简单易懂。

00:0

01:0

10:0

11:1

让我们从这张表开始，它应该做如下解读——我必须有两场正面的比赛才能获胜，这意味着一开始。我有  $\frac{1}{4}$  的期望。假设我已经试过了。假设我已经使用了一次机会。如果它是负的，我就没有别的机会了，如果是正的，我有两次机会，即  $\frac{1}{2}$ 。这意味着，在我的机会方面，水平的差异已经以增加的形式出现了。

能量和自然的现象总是趋向于差异水平的均衡。在消息和机会计算的顺序中，随着信息的增加，水平差异变得更加分化。我并不是说它总是增加，因为你可能会发现它没有增加的情况，但它不一定减少，并且总是趋向于分化。

换句话说，在这种观点中，句法存在于语义之前。控制论是一门关于句法的科学，它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到，精确科学除了将实在与句法联系在一起之外，别无他用。

那么什么是语义，即具体的语言——我们所处理的语言，具有模糊性、情感内容和人类意义的语言？我们是不是要说语义是人为的，被人类的欲望所支配？

可以肯定的是，是我们在引入意义。无论如何，许多事情都是肯定的。但我们能说在机器中流通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吗？这当然不是所有意义上的词的意思，因为要使消息成为消息，不仅必须有一连串的符号，而且必须有一连串的定向符号。为了让它按照语法运作，机器必须朝着某个方向运行。当我说机器时，你可以感觉到它不是简单的小盒子——当我在纸上写作时，当我经历 1 和 0 的转换时，那也总是一个有方向的活动。

因此，说是人类的欲望本身将意义引入了这种原始的语言，这并不完全严谨。证明这一点的是，没有什么意外的东西从机器中产生。也就是说，它不是我们感兴趣的东西，而是我们预测了的东西。它只是在我们确定的可以读出某种结果的地方停止了。

体系的基础已经在发挥作用。如果它不是建立在偶然性的概念上，也就是说，建立在某种已经有意义的纯粹的预期上，它又怎么能建立起来呢？

所以这是最纯粹形式的象征。后者本身已经可以产生比语法错误更多的东西。语法错误只会导致过失，它们只是意外。但是编程中的错误会导致谬误。在这个层面上，真假已经岌岌可危。这对我们分析师来说意味着什么？当人类主体对我们说话时，我们面临什么？

他的话语不是纯粹的话语。不纯粹——只是因为语法错误吗？不，当然不是。整个精神分析完全正确地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即从人类话语中获得有意义的东西不是逻辑问题。我们看这个话语背后，它有它自己的意义，它的意义在另一种意义之上，确切地说，在它所表现出来的象征功能上。现在也出现了世界象征的另一种含义。

在这一点上，我们遇到了控制论向我们揭示的宝贵事实——人类话语的象征功能中有一些无法消除的东西……那就是想象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第一个象征，自然象征，它们源于一定数量的普遍形象——人体形状、一定数量的明显物体的形象，如太阳、月亮和其他一些形象。这就是赋予人类语言重量、资源和情感振动的原因。这种想象与象征是同质的吗？不，如果把精神分析简化为对这些想象的主题的强调，简化为主体与一个可选择的、有特权的、占优势的客体的结合，这将是一个倒错的精神分析的意义，这将对精神分析意义的一种歪曲，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所谓的客体关系的模数。

控制论明确强调的一件事是象征秩序和想象秩序之间的根本区别。一位控制论学者最近向我承认，无论怎么说，我们都很难将格式塔的功能转化为控制论，也就是良好形式的结合。而在活生生的自然界中好的形式在象征性中就是坏的形式。

正如人们常说的，人类发明了轮子。轮子在自然界中是找不到的，但它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即圆形。另一方面，在自然界中，你不会找到一个描述其每条线路的点的轨迹的轮子。想象中没有摆线，摆线是象征性的发现。后者可以很容易地由控制机器产生，但在通过两台机器之间的对话使一个圆与另一个圆相对应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除非我们以最人工的方式来完成它。

这就突出了两个平面——想象和象征——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想象中存在着一一种惰性，我们发现它在主体的话语中表现出来，在话语中播下不和谐的种子，使得我没有意识到，当我对某人好的时候，我对他不好，当我爱他的时候，我爱的是我自己，或者当我认为我爱自己的时候，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我爱着另一个人。正是运用分析的辩证法才能消除这种想象中的混乱，并使话语恢复其作为话语的意义。

问题是要知道象征是否如此存在，或者象征是否仅仅是想象的第二个层面。这就是在两种分析方向中的选择。

鉴于经过历史的变迁，所有的意义都已经作为语义的压舱物积累了很久，那么，我们是否要遵循主体在此时此地给予他话语的方向，即他知道他是在从事精神分析，而精神分析已经制定了某些规范？这是不是鼓励他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有内涵的人，达到本能的成熟的人，这个人抛开这个或那个口器的形象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在分析中，这是一个对这些基本形象进行整合、矫正的问题，一个在想象中正常化的问题，还是一个在话语中解放意义的问题，在主体所参与的这个普遍话语的延续中解放意义的问题？这就是各流派的分歧之处。

弗洛伊德具有这种最高程度的意义感，这一点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得到了说明，例如《三个匣子的主题》，它读起来好像是由一个神人写的，好像是由一种属于诗歌灵感秩序的意义引导的。现在的问题是知道是否，是或不是，分析将继续朝着弗洛伊德的方向发展，不是寻找不可言说的东西，而是寻找意义。

意义的含义是什么？意义是这样一一个事实，即人类并不是这个原始的语言的主人。他被抛入其中，投入其中，被卷入其齿轮中。

我们不知道起源。例如，我们被告知基数在序数之前出现在语言中。人们可能会认为，人类是通过序数的方式接触到数字的，通过舞蹈、通过公民和宗教的游行、通过优先顺序、通过城市的组织，这只不过是秩序和等级制度。然而，语言学家告诉我，基数是第一位的。

我们必须惊叹于这个悖论。在这里，人不是他自己家里的主人。有一种东西，人把自己融入其中，它通过自身的组合已经被控制了。人从自然秩序到文化秩序的过程遵循着同样的数学组合，这些组合将被用来分类和解释。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称它们为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然而，帕斯卡不应该是原始人。人类将他的全部存在都投入到数字的行列中，投入到一种不同于想象表征的原始象征中。正是在这中间，人的某些东西必须得到认可。但是，弗洛伊德教导我们，必须承认的东西不是被表达出来的，而是被压抑的。

对于机器来说，任何没有及时出现的东西都会被抛在一边，而不会对任何东西提出要求。对人来说则不然，扫描是有生命力的，任何没有按时到来的东西都是悬而未决的。这就是压抑所涉及的内容。

毫无疑问，没有被表达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但被压抑的东西总是在那里，坚持着，并要求存在。人与这个象征秩序的基本关系正是象征秩序本身的基础，即非存在与存在的关系。

坚持要被满足的东西只能在承认中得到满足。象征过程的终点是：“非存在成为存在，因为它说话了”。

目录:

隐喻与转喻 I

1

2

3

隐喻与转喻 II

1

2

3

隐喻与转喻（一）

“Sie leben also den Wahn trie sich selbst. Das ist das Geheimnis.” 这句话摘自弗洛伊德与弗里斯的通信，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他在后续作品中相继出现的主题的开端，并且非常突出。

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书信，我们会有弗洛伊德的风格吗？是的，我们仍然会这么做，但他们告诉我们，这种风格只不过是他的研究和动力的表达，他从未偏离。甚至在 1939 年，当他写下《摩西与一神教》时，人们仍然觉得他的热烈质疑并没有减弱，而且他仍然以同样几乎绝望的坚韧努力解释，那个“人”，在他存在的位置上，怎么会如此依赖这些显然不适合他的东西。这便是言说与命名——一个关乎真理的问题。

我重读了《摩西与一神教》，目的是为两周后我要写的关于弗洛伊德的论文做准备。似乎对我来说，在这项工作中，我再次确认了我在这里试图让你们感受到的东西，即分析与一个基本问题是绝对不可分割的，这个问题是关于真理如何进入人类生活的问题。真理的维度是神秘的、无法解释的，没有什么能决定性地把握它的必然性，因为人很好地适应了非真理。我将尝试向您展示，这确实是在《摩西与一神教》中一直困扰弗洛伊德的问题。

在这本小书里，人们可以感觉到一种放弃的姿态和一张隐藏的面孔。在接受了死亡之后，他仍在继续。弗洛伊德对摩西的人格，对假想的恐惧的重新质疑，除了对这个问题——真理的维度通过什么途径以一种有生命的方式进入生命，进入人类的经济？——的回答之外，他没有别的动机。弗洛伊德的答案是，它是由父亲这个概念的终极意义所中介的。

父亲属于一个本身就是神圣的现实，比其他任何现实的东西都更具有灵性，因为严格来说，活的现实最终没有任何东西指向他的功能、他的存在、他的支配地位。父亲的真理——弗洛伊德自己称之为精神上的真理——如何被置于前台？只有通过这种非历史的戏剧——父亲的死亡，父亲的谋杀——才能思考这件事。这显然是一个神话，一个非常神秘的神话，一个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不可避免的神话。这里隐藏着一些东西。

我们去年所做的所有工作都在这一点上相遇了——不能否认弗洛伊德直觉的必然性。人种论的批评是无关紧要的。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戏剧问题，通过它，一种超越人类的内部运动——父亲的象征——进入了生活。

象征的性质仍有待澄清。通过将其起源与死本能的起源定位在同一点，我们已经接近了它的本质。我们表达的是同一件事。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汇聚点——能指在其表示的角色中本质上意味着什么？作为纯粹能指的象征存在在人类生活中的原初与起始功能是什么？

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对精神病的研究。

我写在黑板上的这句话是典型的弗洛伊德风格的，我把它交给你们，以便我们可以继续听到它的共鸣。

在这封信中，弗洛伊德谈到了不同类型的防御。这个词已经被我们过度使用了，我们不禁要问，谁在为自己防御？被防御的是什么？一个人在为自己防御的是什么？在精神分析中，防御是针对海市蜃楼、虚无、空洞的防御，而不是针对任何存在的、在生活中具有重量的东西的防御。后者的谜团被现象本身所掩盖，甚至是在当我们意识到它的时候也是如此。这封信第一次以一种特别清晰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的各种机制。

然而，当弗洛伊德谈到精神病时，他仿佛被一个更深刻的谜团击中了。他说：“对于那些患有偏执狂、妄想症、精神病的人来说，他们爱他们的妄想就像他们爱自己一样。”

这里有一个呼应，应该充分重视，就是十诫中所说的：“爱你的邻居如同自己。”

弗洛伊德的思想中从不缺少神秘感。这是它的开端、过程和结尾。我相信，如果我们让它消失，我们就失去了每一项分析都必须建立的程序所必需的东西。如果我们一时失去了神秘感，我们会迷失在一种新型的海市蜃楼中。

弗洛伊德有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精神病人与其妄想的关系中的某些东西超出了所指和意义的作用，也就是我们后来称为本我驱力的作用。这里有一种感情，一种依恋，一种必不可少的临场感，对我们来说，其神秘性对我们来说几乎是完全的，那就是妄想者，精神病患者，紧紧抓住他的妄想，就像抓住自己的东西一样。

伴随着我们耳边响起的这种共鸣，我们将再次提出上次提出的问题，即与语言的关系在精神病的形式和发展中所承担的经济功能。

让我们先把施列伯告诉我们他听到的来自那些中间生命的句子作为我们的材料，这些中间生命的性质各不相同，有的是天堂的前院，有的是已故的灵魂，有的是被上帝降福的灵魂，这些影子，这些被剥夺了存在和声音载体的模糊存在形式。

正如语言学家所说，句子的整个部分包含了赋予句子以意义的核心词，这使它并不会被体验为幻觉。相反，声音停止了，它迫使主体说出句子中的有关含义。

“现在是他被制服……的时候了！”这里隐含的表达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的主体向我们表明他没有产生幻觉。他被置于悬垂中，在由助动词、连接词、连词或副词组成的句子的语法或句法部分之后的空白处。这些词突然被说出来，它们就像来自外部的句子一样。这句话是由这个既空又满的主体写的，我曾将其称之为幻觉内部的我。

“现在，根据灵魂的概念，这已经走得太远了。”根据施列伯的说法，这种灵魂概念的全部功能在于比这些主体更加高阶的代理者——用语词表达的东西里。这些语词是通过背诵学习的，它们由他认为空洞的文字组成。它们暗示了解析他的各种思想的功能性概念。一种心理学确实在他的幻觉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一种教条式的心理学，它以解释他的声音向他阐述，向他解释他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特别是，那些隐含的东西已经具备了幻觉的形式，但在幻觉中没有大声表达出来。这就是“主要的思想”。主体的幻觉生活经验在现象中呈现出它自己的本质。它表明，它所经历的幻觉现象，无论基础与否，都缺乏主要思想。“我们缺乏思想”，也即是缺乏意味着什么的思想。

对于我们可以称之为幻觉的锁链的东西来说，主体似乎既是代理者又是病人。他经历了而不是组织了幻觉。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个成品，这种幻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描述为推理的疯狂，因为在从某些方面——尽管是次要的角度——来看，它的表达是合乎逻辑的。疯狂竟然会完成这种性质的综合，这和它的存在本身一样是一个问题。它发生在一个起源的过程中，这个起源从也许是这个结构所内在的元素中发芽，但这些元素在其原始形式中呈现为封

闭的甚至是神秘的。

首先，有几个月的精神病前的潜伏期，在这几个月里，主体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世界的黄昏的现象，这是幻觉期开始的特征。1894年3月中旬，他被送入弗莱希格的诊所。93年11月中旬开始出现幻觉现象，他把这些口语交流归结为这个幻觉世界中的不同等级，其包括两个层次的神圣现实，即上帝的前境和后境，以及各种处于或多或少被重新吸收到这个神圣现实阶段的实体。

这些实体，即灵魂，与他所谓的“世界秩序”的方向相反，这是他的幻觉结构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它们不是朝向绝对的大他者的重新整合，而是朝向依附于他——施列伯——的方向移动，其形式在幻想的发展过程中有所不同。在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内射现象在他的生活经验中被公开表达出来，他说弗莱克西格的灵魂在这里进入他，它就像蜘蛛网的线，它大到他无法吸收，它又通过他的嘴出来了。在这里，我们有一种活生生的内射图式，它稍后会减弱，并被打磨成一种更加灵性化的形式。

事实上，施列伯将越来越多地融入这种模糊的言语，他与之融为一体，并以他的全部生命对其作出回应。他真的像爱自己一样爱它。这种现象很难被描述为一种内在的对话，因为它正是围绕着他者的存在而展开的，死的亡象征游戏的意义优先性正变得越来越空洞。

当能指在力比多关系中占据越来越多的位置，并投入主体的所有时刻、所有欲望时，它趋向于耗尽自己的所指，这种侵入的意义是什么？

我在一系列重复的文本前停顿了一下，在这里为你们展开这些文本是很乏味的。这里面有些东西让我震惊，即使这些句子可能有意义，人们也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于隐喻的东西。

但是什么是隐喻呢？

## 2

我将你引导到这里是为了一项从未指出过的探索。

隐喻不是世界上最容易谈论的东西。博叙特说它是一个明喻的提炼，每个人都知道这并不完全令人满意，而且我相信事实上没有一个诗人会接受它。我说没有诗人，因为对诗歌风格的定义可能是说它从隐喻开始，而在隐喻停止的地方，诗歌也停止了。

“他的禾束既不吝啬，也不怨恨。”——维克多·雨果。这是一个隐喻。这当然不是一个潜在的明喻，这不仅仅是一捆稻草被心甘情愿地分散在穷人中间，所以我们的角色既不吝啬也不怨恨。这不是一种对比，而是一种认同。隐喻的维度对我们来说一定比其他人更难进入，这种说法的前提是我们认识到我们通常称为它的东西是认同。但这还不是全部——我们对象征一词的使用实际上导致我们限制了它的意义，只指定了象征的隐喻维度。

隐喻预设了一个意义作为主导的基准，而且它偏转、使用能指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整个种类的预先建立的——我应该说是词汇的——联系都没有了。在任何词典的用法中，没有任何一个词能表明禾束有能力是吝啬的，更没有能力是怨恨的。然而，很明显，只有在可以说“他的禾束既不吝啬，也不怨恨”——也就是说，一旦意义把能指从它的词汇联系中剥离出来——的时候，语言的使用才有可能产生意义。

这里我们有能指和所指的模糊性。没有意指结构，即没有谓语的表达，没有主语与其属性之间保持的距离，禾束就不能被定性为吝啬或怨恨。这是因为有一种句法，一种能指的原始秩序，主体被保持为独立的，与它的性质不同的东西。动物创造一个隐喻是完全不可能的，尽管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也没有直觉，知道什么是慷慨的，什么可以轻松而丰富地给予它想要的东西。但是，就它不具备表达性而言，不仅仅是意义的话语，而且包括吸引和排斥的所有内容，但在吸引、食欲和欲望的动物心理学中，能指-隐喻的对齐是不可想象的。

这个以隐喻表达的象征阶段以相似性为前提，而相似性是由立场独特地表现出来的。正是由于是吝啬和怨恨的主体——布兹的缺乏贪婪和慷慨——禾束才能够被认同为是布兹。正是

由于位置的相似性，禾束与主体布兹在字面上是相同的。这种相似性的维度肯定是语言的重要使用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它如此主导了对象征运作的理解，以至于向我们掩盖了其他维度——句法的存在。然而，如果我们打乱了词序，这个句子就会失去所有意义。

这就是在讨论象征时被忽视的地方，即，能指的存在及其组织的层面。

### 3

在此基础上，人们不能不想到的是，我的一位语言学家朋友罗曼·雅各布森想到的是，某些被称为失语症的疾病的分布可以根据以下两者之间的对立来重新考虑：一方面是相似性、替换或选择的，还有并发的关系，总之，所有同义词的顺序，另一方面是临近性、串行、意指发音、句法协调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批评的感觉性失语和运动性失语之间的经典对立变得惊人的协调。

你们都熟悉韦尼克失语症。该种失语症患者将一连串语法特别发达的句子连在一起。他会说“是的，我明白。昨天，当我在那的时候，他已经说了，我想，我对他说，不是这样的，日期，不准确，不是那个……”

主体因此表现出对句子中的一切衔接、组织、从属和结构的完全掌握，但他所说的总是与他想说的相去甚远。你不会对他想说的东西是存在的这一事实有任何怀疑，但他从来没有设法在句子中给他所要表达的东西以语言上的化身。他围绕着它构建了整个句法语音的边缘，其复杂性和组织水平远远不能说明他对语言的关注度下降了。但是，如果你要求他提供一个定义，一个相当的术语，甚至还没有想走到隐喻的地步，如果你让他面对使用逻辑学称之为元语言的语言，或者关于语言的语言，他就没法跟着你。

在这种类型的紊乱和我们的精神病患者身上发生的事情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可比性。但是，当施列伯听到“*Factum est*”，然后便停止时，肯定有一种现象在临近性关系的层面上表现出来。临近性关系占主导地位，因为通过相似性来实现有意义的等同性的功能缺席或失败了。

我们也必须考虑到这一惊人的类比，在相似性和临近性这两个量规下，将一个对立面引入幻觉的主体中发生的事情中。在幻觉现象中，没有比通过指出被打断的言语的影响更明显地表明连续性在幻觉现象中的主导地位的了——被打断的言语恰恰是给定的，即投注的，比如说，力比多化的。强加在主体身上的是句子的语法部分，该部分仅凭借其意指特征和表达方式而存在。这就是强加在外部世界中的现象。

我所说的失语症患者是没有能力说到重点的。因此，这就会导致其出现明显的空洞的论述，奇怪的是，即使在最有经验的人身上，在神经学家身上，也总是引发紧张的笑声。在这里，你看到的是这样一个角色，他使用了大量的，非常清晰的巴拉巴拉，但他永远无法触及他所要传达的核心内容。在幻觉现象中凸显出来的临近性现象的不平衡，以及整个妄想的组织，与此不无关系。

通常情况下，我们在分析中注意的总是所指，因为这无疑是最有诱惑力的东西，也是乍一看似乎是精神分析的象征研究的真正层面。但当我们误认了能指的原始中介作用时，当我们误认了能指实际上是指导维度时，我们不仅使对神经症现象的原始理解、对梦的解释本身失去了平衡，而且我们使自己绝对无法理解精神病中发生的事情。

虽然分析调查的后期部分，即有关认同和象征的部分，是在隐喻的一边的，但我们不要忽视另一边，即发音和临近性，与这里勾勒出的是因果关系概念中的初始和结构化。与隐喻相反的修辞形式有一个名字，叫做转喻。它涉及对必须被命名的东西的替换——我们实际上是在名称的层面上。一个东西由另一个东西命名，那个东西是它的容器或它的部分，或与它有联系的东西所命名。

如果，使用语言联想的技巧，就像在实验室里练习的那样，你给一个实验对象一个单词，比如“茅屋”，他有不只一种回应方式。某些反应会出现在相邻的暂存位置中。“茅屋、烧掉

它”。另外，受试者可能会说小屋或小木屋，在那里我们已经有了同义词的对应，再往前一点我们就进入了隐喻，比如说洞穴。但也有另一种说法。例如，如果主体说茅草屋顶，那就不再是完全相同的东西了。它是茅屋一部分，这使它能够被指定为一个整体，在紧要关头可以谈论一个由三个茅草组成的村庄，意味着三个小房子。这里是一个隐喻的问题。主体也可以说是肮脏或贫穷。我们不再只有隐喻，我们还有转喻。

隐喻和转喻之间的对立是根本性的，因为弗洛伊德最初在神经症的机制中，以及在正常生活或梦的边缘现象的机制中引起注意的，既不是隐喻的层面，也不是认同的层面。而是相反的。一般来说，弗洛伊德所说的凝缩就是修辞学中人们所说的隐喻，他所说的移置就是转喻。整个意指装置的结构，语词的存在，对于神经症中存在的现象是决定性的，因为能指是缺席的能指表达自己的工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所指上时，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回到弗洛伊德的发现的起点。

下周我们将回到这个问题上，研究为什么在精神病中，这些象征运作最终完全占据了主体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失语症的机制——而在于与他者的某种关系是匮乏的、不足的。正是通过从主体与能指和他者的关系出发，通过不同层次的他者、想象的大他者和象征的大他者，我们可以阐明这种心理上的入侵，这种能指的入侵，它被称为精神病。

## 隐喻与转喻（二）

在引入相似性和临近性之间的对立时，我并不是说我认为精神病与失语症有任何的可比性。

我想说的不止这些。我从在失语症中被区分出来的两个层次的障碍中保留下来的是，它们之间存在着相同的对立，这种对立在隐喻和转喻中不再以消极的方式而是以积极的方式出现。

有人告诉我，这种对立使你们中的一些人陷入极大的困惑，你们一直在告诉自己说：“隐喻确实向我们展示了对立、分歧和困惑的重要性。”

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替换或思想与文字之间著名的、同样不可分割的对立。某个人，一位杰出的语法学家，写了一部杰出的著作，但这部著作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它那不幸的副标题——《表达思想的文字》，我希望你们再也不要再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了。

## 1

在这些所指的转移中，我们清楚地解释了隐喻的持续生命，我上次给你们举了一个例子，“他的禾束既不吝啬，也不怨恨。”

这里有一个隐喻的例子。人们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意义主宰了一切，突然之间，是意义一下子印在了主体上，他的禾束上，这种价值显示了它在慷慨地散布着自己，好像它这样做是出于它自己所意愿的意义一样。然而，能指与所指始终处于一种可以被描述为辩证关系的关系中。

你一定听说过人们谈论失语症，你也知道他们的语言格外活泼、快速，而且显然是流畅的，至少在某一点上是如此。他们对于一个主题的表达令人钦佩，但却无法说出这个词，同时他们用一整个的、极其微妙的句法衔接来达到他们舌尖上的名字或想准确指示的东西，但他们只能够绕着它转圈。

这里吸引人的是，尽管存在局部的语言无能，但主体的意向性依然存在。

人们声称，他们已经作为其相关因素揭露了精神病前期的某种知识方面的缺陷。这是向前迈出的一步，它将最初的大量概念进行了细微的调整，根据这个概念，它是一个无法被动地掌握语言图像的问题，这一步表明，这种障碍比第一眼看到的要复杂得多。但是，不管被试

表现出怎样的缺陷，只要我们不知道它们的机理和起源，就无法解决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主体反对对观察结果的解读，这些观察结果传达了一个特定的历史细节，关于一个日期，一个小时，一种行为形式。这时，主体就会拿出他的论述，不管它的特点是多么的紊乱和术语失语。如果他犯了错误，那仍然与他在开始对话的五分钟前所拥有的一个明确的历史细节有关。在这里，我们可以在话语部署的核心把握意向性的存在和强度，它永远无法再次赶上它。

从现象学的观点来看，感觉性失语症的语言是一种意译语言。术语失语症——这个词有点太强烈了——的特点是句子的发音和表达丰富而轻松，尽管它们最后会变得支离破碎。

意译是直译的反义词，后者意味着一切都是字面翻译。这意味着，如果你让他翻译，给一个同义词，重复同一个他刚刚说过的同一个句子，他是做不到的。他能够抓住你的话语，或者抓住他自己的话语，但评论一个话语是他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你从他那里得到的回答是那么生动，那么可怜，几乎是滑稽的，因为他想让别人听到他的话。如果你不笑，你就必须对这种现象本身感兴趣。

因此，这里有一个相似性紊乱，即主体没有能力去解释，因为他所说的完全是在意译的范围内。

除了感觉性失语症外，还有广义上的运动性失语症。它的范围从语法混乱——这一点众所周知——到极端减少他的词汇，主体无法摆脱的不朽的形象是著名的“铅笔”。失语缺陷的另一个维度可以很好地归入临近性紊乱的范畴。

在这里，它本质上是语言的清晰度，语言的句法，随着案例的规模和特定主题的演变，失语症逐渐恶化到使他们无法在复合句中来表达他们仍然能正确命名的东西。他们保留了命名权，但失去了命题权。他们无法构建命题。

在某种程度上，语言学家已经成为这种幻觉的受害者。例如，他们对隐喻的强调就是证明，对隐喻的研究一直比对转喻的研究多得多。在完整而生动的语言中，它是最扣人心弦的，但也是最有问题的，当语言设法通过说别的东西来表达的时候它自己，如何产生最有效的情況？这确实令人着迷，与一个天真的概念相反，甚至有人认为这是通往语言现象核心的途径。

天真的观念认为，事物的秩序与语词的秩序之间存在着一种叠加，就像一种回溯。它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进步，说所指只能通过另一个所指、通过引用另一个意义来达到它的目标。这仅仅是第一步，人们不知道还需要第二步。必须认识到，如果没有能指的结构，意义的移情就不可能。

你们中的许多人在上节课正确地看到，这就是我强调隐喻中能指的作用的时候想说的。

## 2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欠缺的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意向意义与能指装置之间的联系消失了。后者总的来说是被主体保留的，尽管主体没有掌握它与他的意图的关系。第二个则是与能指的内在联系的分解。这里强调的事实是，有一种退行性的分解，杰克逊的理论充分解释了这一点，根据该理论，在发展中语言不是不能还原为理想的婴儿的初级语言的，它是功能通过一个真正的转向，按其习得的相反顺序分解。

对我来说，这就是我想强调的吗？

我说不，不是的。根据一种关于语言中发生的一般错觉的法则，重要的不是出现在前景中的东西。重要的是两种连接之间的对立，而这两种连接本身就是在能指内部的。

首先是位置的连接，它是我之前所说的命题连接的基础。这就是在给定的语言中所建立的基础维度，也就是语词的顺序。要理解这一点，只要记住法语中的“Pierre bat Paid”并不等同于“Paid bat Pierre”。



关于第二种形式的失语症，请注意在保持语言的位置功能与保持足够的术语储备之间存在着严格的一致性。这是一个绝对不容置疑的临床现象，它向我们展示了能指的基本锚定。

在语法层面上以位置联系为特征的内容在各个层面上重新出现，它们建立了术语的共时共存。

语音是它的最高形式。在较低的层次上有一个词，它有一种稳定的气氛，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它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挑战。虽然这个词的独立性从一定的角度表现出来，但它不能被认为是激进的。即使语词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基础形式，但也绝不能被视为语言的一个单位。在更低的层次上，你会发现音素上的对立或耦合，它们是区分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根本要素。

例如，在法语中，“boue”和“pou”是对立的，不管你的口音如何。即使因为你住在边境附近，你倾向于把“boue”发成“pou”的音，你也会把另一个“pou”发成不同的音，因为法语中这种对立是有效的。在其他语言中，有些对立在法语中完全不存在。这种对立面的结合对于语言的运作至关重要。它必须与牵涉到语言功能的相似性联系区分开来，后者与替换功能的不确定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而替换功能只有在位置关系的基础上才是可以想象的。

这个隐喻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意义，它应该是从布兹那里转到禾束上的。我欣然承认，有人可能会反对我说，“布兹的禾束”是转喻，而不是隐喻，在这首华丽的诗歌背后，是布兹的皇家阴茎，而且其从未直接命名。但这并不是使这块羊皮纸具有隐喻性的原因，而是隐喻被置于主体的位置，置于布兹的位置。这是其参与其中的一种能指现象。

让我们转到诗意隐喻的极限，你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描述为超现实主义，尽管我们不必等待超现实主义来制造隐喻。你无法说这是否有意义。我不会说这是最好的说法，但是，无论如何，这已经差不多了。

拿一个我们都同意的表达方式来说吧，它确实是一个隐喻。无论感觉是否在维持它，你也会看到这一点。

“爱是一颗在阳光下笑的鹅卵石。”

这是什么意思？这无疑是一个隐喻。如果它诞生了，那很可能是因为它包含了某种意义。至于找一个意义……我可以在这做一个完整的研讨会。这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这是对爱无可争议的定义，我会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停下来，因为对我来说，如果一个人想要避免无休止地陷入无法弥补的困惑，它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简而言之，隐喻首先是由位置表达来维持的。即使最矛盾的形式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相信，你们没有人没有听说过我们当代的一位诗人在“一个字换另一个字”的名义下进行的一种练习。这是让·塔迪厄的一部小喜剧。它是关于两个女人之间的对话的。一个人被宣布了，另一个走到她面前说：“我亲爱的，我最爱的，自从我有个徒弟给你喂糖以来，你已经吃了多少石子了？”“唉，我亲爱的，”另一个人回答说，“这些我的三个最小的油渣饼，我自己也是非常不重视的。”

这证实了，即使它是一种矛盾的形式，它不仅保持了意义，而且倾向于以一种特别幸运和隐喻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可以说，这种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更新。无论诗人如何努力将其推向示范的方向，每时每刻都与诗意的隐喻相去甚远。它属于一个语域，与一旦包含强大的意义就出现的自然诗歌没有什么不同。

重要的不是相似性应该由所指来维持——我们总是犯的这个错误，而是所指的转移只有通过语言的结构才是有可能的。所有的语言都暗示着一种元语言，它本身就是一种元语言。因为所有的语言都有可能被翻译，这意味着隐喻和元语言，语言言说语言。所指的转移，对于人的生命是如此重要，可它只有通过意指结构才能实现。

一定要记住，语言是一个位置连贯的系统，其次，这个系统以一种非凡且可怕的多产性在

它自己内部复制自己。“冗长”和“增殖”是同一个词，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冗长是一个可怕的词。所有语言的使用都会引起恐惧，让人望而却步，这表现为对理智的恐惧。人们说，他太理智了。这就为语言恐惧提供了借口。事实上，你可以观察到，当一个人错误地给予所指太多的权重时，就会咬文嚼字，而正是在进一步走向能指的独立和死亡所指的方向，所有的逻辑结构操作才会发挥其全部作用。

至少对于我们感兴趣的现象来说，我们总是会陷入咬文嚼字，因为我们会进一步依附于我所说的“意义的神话”。另一方面，数学使用了一种纯粹的能指语言，一种卓越的元语言。它将语言简化为它的系统功能，在此基础上建立另一个系统，在其表达中抓住前者。这种做事方式的有效性在它自己的范围内是毋庸置疑的。

### 3

当你读到修辞学家的文章时，你会意识到他们从来没有对隐喻或转喻给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定义。

这就引出了，例如，转喻是一种贫乏的隐喻这种说法。有人可能会说，事物是与意义完全相反的，转喻从一开始就存在，它使隐喻成为可能。但隐喻与转喻属于不同的层次。

让我们来研究最原始的现象，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对我们分析师来说，这个例子特别鲜活。还有什么比弗洛伊德对他的小女儿的描述更原始的呢？安娜，她在分析中占据了一个很有趣的位置。

安娜·弗洛伊德睡着的时候，你看，她纯粹在睡梦中说的话：“大草莓，树莓，蛋糕，粥。”

这里有一些东西看起来像纯粹状态下的所指。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转喻形式。毫无疑问，她想要这些草莓，这些树莓。但这些物体是否应该同时存在并不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它们在那里，并列在一起，事实是，这个命名的衔接是由于位置功能所协调的，其将它们置于一个等价的情势中。这就是本质现象。

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无可争议地证明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表达现象的问题——就像荣格所说的——心理学可以让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虚构的物体所吸引的替代品，那么这句话的开头是什么？名字是安娜·弗洛伊德。她是一个19个月的婴儿，而我们正处于命名、等价、名义协调、符号衔接这样的层面。只有在这个框架内，意义的转移才有可能。

这就是弗洛伊德思想的核心。他的作品从梦开始，它的凝结和移置的机制，这些形态都是转喻的秩序，在这个基础上隐喻才能够介入。

在语言的侵蚀层面上，这一点更加明显。如果说习得有一个顺序，那肯定不是说孩子是从语言库的某个元素开始的，而不是从其他元素开始的。这里有最大的多样性。人们不会从语言的一头开始，就像某些画家从左上角开始作画一样。语言要诞生，就必须始终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另一方面，为了它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被把握，它必须在一开始通过能指的方式被把握。

人们谈到儿童语言的具体性质。那是一种与表象相反的东西，我指的是临近性。最近，有个人向我吐露了他的孩子说过的话。那是一个两岁半的男孩，当他的母亲俯身向他道晚安时，他一把抓住母亲，对她说：“我的大女儿，屁股和肌肉发达。”

这种语言显然与他的那既不吝啬也不怨恨的禾束不同。这个孩子还没有那样做。他也没有说爱是阳光下笑着的卵石。我们被告知，儿童能理解超现实主义和抽象诗歌，这将对童年的回归。愚蠢的孩子们讨厌超现实主义诗歌，觉得毕加索的某些阶段的绘画令人厌恶。为什么？因为他们还不擅长隐喻，只擅长转喻。

当他们欣赏毕加索画作中的某些东西时，那是因为其中涉及到转喻。

我们也可以在托尔斯泰的某些段落中看到转喻，每当一个女人靠近时，你会看到苍蝇的影子，上嘴唇上的一个斑点，这些东西在她的位置上出现。这是一个伟大的文体学家的转喻过

程。总的来说，与象征风格和诗意语言相反，转喻激活了这种被称为现实主义风格的创作风格。其对特征细节的推崇并不比其他任何东西更现实。只有非常特定的路径才能使细节成为其所需要的功能的指导，而不是任何细节都可以提升为整体。

这一点的证明是，我们在迷宫的实验中，通过一系列重要的移情，去强调其中的某些细节，旨在引出我们所说的动物的智力——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智力——这只是一个定义的问题。这是一个扩展现实领域的问题，只要对它在本能上、力比多上有兴趣，我们就可以把具有当前辨别能力的动物纳入其中。

所谓的以细节描述真实的现实主义只能在有组织的能指的记录中是可能想象的，由于这个事实，母亲是我屁股和肌肉发达的大女儿，孩子将以某种方式进化。很明显，作为他早期转喻能力的一个功能，在某个时刻，屁股可以成为他母亲的等价物。无论我们可以从何种意义上设想生命层面的敏感化，它绝对不会改变问题中的任何东西。

正是在转喻的基础上，这种现象才得以发生。能指的协调必须是可能的，只有这样才能发生所指的转移。能指的正式表达在所指的移情方面占主导地位。

我们现在该如何提出这个问题，即干扰与他人的关系对语言运作的影响。就像隐喻和转喻是相互对立的一样，言语的基本功能也是相互对立的。

为什么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是必要的？他们有什么区别？这是与第三项有关的事情。如果人类有必要使用语言来进行发现或了解自己的方向，那么这就是他在他者面前分解的自然倾向的一种功能。

他是如何使自己平静下来的？我们将在另一个场合回到这一点，但在施列伯提出的现象中，你已经掌握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范畴。

我上次和你谈过打断的句子，但这也有问答。这必须被理解为具有与言语的基础相对立的价值，在言语的基础中，一个人不询问另一个人的意见。提问和回答的功能，就其通过语言的启蒙而被赋予价值、作为其补充和根源而言，揭示了言语的意义基础。此外，妄想现象在所有层面上都暴露出意指的功能。

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你知道那些施列伯的妄想中给出的这些著名的等价物是由在暮色中从天空中游行的鸟制定的。在这里可以找到“Santiago”、“Carthago”、“Chinesenthum”或“Jesum Christum”的共鸣。这一切的荒谬是要保留的吗？令施列伯震惊的是，天上的鸟儿是无脑的。对于这点，弗洛伊德深信不疑——这些鸟都是女孩。

但重要的不是谐音，而是相邻的区分要素之间的逐项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在德语语言系统中只对施列伯这样的多语者有意义。

施列伯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再次表明，他所寻求的是能指的秩序，即音素的协调。正如我们所知，这里的拉丁语词“Jesum-Christum”与“Chinesenthum”仅在德语中的结尾转音中具有特定音的情况下才是等效的。

推动能指本身的这一始终隐藏的亚结构——即转喻——的出现，是对神经症和精神病中的语言功能障碍进行任何可能研究的条件。

在我对癔症、强迫性神经症等病例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我经常不得不处理一些零碎的回忆，这些回忆从病人童年的最初几年起就一直留在他们的记忆中。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致病的关键必须归于对那个时期生活的印象。但无论如何，童年记忆的主题必然会引起心理学上的兴趣，因为它们使儿童和成人的心理功能之间的基本差异得到了惊人的缓和。没有人会质疑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童年最早的经历在我们的思想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然而，如果我们在记忆中确定哪些是注定要影响我们一生的印象，结果要么是什么都没有，要么是相对较少的孤立的回忆，这些回忆往往具有可疑的或神秘的重要性。只有从第六或第七年开始——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在第十年之后——我们的生活才能作为一连串的事件在记忆中重现。然而，从那时起，经验的心理意义与它在记忆中的保留之间也有了直接的关系。凡是因其直接或当局的后续影响而显得重要的，都会被回忆起来；凡是被判断为不重要的，都会被遗忘。如果我在一个事件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能记得它，我就会把它保留在我的记忆中作为当时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证据。我对忘记一些重要的事情感到惊讶，而我对记住一些明显无关紧要的事情，也许会感到更加惊讶。

只有在某些病态的心理条件下，正常成年人对事件的心理意义与其在记忆中的保留之间的关系才不再适用。例如，歇斯底里者习惯性地对某些或所有导致他发病的经历表现出健忘，而这些经历对他来说已经变得很重要，除了这个事实之外，它们本身可能也很重要。在我看来，这种病理性失忆和影响我们早期生活的正常失忆之间的类比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它表明神经症的心理内容和我们的幼儿期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对这种对童年印象的记忆的缺乏是如此习以为常，以致于我们常常忽略了其背后的问题，并倾向于把它解释为儿童心理活动的基本特征的不言自明的结果。然而，实际上，一个正常发育的三四岁的孩子在进行比较和推理以及表达自己的感受时，已经表现出了大量高度有序的心理功能，而且也没有明显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失忆会压倒这些心理行为，更何况这些行为的重要性并不亚他后来的心理行为。

在处理与童年早期记忆相关的心理问题之前，当然有必要通过对相当多的正常成年人进行问卷调查来收集材料，并发现他们能够从这些早期历程中产生什么样的回忆。1895年，亨利夫妇向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他们寄来了一份由他们起草的调查问卷。1897年，两位作者发表了他们的问卷调查结果，其中有123人的回答具有高度启发性。目前，我无意从整体上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将满足于强调几个要点，这些要点将使我能够介绍我称之为“屏幕记忆”的概念。

最早的童年记忆的内容通常要追溯到2岁到4岁这段时间（亨利夫妇观察到的系列中有88人就是这种情况）。然而，有些人的记忆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过去——甚至可以追溯到他们1岁结束之前。另一方面，有些人最早的记忆只能追溯到他们6岁、7岁甚至8岁。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还有什么与这些个体差异有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亨利夫妇说，一个人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他非常幼小的年纪——也许是他生命的第一年——他还会把以后几年的记忆进一步分离出来，他将能够从更早的时间点（大约5岁）以连续链条的形式重现自己的经历，而其他则不可能，因为他们的第一记忆来自更晚的时间。因此，对于某些人来说，不仅是最初记忆出现的日期，而且可能是记忆的整个功能会比较先进或迟钝。

人们对这样一个问题特别感兴趣：这些最早的童年记忆通常是什么内容？成年人的心理必然会让认为，那些经历会是被选为值得记住的经历，那些唤起了一些强烈的情感的经历，那些由于其后果，在发生后不久就被认为是重要的经历。事实上，亨利夫妇收集的一些观测

似乎满足了这一期望。他们报告说，童年第一记忆最常见的内容一方面是关乎耳朵、羞耻、身体疼痛等的场合，另一方面是诸如疾病、死亡、火灾、兄弟姐妹的出生等重要事件。因此，我们可能倾向于假设控制记忆选择的原则在儿童和成人中是相同的。尽管这一事实值得明确提及，但这是可以理解的。从童年时期就保留下来的记忆必然能证明吸引孩子和成年人的兴趣之间的差别。这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例如，一名妇女报告说，她记得她的娃娃在她两岁时发生了许多事故，但她不记得她可能在同一时期观察到的严重和悲惨的事件。

然而，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与我们的预期完全相反的事实，这不得不使我们感到惊讶。我们听说，有些人对童年最早的回忆与日常和无关紧要的事件有关，这些事件即使在儿童身上也不会产生任何情感影响，但却能在每一个细节上被回忆（有人甚至说得太清楚了），而大约是现在的事件，即使根据他们父母的证据，这些事件在当时对他们有强烈的影响，也没有保留在他们的记忆里。因此，亨利夫妇提到了一位语言学教授，他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三到四岁，那里有一张摆着饭的桌子，桌子上有一盆冰。与此同时，他的祖母也去世了，据他的父母说，这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语言学教授，就像他现在这样，对这次丧亲之痛毫无记忆，对于那些日子，他所记得的只有那个冰盆。另一个人报告说，他最早的记忆是一次散步时，他从一棵树上折断了一根树枝。他觉得他还能认出事发地点。还有其他几个人在场，其中一个帮助了他。

亨利夫妇称这种情况很罕见。根据我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真的，这种情况对于神经症来说是相当常见的。亨利家族的研究对象之一试图解释这些记忆图像的发生，它们的无辜使它们如此神秘，他的解释在我看来非常中听。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的场景可能只是没有完全保留在记忆中，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它看起来如此缺乏启发性的原因：被遗忘的部分可能包含了所有让这段经历值得注意的东西。我可以证实这一观点的真实性，尽管我更愿意说这些经验的元素被省略而不是被遗忘。通过精神分析的治疗，我常常成功地发现了童年经历中缺失的那部分，从而证明，当记忆中只保留了一个主线的印象被恢复到完整的状态时，它实际上符合这样的假设：被回忆的是最重要的东西。然而，这并不能解释记忆在经验的各个要素中所作出的非凡选择。我们必须首先问清楚，为什么重要的东西恰恰被压制，而它们却以不同的方式被保留。在我们对这些过程的机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之前，我们无法找到对此的解释。然后我们将形成一个概念，即两种精神力量在产生这种记忆中的过程是相互关联的。

其中一种力量把经验的重要性作为记住它的动机，而另一种力量——抵抗——试图阻止任何这种偏好表现出来。这两种对立的力量并没有相互抵消，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无论其自身是否有损失）压倒另一种力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折中，有点类似于力的平行四边形的结果。妥协是这样的，作为记忆图像被记录下来的并不是相关的经验本身——在这方面，抵抗是有其自己的方式的：被记录下来的是另一个与令人不快的印象密切相关的心理元素，在这方面，第一原则显示了它的力量，这一原则努力通过建立可复制的记忆图像来固定重要的印象。因此，冲突的结果不是记住了原来的事件可以证明的记忆图像，而是产生了另一个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前者的联想图像。由于引起障碍的经验元素正是那些重要的元素，被取代的记忆必然会缺少那些重要的元素，因此很可能让我们觉得无足轻重。我们似乎无法理解它，因为我们倾向于寻找它保留在自身内容中的原因，而事实上，这种保留是由于它自身的内容与另一个被压抑的内容之间的关系所保持的。在我们中间有一种关于假币的说法，即假币本身不是金子做的，而是躺在金子做的东西旁边的。

有许多可能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一个心理内容被另一个所替换，而且这些案例是在各种心理结构中出现的。这些情况中最简单的一种显然是发生在我们这里所关注的童年记忆中的情况——也就是说，一个经验的基本要素在记忆中由同一经验的非基本要素来代表。它是一种移置到与其在临近性上相关的某物上的情况。或者，把这个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这是一个伴随着与其在（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的）临近性上相关的某物的压抑的替换的案例。我曾在别处描述过一个非常类似的替换现象，那是在分析一个患偏执狂的病人时发生的。这个女人产生了幻觉的声音，这些声音过去常常向她重复奥托·路德维希的小说《幸福》中的大段话。但幻觉所选择的段落是书中最琐碎、最无关紧要的那些。然而，分析表明，在同一本书中，还有其他一些段落激起了病人最痛苦的想法。痛苦的情感是对它们进行防御的动机，但进一步追求它们的动机又不能被抑制。结果是一种妥协，通过这种妥协，无辜的段落以毫无道理的强度和清晰度出现在病人的记忆中。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运作过程——涉及冲突、压抑、妥协的替换——又回到了所有的神经质的精神症状中，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些症状形成的关键。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在正常人的精神生活中找出同样的过程，那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而它在正常人身上影响的正是他们对童年记忆的选择，这一事实似乎又提供了一个迹象表明儿童的精神生活和神经症患者的心理材料之间所坚持的亲密关系。

正常和病理防御的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移置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据我所知，迄今为止还没有心理学家对他们进行过任何研究：它们是什么层次的心理活动和在什么条件下它们开始运作仍有待查明。这种忽视的原因很可能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就其是我们有意识的内在感知的对象而言，除了我们归类为“错误推理”的实例和一些旨在产生喜剧效果的精神操作的例子之外，都没有显示出这些过程。一种精神强度可以从一种表现（然后被放弃）转移到另一种表现（因此，后者扮演前一种表现的心理部分），这一断言对我们来说就像希腊神话的某些特征一样令人困惑——例如，据说众神给某人穿上美丽的衣服，就像戴面纱一样，而我们只会想到一张因表情变化而变形的脸。

对这些无关紧要的童年记忆的进一步调查告诉我，它们也可以以其他方式产生，在它表面的无关紧要背后隐藏着一种意想不到的丰富意义。但在这一点上，我将不会满足于一个简单的断言，而将给出一个具体的报告，在我看来，在相当多的类似的例子中，这是最有意义的。它的价值肯定会增加，因为它与一个完全没有或只有非常轻微的神症的人有关。

本文观察的对象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男子，现年 38 岁，虽然他自己的职业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域，但自从我通过精神分析解除了他的轻微恐惧症后，他就对心理学问题产生了兴趣。去年，他提请我注意他的童年记忆，这在他的分析中已经发挥了一些作用。在研究了 V. 和 C. 亨利所做的调查后，他给我提供了他自己经历的以下总结性叙述。

“我有相当多的童年早期的记忆可以支配，这些记忆的时间点非常确定。因为在我三岁的时候，我离开了我出生的小地方，搬到了一个大城市。所有这些记忆都与我的出生地有关，因此它们是从我二年级和三年级开始的。它们大多是短暂的场景，但保存得很好，并配有每一个感官感知的细节，这与我成年时的记忆完全不同，那些记忆完全缺乏视觉元素。从三年级开始，我的回忆越来越少，越来越不清晰，其中的空缺肯定超过一年。我相信，直到我第六年或第七年，我的记忆才会源源不断地涌来。我的记忆直到我离开我的第一个住所的时候分为三组。第一组是我父母后来反复向我描述的场景。关于这些，我不确定我是否从一开始就有记忆图像，还是我只是在听到这些描述之后才解释它。但我得指出，有些事情尽管我的父母经常把它们告诉我，但我还是记不住。我认为第二种更重要，因为据我所知，其中的一些场面我还没有听说过，而且有些场面确实是我不可能听说过的，因为自从这些场面发生以来，我就没有见过其他的参与者（我的保姆和玩伴）。现在到第三组，至于这些场面的内容以及它们所引起的被回忆的要求，我想说，我并不是完全不知所云。事实上，我不能断言我所保留的是那个时期最重要事件的记忆，或者我今天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比我小两岁半的妹妹是怎么出生的，以及我的离开，我第一次看到铁路和在此之前的漫长的马车旅行——这些都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痕迹。这些，你们会记得，是在分析我的恐惧症时出现的。但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我脸上的一处伤，这当时造成了大量的失血，为此我不得不

让外科医生给我缝了几针。我还能感觉到这次事故留下的疤痕，但我不知道这是直接还是间接地指向它的，我当时可能还不到两岁。”

“由此可见，我对这前两组的图像和场景并不感到惊讶。毫无疑问，它们是被取代的记忆，其中的基本要素大部分已经被忽略了。但在其中的一些项中，我至少已经暗示了这一点，而在其他一些中，我很容易通过遵循某些指示来完成它们。通过这样做，我可以在分开的记忆片段之间建立一个健全的联系，并清楚地理解是什么使我的记忆中出现了这些特殊的事件。然而，这并不适用于第三组的内容，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讨论这一组的内容。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相当长的场景和几个较小的画面，我无法取得任何进展。这一幕在我看来是相当淡漠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它会在我的记忆中根深蒂固。让我来给你描述一下。我看见一块长方形的、坡度相当陡的草地，绿油油的，长得很茂密，绿色的草地上开着许多黄色的花——显然是普通的蒲公英。在草地的尽头，有一间小屋，小屋门前站着两个妇人，一个头上裹着手帕，另一个是保姆，正忙着聊天。三个孩子在草地上玩。其中一个是我自己（2到3岁之间），另外两个是我的表弟，比我大一岁，那里还有他们的妹妹，她几乎和我一样大。我们正在摘黄色的花，我们每个人都拿着一束我们已经摘好的花。小女孩有最好的一束。然后，好像我们——两个男孩——像达成了协议似的，朝她扑过去，抢走了她的花。她哭着跑到草地上，农妇给了她一大块黑面包作为安慰。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这一点，就把花扔了，急忙跑到小屋，要求也给一些面包。事实上我们得到了一些，农妇用一把长刀切面包。在我的记忆中，面包尝起来相当美味——这一幕就在这时停止了。”

“现在，这件事有什么理由证明它使我花费了这么多的记忆呢？我费尽了脑汁。重点是我们对那个小女孩的不愉快行为吗？黄色的蒲公英——一种我今天当然不喜欢的花——让我非常高兴吗？还是因为我在草地上疾驶，面包的味道比平时好得多，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我也找不到这个场景和我童年时对其他场景的兴趣之间的任何联系（我很容易就发现了这一点）。总之，在我看来，这一幕似乎有些不对头。花朵的黄色在整个场景中是一个不成比例的突出元素，而面包的美味在我看来似乎以一种近乎幻觉的方式被夸大了。我不禁想起我在一次滑稽画展上看到的一些画。这些画的某些部分，当然还有最不适合的部分，不是画出来的，而是三维的——例如，妇女的裙撑。好吧，你能不能指出什么办法来解释或解释我童年这段多余的记忆？

我想最好问问他，他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一直在回忆这件事的。他是否认为，这件事是从他的童年时代起就周期性地出现在他的记忆中的，还是也许是在后来的某个时候，在某个可以回忆起来的场合中出现的。这是我解决这个问题所需要的全部，其余的是我的合作者自己找到的，他在这类工作中不是新手。

“我还没有考虑过这一点，”他回答说，“既然你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段童年的记忆在我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出现过。但我也能回忆起导致我恢复这个和其他许多早年童年回忆的事件。当我十七岁上中学时，我第一次回到出生地过假期，住在我们从那遥远的日子以来一直是朋友的一家人家里。我很清楚，当时有多少印象使我不知所措。但现在我明白了，我必须把我的这一段大历史告诉你：它属于这里，而你的问题把它带过来了。所以，听。我的家庭本来很富裕，我想，他们在乡下的那个小角落里过着舒适的生活。在我三岁的时候，我父亲所在的工业部门遭遇了一场灾难。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我们被迫离开这个地方，搬到一个大城市去。接下来是漫长而艰难的岁月，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了。我在城里从来都感觉不舒服。我现在相信，我对我家附近美丽的树林一直有一种渴望，我曾经在那片树林里（我的一段回忆告诉我），几乎在我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我就从父亲那里逃走了。我17岁那年度过的那些假期，是我在乡下度过的第一个假期。我说过，我住在一个家庭里，我们是他们的朋友，自从我们搬家以来，他们在社会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可以把在那里生活的舒适和我们在城里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不过，再回避这个

问题也没有用了。我必须承认，还有别的东西有力地激发着我。我当时 17 岁，在我住的家里有一个 15 岁的女孩，我立刻就爱上了她。这是我少年时代的初恋，而且很强烈，但我完全守住了这个秘密。几天后，女孩去了学校（她也从学校回家过节），正是这种短暂相识后的分离使我的渴望达到了真正的高度。在我再次在的那片可爱的树林里独自漫步了好几个小时，把时间花在建造空中楼阁上。奇怪的是，我发现它们并不关心未来，而是试图改善过去。要是没有发生车祸就好了！要是我能留在家里，在乡下长大，长得像家里的年轻人——我所爱的兄弟们一样强壮就好了！要是我当初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就好了！终于和她结婚了一——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本应该和她亲密无间！当然，我一点也不怀疑，在我想象的情况下，我一定会像当时看上去那样热烈地爱她。一个奇怪的事情是因为我现在偶尔会见到她——她碰巧跟这儿的一个人结了婚——她对我特别冷淡。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每当我在其他地方看到黄色，我就被她穿的那件同样的颜色的衣服所影响。”

这听起来很像你的插话，意思是你不再喜欢普通的蒲公英了。难道你不怀疑女孩衣服的黄色和你童年场景中超级清晰的黄色花朵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吗？

可能。但它不是同样的黄色。这件衣服更像是一种黄棕色，像壁花的颜色。但是，我至少有一个可以让您达到目的中间想法。后来，当我在阿尔卑斯山脉时，我看到了一些在低地颜色较浅的花在高海拔地区颜色会比较深。除非我大错特错，在山区经常会发现一种和蒲公英非常相似的花，但它是暗黄色的，而且和我喜欢的女孩的衣服颜色完全一致。但我还没有说完。现在我来谈谈第二件事，它引出了我对童年的印象，而且它是在离第一件事不远的时候发生的。我 17 岁时重新回到我的出生地。在三年后的假期中，我去看望叔叔，再次见到了我最初的玩伴，还是那两个表弟，比我大一岁的男孩和与我同龄的女孩，他们出现在蒲公英的童年场景里。这家人和我们同时离开了我的出生地，在一个遥远的城市里混得很好。

你是否又一次爱上了——这次是和你的表妹，又耽于一套新的幻想之中了吗？”

“不，这次情况不同了。那时我已经上了大学，我是书本的奴隶。我没有多余的东西给我的表妹。据我所知，那次我没有类似的幻觉。但我相信，我父亲和我叔叔制定了一个计划，让我用我所学的深奥科目换取一个更有实用价值的科目，在学业完成后，在我叔叔居住的地方定居下来，并与我表妹结婚。毫无疑问，当他们看到我如此专注于自己的意图时，他们放弃了这个计划。但我想我一定知道它的存在。直到后来，当我成为一个新的科学工作者，被生活的紧迫性压得喘不过气来时，当我不得不在这里等了这么久才找到一个职位时，我有时才会想到，我父亲为我计划这桩婚姻是出于好意，是为了弥补当初那场灾难给我整个人生带来的损失。”

那么我倾向于相信，我们所考虑的童年场景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当时你正在为你每天的面包而奋斗——前提是，你能证实我的想法，即在这同一时期，你第一次与阿尔卑斯山相识。

“是的，是这样的：那时候登山是我允许自己享受的一种乐趣。但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马上就说。在你童年的场景中，最让你感到压力的因素是乡村的面包尝起来非常美味。显然这个想法几乎是幻觉。很明显，这个几乎等同于幻觉的想法符合你的幻想，如果你留在家里娶这个（穿黄色裙子）的女孩，你会过上的生活会怎样舒适，或者用象征性的语言来说，你晚年不得不为之奋斗的面包会有多甜。黄色的花也指向同一个女孩。但童年场景中也有些元素只能与第二种幻想有关——与你的表妹结婚。我觉得，用花换面包，来掩饰你父亲对你的阴谋倒还不错。你打算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想，去干一份挣面包和黄油的工作，是不是？

“看来我把两种幻想结合在一起了，一种是‘黄色’和‘乡村的面包’，另一种是扔掉‘鲜花’和‘真正关心的人’。这两种本可以让我的生活更舒适的幻想。”



是的。你把这两个幻想投射到另一个幻想上并让它们成为你童年的记忆。关于高山花卉的元素就像是一枚标明生产日期的印章。我可以向你保证，人们经常无意识地构思这些东西——几乎就像小说一样。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童年的记忆了，而只有童年的幻想。然而，一种感觉告诉我，这一幕并非伪造。怎么能是这样呢？”

一般来说，我们的记忆所产生的数据是没有保证的。但我愿意同意你的观点，即这个场景是真实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从无数类似的或其他类型的记忆选择了它，因为它的内容（它本身是无所谓的），它很适合代表这两个幻想，而这两个幻想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这种回忆的价值在于它在记忆中代表了后来的印象和想法，而这些印象和想法的内容是通过象征性的或类似的联系与它本身联系起来的，这可以适当地称为“屏幕记忆”。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会对这一幕竟然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你的脑海中感到任何惊讶。它不能再被认为是无辜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它旨在说明你的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两种最强大的动力——饥饿和爱的影响。

“是的，它很好地代表了饥饿，可爱情呢？”

我是在说花的黄色。但我不能否认，在你的这个童年场景中，爱情的表现远不如我以前的经验所预期的那样突出。

“不。你是错误的。它的本质是爱的象征。现在我第一次明白了。想想看！夺走一个女孩的花意味着使她失去花心。这个大胆的幻想和我第一次的羞怯和第二次的冷漠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我可以向你保证，年轻人的羞怯往往伴随着那种大胆的幻想。

“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转变成童年记忆的幻想不是我能记住且有意识的，而是无意识的？”

无意识的想法是有意识想法的延伸。你对自己说，“如果我嫁给了某某人”，在这种想法的背后，有一种冲动，想要对“结婚”的真正含义形成一个图像。

“现在我自己也可以继续了。对于一个小顽童来说，整个主题中最诱人的部分就是新婚之夜的图像（他会在乎之后会发生什么吗？）。但这个图像不能冒险出现在日光下：对这个女孩的缺乏自信和尊敬压抑了这幅画。所以它仍然是无意识的——”

“——并且悄悄成为了童年的记忆。你说得很对。它恰恰是粗糙的。幻想中的感官元素解释了为什么它没有发展成有意识的幻想，但必须满足于找到暗示它的方式，并在华丽的伪装下变成童年的场景。”

“可是我倒想知道，究竟为什么要变成童年的一幕呢？”

……也许是为了它的纯洁。你能想象出还有什么比赤裸裸的性侵犯和幼稚的恶作剧之间更大的反差吗？然而，还有一些更普遍的原因，在使被压抑的思想和愿望滑向童年记忆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你会发现同样的事情无一例外地发生在歇斯底里者身上。此外，似乎对遥远的过去的回忆本身是由某种快乐的动机推动的：“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这些。”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对蒲公英这个画面的真实性失去了一切信心。这是我的看法：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我的动机是非常现实的，可以理解的，我想到：“如果你娶了这个或那个女孩，你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快乐。”我脑海中的感性电流抓住了原语二中包含的思想并以某种能够给予同样感官的满足的形象重复它。这个思想的第二个版本仍然是无意识的，因为它与主导性的倾向不相容，但正是因为它仍然是无意识的这一事实，才使得它在现实情况的变化完全摆脱了意识版本之后，仍然在我的脑海中存在很久。正如你所说的，根据一条普遍的规律，那仍然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句子试图把自己变成一个童年的场景，正因为它是无辜的，所以它能够变成有意识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必须经历一个新的转变，或者说两个新的转变。其中一个转变是通过形象的表达它来消除原本中的不良因素，第二个转变则是将原

本状态强行转化为能够进行视觉表述的形式——它为此使用了“面包”和“面包和黄油的职业”的中间概念。我明白，通过制造这样的幻想，我可以说是实现了两个被压抑的愿望：一个是姑娘的贞洁，一个是物质上的舒适。但是，既然我已经把导致我产生蒲公英幻想的动机讲得如此完整，我就不得不得出结论，我现在要讲的是一件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它只是不合理地偷偷地出现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的。”

我明白我必须为它的真实性辩护。你走得太远了。你已经接受了我的断言：每一种压抑的这类幻想都会悄悄变成童年的场景。一旦找到了这种接触点——在本例中，它是脱去衣服，拿走花朵——幻想的剩余内容就会在每一个合法的中间概念的帮助下被改造——以面包为例——直到它能找到与童年场景内容的进一步接触点。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童年场景本身也经历了变化，我认为记忆的伪造肯定也会以这种方式产生。你的例子中，童年的场景似乎只是把它的一些线条刻得更深：想想过分强调黄色和面包的夸张美好。原料是可利用的。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不可能是这个特定的记忆，就不可能进入意识，而不是其他任何记忆。这样的场景不会在你的童年记忆中出现，或者也许其他人会想到这样的场景——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聪明才智是多么容易地建立起从任何一点到另一点的桥梁。除了你自己的主观感受之外（我并不倾向于低估这种感受），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你对蒲公英的记忆是真实的。它包含了一些你所告诉我的还没有解决的元素，这些元素实际上并不符合幻想所要求的感觉。例如，你的堂兄帮你抢了小女孩的花——你能理解有人帮助别人摘花的想法吗？还是农舍前的农妇和护士？

“我看不出来。”

所以幻想并不完全符合童年的场景。它只在某些点上以它为基础。这证明了童年记忆是真实的。

“你认为像这样对一段看似无辜的童年记忆的解释一般都适用吗？”

根据我的经验，经常是这样的。让我们自娱自乐一下，看看亨利给出的两个例子是否可以被解释为隐藏随后经历和愿望的屏幕记忆？我指的是关于一张为用餐而铺设的桌子上有一盆冰的记忆，这应该与当事人的祖母的死亡有某种联系，另一个记忆是，一个孩子在散步时从树上折下一根树枝，他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完成的。

他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我对第一个记忆一无所知。这很有可能是一个移置的案例，但中间的步骤是无法猜测的。至于第二种情况，如果当事人不是法国人的话，我应该准备给出一个解释。’

“差别很大，因为在屏幕记忆和它所隐藏的东西之间提供的中间步骤可能是一种语言表达。”在德语中，“掏出来”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粗俗用语，它指的是手淫。那么，这个场景将把手淫的诱惑放回童年早期——有人在帮助他做手淫——这实际上是发生在后来的事情。但即便如此，这也不合适，因为在童年的场景中有很多其他人在场。

而他自慰的诱惑肯定是在独处和秘密中发生的。正是这种对比使我倾向于接受你的观点，它又一次使场面显得无辜。当我们在梦中看到“很多陌生人”时，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种情况在我们裸体的梦中经常发生，我们感到非常尴尬。没有比秘密更多或更少的东西了，而秘密又是用它的反面来表达的。然而，我们的解释仍然是一个笑话，因为我们不知道一个法国人是否会认出一个典故，在“*casser une branches d'un arbre*”或一些适当修正过的短语中看出对手淫的暗示。

我尽可能准确地再现了这一分析，我希望它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屏幕记忆”的概念，即它作为记忆的价值不是归功于其本身的内容，而是归功于该内容与其他被压抑的内容之间存在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的性质，可以区分出不同类别的屏幕记忆。我们已经在被描述为最早的童年记忆中发现了其中两类的例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不完整的童年场景包括在屏幕记忆的标题下，这些场景由于其不完整的原因而显得无辜。可以预见的是，屏幕记忆也

将由与后来的生活有关的记忆的残留物一同生成。任何人只要记住它们的独特特征——即它们被非常清楚地记住，但它们的内容是完全无关的——就会很容易地从自己的记忆中回忆起许多这类例子。这些屏幕记忆中的一些涉及到后来的事件，其重要性要归功于与早期时期的经历的联系，这些经历一直被压抑着。这种联系与我所分析的案例正好相反，在这个案例中，童年的记忆是由后来的经历来解释的。屏幕记忆可以被描述为“倒退”或“向前推进”的，这具体取决于屏幕和被屏蔽的事物之间的时间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积极的屏幕记忆与消极的屏幕记忆（或难受的记忆）区分开来，后者的内容与被压制的材料有相反的关系，这个主题值得更彻底的研究。但我必须满足于指出，在我们的记忆存储中，有哪些复杂的过程——顺便说一下，这些过程与癔症症状的形成完全类似。

我们最早的童年记忆将永远是一个特别感兴趣的主体，因为本文开头提到的问题（即对我们整个未来最重要的印象通常不会留下记忆体的图像，这是怎么回事）导致我们思考一般意识记忆的起源。毫无疑问，我们首先会倾向于把作为本研究主题的屏幕记忆作为童年回忆残留物中的异质元素分离出来。至于其余的形象，我们也许可以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观点：它们是与一种经验同时产生的，是这种经验所产生的印象的直接结果，并且在这之后，它们按照我们所熟悉的复制规律，不时地出现。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里有某些特征与这一观点并不相符。首先，有以下几点。在大多数重要的和其他方面无可非议的童年情景中，主体在回忆中看到自己还是个孩子，知道这个孩子就是他自己，然而，他看待这个孩子，就像一个局外人看待他一样。亨利夫妇适时地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参与调查的人都明确强调了童年场景的这一特点。现在很明显，这样的一幅画不可能完全重复最初收到的印象。因为这个人当时正处于这种情况的中间，他注意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外部世界。

每当在记忆中，主体自己以这种方式作为其他对象中的一个对象出现时，这种行为和回忆的自我之间的对比可以被视为原始印象已被加工的证据。看起来好像童年的记忆痕迹在这里被转化为后来的可塑的和视觉的形式，即记忆被唤起的数据。但是，原始印象的复制品并没有进入主体的意识。

还有一个事实为这第二种观点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在一些关于重要经历的童年记忆中，所有这些记忆都具有类似的鲜明性和清晰性，会有一些场景，当它们被检验时（例如由成年人的回忆），证明是被伪造的。并不是说它们完全是编造的。它们的虚假之处在于，它们把一个事件转移到了一个没有发生的地方——亨利夫妇引用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此，它们或是把两个人合并成一个人，或是用一个人代替另一个人，或是这些场景作为一个整体有迹象表明是两个独立经历的组合。鉴于图像所具有的高度的感官强度和年轻人记忆功能的效率，单纯的不准确回忆在这里并没有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仔细调查表明，这些记忆的伪造是倾向性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为了压抑和替换令人讨厌或不愉快的印象。因此，这些伪造的记忆也一定是在生活的某个时期产生的，在那个时期，这类冲突和压抑的冲动有可能在精神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它们比它们的内容所属的时期要晚得多。但在这些情况下，伪造的记忆也是我们首先意识到的：记忆的原始材料——记忆的痕迹——在其最初的形式中仍然是未知的。

对这一事实的认识一定会消除我们在屏幕记忆和来自我们童年的其他记忆之间划分的界限。我们是否还有童年的记忆确实值得怀疑：与童年有关的记忆可能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我们的童年记忆向我们展示的不是童年的样子，而是在记忆被唤起的后期出现的样子。在这些被唤醒的数据中，童年记忆并没有像人们所习惯说的那样出现，即，它们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在形成这些记忆以及在选择记忆本身时，一些不考虑历史准确性的动机，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在弗洛伊德自己的著作中，时间和无意识之间所谓必要的分离仍然是可疑的。例如，在《释梦》一书中，弗洛伊德确定了对每个梦的构建至关重要的两种材料来源——婴儿时期的愿望和“日间的残留”。为了让婴儿期的愿望通过梦的媒介明显地展现出来，它必须依附于做梦者最近的清醒经历的碎片。与显性和隐性的梦的文本的区分相关的是，新鲜的记忆痕迹就像特洛伊木马一样对被压抑的童年欲望起作用。日间的残留物形成了明显、显性的梦的材料，它们现在是为了实现过去的愿望所必需的伪装。像画谜一样的显梦文本扭曲了这些过往的欲望，它们足以让它们逃避半睡半醒的自我的审查。同时，这一文本在“字里行间”留下了足够的暗示，以允许对源于被压抑的过去的潜在的、力比多的意义进行分析性的解释。

然而，如果说“日间的残留”不过是对婴儿期愿望的补充依恋点，那就错过了一个事实，即这些愿望本身是无力进入梦境的。虽然弗洛伊德明确地认为早期欲望在梦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但这些欲望依赖于一种催化剂，一种触发机制——即个人最近清醒时的生活。这确实是一种奇怪的统治形式：过去过度地决定了现在，只是因为现在无意为过去提供了某些合适的开口，即拥有与被压抑的内容相关联的材料。就其本身而言，由于负责维持压抑的审查制度的心理功能的原因，无意识的过去是无法直接表达的。基于此，弗洛伊德著名的将显性梦的文本与画谜进行的比较，其意义超出了弗洛伊德在此的隐喻的运用。

这些日间的残留就像各种各样的拼图，已经拼装在一起了，形成了一幅尚未完成的拼图画面的边缘。画面的其余部分，中间空的由拼图碎片组成的部分（被已经组装好的碎片所组成的边界所包围）仍有待填充，这些拼图可以放置在拼图的外框内，当然这样做的条件是它们与已经组装好的拼图相匹配。这种由外部碎片构成的空白空间，就像无意识的压抑空间，是一种无形且只有通过意识的细薄边缘勾勒出的负片轮廓/浮雕才能捕捉到的。换句话说，日间的残留作为最初可用的拼图碎片，梦和它的解释都是（作为个体现在的显在碎片）预先确定了拼图的出现顺序以及整个拼图的整体安排（显性和隐性梦的文本的结合，愿望及其表达，过去和现在）。弗洛伊德对梦解释所通常提议的时间顺序只能通过对梦的过程的微妙之处进行怪诞的抽象来维持。

在《释梦》出版的一年前，弗洛伊德在一篇简短的论文（这其中包含了他的自我分析的片段）中，讨论了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把过去的愿望和现在的愿望之间的相互作用——屏幕记忆的残余——凸显了出来。通过对他自己所谓的童年记忆的仔细检查（一个以他自己和一个朋友从一个小女孩手里抢花为中心的场景），弗洛伊德意识到，尽管他有意识地确定，构成回忆场景的视觉痕迹反映了来自早期生活的实际经验——这可能是捏造的或部分捏造的记忆。成年弗洛伊德现在的冲动以及无意识共同通过记忆结构这一渠道来表达一种被否认的欲望，这种结构的表面真实性使其能够绕过压抑。

为什么屏幕记忆在时间和无意识的讨论中如此重要？它们与梦的运作的日间的残留有什么区别？在关于这一类特殊记忆的文章的结语中，弗洛伊德指出：

我们是否还有童年的记忆确实值得怀疑：与童年有关的记忆可能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我们的童年记忆向我们展示的不是童年的样子，而是在记忆被唤起的之后出现的样子。在这些被唤醒的数据中，童年记忆并没有像人们所习惯说的那样出现，即它们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在形成这些记忆以及在选择记忆本身时，一些不考虑历史准确性的动机，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弗洛伊德提到的“唤醒期”类似于梦的运作的日间残留物。在个人最近的经历中，某些环境、事件和/或行为激活了早期的愿望和它们所对应的的被压抑的表象。然而，通过弗洛伊

德在“来自”——“重归”和“出现”——“形成”之间刻意建立的对比，在处理屏幕记忆和梦的运作之间的固化的表象时，一个重大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梦被解释为反映了婴儿时期的经验对成人生活的支配，而屏幕记忆则表达了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心理关系的辩证法——也就是说，过去只是以间接的、扭曲的方式在现在的升华框架下被恢复。换句话说，屏幕记忆中的影响轨迹是双向的。就像在梦中一样，被压抑的过去重新出现在有意识的材料的显在文本中，也就是说，过去塑造了现在。但是，同时，主体现在的背景数据回溯性地改变了据称影响这个同样的现在的过去（屏幕记忆中这第二种独特的动态的基本结构也在“延迟行动”的现象中是可见的）。当它被置于服从于其现实的主人——快感原则和现实原则——的精神装置手中时，记忆的实际内容是可塑的。因此，关于记忆的元心理学理论剩下了一个未完成的任务，那就是勾勒出这些内容形成的（时间）过程的结构。

对这个从屏幕记忆中得出的结论的直接反对意见是，弗洛伊德正在描述有意识的回忆。尽管前意识和有意识的记忆有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回眸”的回溯性扭曲——自我盲目地、不知不觉地改写了它的过去——但相关的被压抑的新事物仍然没有改变。屏幕记忆的编造正是为了帮助僵化了的无意识的内容。但是，即使弗洛伊德本人不愿意将屏幕记忆的时间动态的心理范围扩大到作为防御机制的有意识的助手的地位之外，也不应该阻止在这个方向的理论发展。事实上，在弗洛伊德自己的思想中，有两个重要的主题，尽管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尚未解决，但却表明了这样一种扩展。一方面，先前的经验对前者的永久影响，另一方面，相对于延迟行动的后遗而言，重新描述过去意义的持续能力。如何才能纠正这种潜在的差异？此外，弗洛伊德对心理主体的时间性的理解，其内部的这种未解决的矛盾是解开在治疗和理论层面上困扰精神分析的众多谜团的关键。

也许记忆的永恒之处并不像它的决定性内容那样，而仅仅是内容以决定性方式改变的过程的运动性。屏幕记忆和延迟行动表明，无意识材料的价值/意义被卷入了由主体生活历史中越来越多的材料的积累所激发的总是可能的回溯性的修正所带来的意义的延迟。当然，最初，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运作的一系列不确定的回溯性的移置效果，在个人生活的早期阶段就离开了某些时间坐标。然而，这些起源最好被认为是已经失去的，因为一旦它们被卷入心理时间性的定义中，其明确意义的中止就使得我们不可能无损地接触到它们。此外，在 1894 年弗洛伊德与约瑟夫·布雷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中首次瞥见的延迟行动，以及屏幕记忆的发现，这些都比 1900 年出版的《释梦》要早。仅此一点，就使任何试图将梦的心理过程与记忆的回溯效力分开的做法都变得可疑。此外，对日间残留物检查功能揭示了（无意识的）过去和（有意识的）现在之间的相同的相互依赖性。过去的材料在精神分析中无可匹敌的霸权的这一主题是对精神分析的根据的关键细节草率抽象的结果，而且弗洛伊德有时也会屈从于这种抽象。

目录：

- 1  $\$$
- 2 外密性
- 3  $A \rightarrow \$$
- 2  $a \diamond A$
- 5  $a \subset A$
- 6 没有“什么”的“那个”
- 7  $A/a, i(a)/a$
- 8  $a \diamond \Phi$
- 9  $A/-\phi$
- 10 对象  $a$

拉康从“亲密”一词中创造出“外密”一词，这个词在研讨会中出现了两三次，我们要把这个词转化为一种衔接，一种结构，把它当成一个  $S_1$  来使我们能够超越和克服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能指时首先经历的困惑。

## $\$$

对于分析师来说，只提及分析经验是虚幻的。因为弗洛伊德和拉康的著作也是我们与精神分析的关系的一部分。而我们对构成拉康研讨会的前十年主题的弗洛伊德文本的评论的共同阅读，与中世纪的授课方式并无不同。在那时，主人的授课要分为三个部分：字词、意义和箴言。字词是构建文本的层次，最合乎语法的层次；意义是所指的层次，是明确和容易理解的意义；箴言是对意义的深刻理解。只有在这个层次上的箴言才能证明其所评论的学科的合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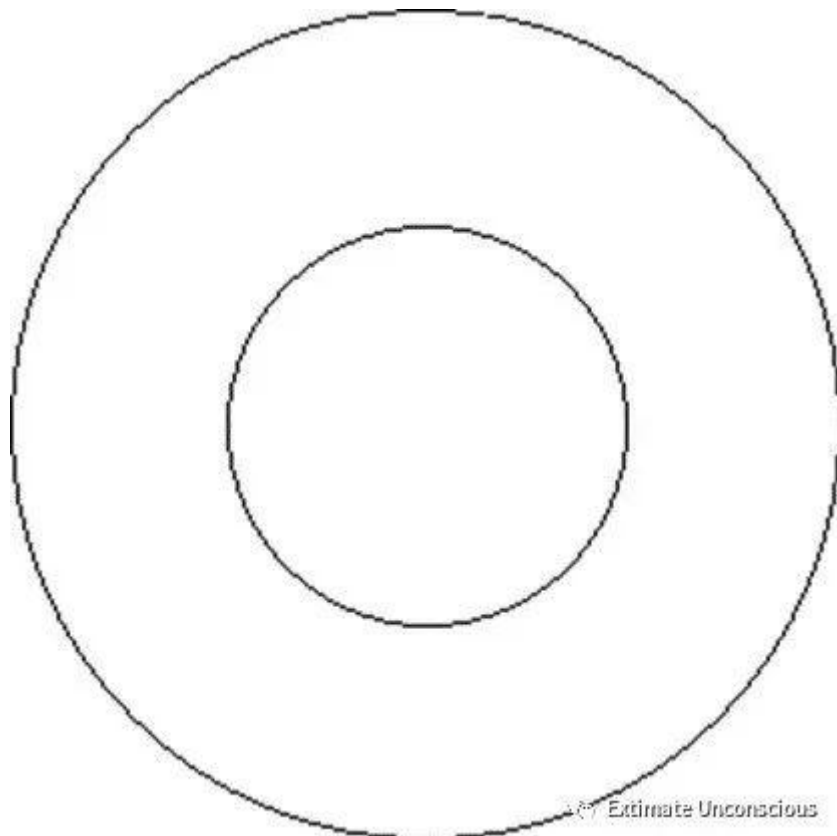
拉康的教学所带来的问题恰恰是，它的一个定项是对弗洛伊德的评论。此外，在他自己的说法中，拉康制定了格言或金言（在中世纪，这个词也意味着“普遍的地方”）。因此，他不允许他人选择拉康必须重复的内容——这是因为他将自己的思想形式化，用简单——或者是至少看起来简单的——的公式表达出来。因此，“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以及“能指对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都是拉康的金言。目前，我们的部分任务是把这些句子加以筛选，把它们收集起来编成一个“句集”。我们之所以对拉康这样做，是因为他似乎把自己呈现为中世纪意义上的作者，也就是说，一个知道他在说什么的人。

然而，他有句话说拉康并不是一个作者，他的作品是一种教学。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知道，追随他的明星要求我们不要把这种教学同步化和教条化，我们不要隐藏而是要强调它的矛盾、它的反义、它的僵局和它的困难。因为，关于分析性经验的教学就像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它意味着在文本和经验之间的来回运动。

## 外密性

为什么是这个标题？首先，因为去年我把注意力放在了收集、发展、阐明拉康教学中的四级结构上。因此，在我看来，必须把外密性形式化，并在这些结构之外加以处理。第二，我不能无视外密性的这个问题，因为我特别致力于研究象征中的实在的问题。碰巧的是，外密性是拉康用来以一种有问题的方式指定象征中的实在的术语。第三，在我看来，这个术语有很大的结晶潜力。当从这个出发点重新考虑分析经验和拉康教学的问题时，人们确实意识到，我们的实践所提出的一些零散的问题落到了实处。第四，外密性的这种表达对于摆脱对一种称其位于内部和外部之间的两分法的精神主义的普遍狂欢来说是必要的。

然而，让我们对这最后一点加以限定，因为仅仅说这种二分法不令人满意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阐述一种关系来代替它。事实上，我们很容易陷入这种内部-外部的二分法，为了我们自己的使用，我们需要用另一种关系来代替它，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关系，我们将用下面的图来表示：



拉康这个非常简单的图示意图意味着，外部存在于内部之中。最内部的东西——这就是字典中对“亲密”的定义——在分析经验中，有一种外在性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拉康发明了外密性这个词。这个词的确还没有流行起来。但如果有一点努力和运气，它也许会在几个世纪后出现在法兰西学院的词典里。

应该注意的是，“内部”是一个比较级，它来自拉丁语，其中“隐秘”是最高级的。在那里，语言有一种努力，以达到内部的最深处。让我们也注意到，词典中引用的文学作品表明，人们通常不断地说，最亲密的同时也是最隐秘的。因此，矛盾的是，最亲密的不是一个透明点，而是一个不透明点。而这种不透明的点通常被用来证明某些掩护的必要性，最常见的是宗教掩护，正如我们所将要看到的那样。

##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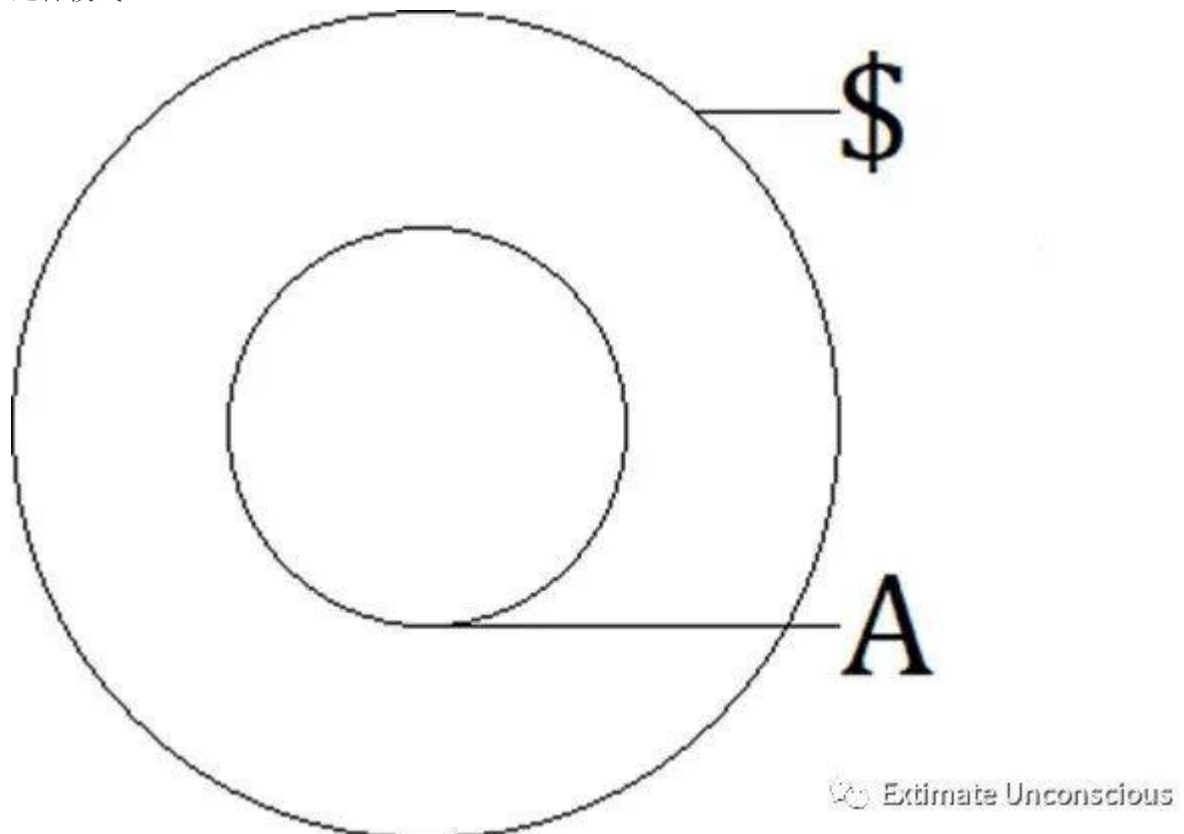
外密不是亲密的反面。外密说的是，亲密是像一个异物，一个寄生的大他者一样的。在法语中，“亲密的”一词的诞生时间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例如，它可以在塞维涅夫人的信件中找到，这是一个“亲密”的典范，其中有一个错误的句子：“我忍不住要告诉你所有这些细节，在我心中的亲密和爱，就像一个人对一个女仆卸下自己的负担，她的温柔是无可比拟的。”法语中最早出现的“亲密”一词已经与一种对充满柔情的人的心灵的表白有关，这难道不迷人吗？

在精神分析中，我们似乎从一开始就很自然地把自己放在亲密关系的登记簿上，因为没有比分析更亲密的经验了，分析是在私下进行的，它需要信任，需要尽可能地完全没有约束，以至于在我们的咨询室里——这些为亲密的忏悔保留的地方——来访者虽然在别人的家里，有时却表现得好像他们在自己家里一样。当这样的来访者在走到分析师的门口时，从口袋里拿出自己家的钥匙，就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分析师是他的分析对象的亲密朋友。恰恰相反，分析师是这种亲密的外密。也许这表明，一个人不可能有自己的房子。也许正是因为处于这一精神分析的外密性的地位，使得犹太人在精神分析史上的角色，如此独特而持久。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使用外密这个词，我们可以使它等同于无意识本身。在这个意义上，主体的外密就是大他者。这就是我们在《被窃的信》中所发现的，拉康说到“这个他者，我对他的依恋超过了对我自己的依恋，因为他搅动了我对我自己的身份认同的核心”——在这里，他者的外密性与主体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的动摇联系起来。因此，A→\$的书写是合理的。

这一的外在性有一些封皮，其中一个是宗教的。因此，圣·奥古斯丁把上帝说成是“内部的，比我的内心更内部的。”上帝这个词涵盖了这个本身并无可爱之处的外密点。这意味着此种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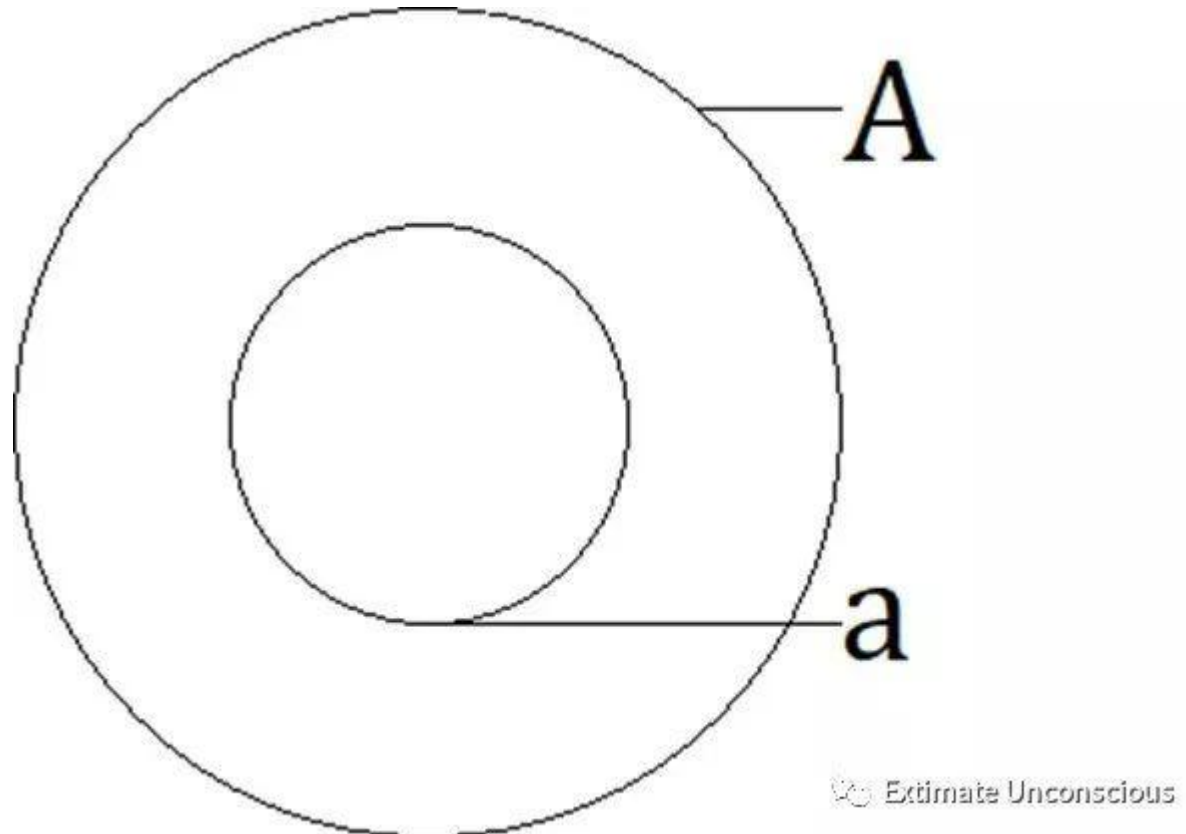


其中，主体的圆圈包含了作为其亲密性中最亲密的大他者的外密性。在某种程度上，当拉康把无意识说成是大他者的话语时，这就是他所说的，这个比我的亲密关系更亲密的大他者在搅动我。拉康用一个词来表达这种大他者的根本性的亲密性：外密性。

我们可以将这个术语应用于精神病诊所，并把男人的自动症称为“外密性的自动症”，因为它以明显的方式表现出大他者的在场以及在它亲密中心的话语。有趣的是，在分析诊所里，总是在外密性如期到来的时候，分析师才会对诊断产生犹豫，例如在强迫症和精神病之间，尽管他在其他方面对两者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区分。对于言说的存在来说，外密性确实是如此的结构化的，以至于没有一个分析师可以说他从未遭遇到过它——即使只是在他自己的犹豫的经历中。

$a \diamond A$

现在让我们引入一个与此前不同的维度，把小  $a$  当成大他者的平移。结构是一样的，但这一次，外部的圆圈是大他者的圆圈，中央的区域，即外密的区域，由  $a$  占据。



这不是对此前模式的否定，而是对同一结构的重新使用，它回应了另一种考量。在我们的论证中，到此为止，我们一直把大他者的概念作为明显的东西来使用。现在，外密性的问题导致我们对这一概念提出问题，提出大他者的异在性问题，即大他者为什么真的是“他者”？

“什么是大他者的大他者？”这是拉康提出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以便为他者的异在性提供依据。说这个异在性是主体并不会让我们走得很远，因为分析经验的主体什么都不是，它是一个被禁止的功能。

拉康的第一次尝试是假设能指的大他者是法的大他者。这个假说在他关于精神病的文章的结尾。会有一个大他者为大他者立法。这将意味着一种元语言的存在，它将是法，因为法作为绝对的东西，是一种元语言。

后来，拉康在反思中说，恰恰相反，“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不存在元语言”。这是对谁说的呢？他是对之前的拉康说的。因此，没有理由将理性的努力与教条化混为一谈。让我们注意，这个著名的格言：“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意味着对“父之名”的贬低和复数化。但它也暗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大他者的异在性的基础。事实上，这个大他者，如果不是一个普遍的功能，一个抽象的东西，那又是什么？例如，佐佐木神父的反应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告诉我们，这种抽象在日语中似乎是不可能的，在日语中没有大他者，而是有各种类别的异在性和多元性。

我们通过宗教的封皮所体验到的大他者是全能的。在基督教中，它正是被称为邻人的东西。它是一种使外密性无效的方式：它是以共同的东西为基础，它是以符合一致性的东西为基础的。它从根本上说，普遍的，属于这种一致性。但是，如果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那么大他者的外密性的基础是什么？

在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的时候，原乐恰恰是大他者的异在性的基础。正是在它与原乐的关系中，大他者才是真正的大他者。这意味着，没有人能够从能指那里得到大他者的异在性的基础，因为能指的法则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总能替代另一个，反之亦然。能指的法则确实是1-2的法则，在这个层面上，仿佛有一个民主、平等、社群的和平原则。现在，我们试图看到的是，是什么让大他者成为他者，也就是说，是什么让大他者成为特殊的、不同的。在这种异在性的维度上，我们发现了战争。例如，在种族主义中——它恰恰是一个与大他者的关系问题——在其差异性中被设想。在我看来，任何以“我们都是同胞”为主题的慷慨而普遍的论述都没有对这个问题产生任何效果。为什么呢？因为种族主义唤起了一种仇恨，而这种仇恨恰恰是指向大他者的异在性的基础，换句话说就是它的原乐。如果任何决定、任何意志、任何推理都不足以消除种族主义，那确实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大他者的外密性之上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本身是针对同胞的想象中的侵略性的问题。种族主义是建立在一个人对大他者的原乐的想象之上的，它是对特殊方式的憎恨，是对大他者自己的体验原乐的方式的憎恨。我们很可能认为种族主义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的伊斯兰邻居在开派对时太吵了，然而事实是，真正的问题是他以一种与我们不同的方式获得他的原乐。因此，大他者的接近加剧了种族主义：一旦有了接近，就有了不相容的原乐模式的对峙。因为当一个人的邻人离我们很远的时候，爱他是很简单的，但在接近的情况下则是另一回事。种族主义的故事总是关于他者获得“剩余享乐”的方式：要么他不工作，要么他工作得不够，要么他无用，要么有点太有用了，但不管是什么情况，他总是被赋予了一部分他不配拥有的价值。因此，真正的不容忍是不容忍他人的原乐。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种族确实存在，但它们的存在，用拉康的话来说，是话语的种族，即主观立场的传统。

### **aCA**

人们通常会强调，在大他者中，什么是主体。例如，当拉康说到“假定认识的主体”时，似乎没有什么困难：有一种方式是使大他者成为主体。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另外一些东西，即在大他者中什么是对象。我们将从拉康的两个研讨会《精神分析的伦理学》和《转移》中发展这一点。

《伦理学》中阐述了原质与大他者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以神秘的方式进行的——这解释了原质长期以来一直被包裹在神秘之中的事实。但是，在紧接着《伦理学》之后的关于转移的研讨会中，这种对立被转化为一种可以这样书写的关系： $a \subset A$ 。拉康从一个从哲学中

借来的比喻中实现了这种转化，这个比喻如今被称为“塞列努斯”，它将对象“小神像”包含在自身之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拉康教学中的一场革命，因为这种以文学性、神话性的非形式主义方式建立起来的关系，似乎与早期的发展完全对立。在《转移》中，大他者不再仅仅是能指的场所，在那里，对象被包含在大他者中——这显得有些神秘，因为研讨会只是用内部和外部的概念来工作的。柏拉图的模型不过是：一个看起来像塞列努斯的封皮，在其内部发现了其他东西。因此，我们必须将这种内部和外部的模式形式化。

在拉康的教学中引入了一些最近才被理解的东西，即能指的大他者的贬值。他因此可以说“大他者不存在”，这并不妨碍大他者发挥作用，因为许多事物在不存在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然而，“大他者不存在”这句话如果没有意味着一个相反的存在，那就毫无意义。拉康的大他者，即发挥功能的大他者，不是实在的。这就是让我们理解  $a$  是实在的原因，理解这个  $a$  作为剩余享乐是如何不仅创立了大他者的异在性，而且创建了象征的大他者中的实在。这不是一个整合的环节，不是一个内部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外密性的衔接问题。

让我们用打断我授课的事件来说明这一点吧：一次炸弹恐慌。炸弹并不存在，然而，我们有证据表明，在不存在的情况下，它可以产生其效果。我的课程属于能指的秩序，它在一个专门用于教学的地方举行。在那里引入一个对象，让我告诉你，它有很大的效果，但没有人知道它的位置。因此，我们证明，在这个物体通过死亡的能指“炸弹！”出现的那一刻，大他者被掏空了，消失了。只有这个对象仍然存在，这个在荒漠中的对象。

这是在  $A$  和  $a$  之间存在的二律背反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而这个二律背反与我们写成  $a \subset A$  的公式是相容的。对于这个对象，炸弹——这个不存在就已经完全有效应的对象，或者说它也许会在明天或下周爆炸——它是大他者的话语的结果。它不是自然现象，不是地震，它不是一种物质，相反是一种结果，是科学的话语的产物。这句话，“炸弹！”位于拉康所研究的交叉点的层面上，以证明话的主体的存在不需要说的主体的存在。同时，这个句子也清楚地表明了能指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如果能指“炸弹！”真的是指炸弹，它仍然不代表这个炸弹，它没有说炸弹在哪里。因此，在这个能指和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但我们不能说“炸弹！”是这个炸弹的能指。对这一点的最好的证明是，不会有人会让炸弹不爆炸而去和它说话。

说完这一具有典范价值的论点，我自己的立场是说，那个冲进房间喊“炸弹！”的年轻女人应该把这句话写在一张纸上，并把它交给我。当时，我会要求房间一边的人离开，然后是另一边，再然后是第三边。也就是说，我会试图以最有序的方式行事。这表明她和我之间的临床差异，以及一个主体在危急时刻对自己的定位方式的重要性。当我问这个人为什么不以书面形式警告我时，她回答说“但是炸弹随时可能爆炸”。当然如此，但是认同炸弹可能不是摆脱这种情况的最好方法。

### 没有“什么”的“那个”

我所发展的这一部分涉及到对象的类型，以及是什么让它在在大他者的位置上的定位变得困难。当我们谈论对象时，我们不是在谈论一个与表征的主体相对的被召唤的对象。如果我们以炸弹为例，没有人在那里注视它，它确实是一个与主体的存在不相容的对象。它意味着身体和人的在物理意义上的消失，在这个例子中，它们代表着主体。你可以在一幅画的对面坐下来和你旁边的人聊天，但炸弹就不是这样了，当你谈论这种类型的对象时，主体就消失了。

对象  $a$  不是本体论的一个章节。事实上，本体论说的是所有对象的共同点。它包括在对象本身被经验之前，收集代表对象的若干特征。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本体论的预理解”：我们可以先验地知道，如果一个对象有这样那样的特征，它就是一个对象。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对象的标准。本体论先验地告诉我们可以对对象说些什么，这些是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它

所说的已经放在了对象上面。本体论的确总是一个范畴的学说。可以说，在那里，对象的结构已经与言语的结构相同。

但是，当我们谈论对象  $a$  时，我们谈论的是另一种对象性——让我们说是另一种“对象性”，一种没有被召唤到表征主体对面的对象性。因为表征不是一种想象的功能。在《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中，表象是象征本身——拉康将在几年后用能指对主体的表征来形式化它。因此，在拉康的意义是，表象的定义是象征性的，而不是想象性的。然而，这个新的对象化是这样的：人们无法避免地体验到它，它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分裂的对象，一个主体，它不代表世界中的对象，而是它自己被表征。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说这个对象的结构与言语的结构相同。在大他者中没有对象的特殊性，但在那里，对象并没有被消解。它逃脱了类别，因为它不具有与言语相同的结构。通过使用杨柯列维奇重新表述的中世纪的参照，我们可以说这里是一个在“是什么”和“是那个”之间的差异意义上的“那个”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实存与本质之间的区别问题，一个东西在这里，但其本质却无法在大他者中定义。

人们可以说它“是”——即“是那个”——但人们不能说它是什么。我们有一种“那个”的悖论：有些东西存在，但不是“什么”。这样一来，没有人可以描述我之前说的炸弹，除了会遇到它的人，但那样的话，他就活不长了。这没有“什么”的“那个”是一种“没有本质的存在”（这种表达方式拉康用过一两次）。

#### $A/a, \quad i(a)/a$

$A/a$  是以拉康的另一个公式  $i(a)/a$  为模型构建的，它意味着在现实中，他者的外衣或者封皮的形象覆盖了实在的对象。但这也可以说是资本  $A$  的情况。 $A/a$  是一个意味着大他者的贬值的公式。它表明大他者并不存在，除了幻觉，其没有其他地位。由于这个原因，拉康能够将分析的结束定性为“愤世嫉俗”。犬儒主义在这里意味着大他者的幻觉的结束。而有时，这种堕落允许一种新的通向原乐的途径，一种被拉康称为堕落的原乐，因为它不涉及与大他者的关系。有时，事实上，这就是某人在分析结束时的收获——不过是这种犬儒式的天真。

犬儒主义本身的确是一种天真，因为它认为大他者不存在的事实意味着它没有功能。然而，从大他者不存在的事实中推断出我们可以抹去它的普遍功能，并认为只有原乐才是实在的，这是天真的。因此，拉康可以说，精神分析使无赖们变得愚蠢。他们变得如此，是因为他们在分析之后，认为大他者的价值没有作用。

由于时间不够，我们不会在这里发展我这个分析师在犬儒主义和升华之间的问题。我们只想说明，升华可以写成  $a/A$ 。这并不意味着分析师只是对象的外表——这将意味着对象  $a$  的最终真相是它是实在的。分析师话语的装置涉及到另一些更困难的东西：对象  $a$  就是这样的不平衡。在我们经常使用的“对象的外表”这一表述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天真的信念，即对象  $a$  是实在的。然而，正如我必须强调的那样，对象  $a$  本身就是一个外表。而位于横杠下方的  $A$  完全可以作为假设发挥作用——事实上它并不存在。

#### $a \diamond \Phi$

我们将在此介绍一个在巴塞罗那提出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方式来指代绝对风险。它涉及一个结婚的女人，她去找律师立据，规定在她丈夫不再对她有欲望的那一天，她将放弃所有的权利。在我看来，这个案例似乎是解释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对立的典范，因为它涉及到婚姻的倒置，婚姻恰恰是可以让人们保证自己免受欲望的成因的影响的东西。

婚姻意味着欲望的成因被铭刻在能指中，而这个女人去找她的律师，她把欲望的风险刻在法之中。

### A/- $\phi$

它涉及到我说的在拉康那里的第二个父性隐喻的公式。它与“父之名”的公式对应，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它，但在临床本身的意义上，我们必须考虑到第二个公式，它将菲勒斯的表示为 $-\phi$ ，它迫使我们以大他者的不存在和不一致性而不是以其一致性的功能来操作。在我看来，这对分析实践有重要影响。

### 对象 a

实在，当它涉及到对象时，是一种外表。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一个谎言。拉康的对象来自哪里？它来自卡尔·亚伯拉罕的部分对象，即来自肉体的一致性。有趣的是，拉康将这种肉体的一致性转化为一种逻辑的一致性。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拉康把没有能指的对象还原为逻辑上的一致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再来一次》中清楚地读到，对象引入了一种存在的假象。请注意，他并没有说，在外表和实在之间存在着对立，恰恰相反。但仅仅发展大他者的逻辑一致性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它与对象的逻辑一致性联系起来。只有从这里，人们才能理解，实在只能从逻辑的僵局中被定位。拉康在《冒失鬼说》中介绍了对实在范畴的这种使用。如果在精神分析中存在一个本体，那将是对象的本体。但准确地说，这不是拉康所走的路。他走的是逻辑一致性之路。只有在这种方式下，我们才能把分析师设想为对象 a。显然，拉康也是如此，作为存在，但他的价值尤其来自逻辑。而这并不允许我们静静地坐在能指和对象之间，而是需要看到在何种意义上对象是一种逻辑上的一致性。以这种方式说话也许相当于与我们之前所说的相悖的思考，但你现在知道，与自己相悖的思考也是拉康的教训。

作为最后的补充，我在这里给出的这个数元是建立在我的课堂上以一种更松散、更娱乐的方式完成的深入工作之上的，我通过使用故事使它更容易被接受。但这些故事并不比深入的工作更有价值，而本篇文章就是深入工作的成果。

尽管拉康的著作规模庞大，横跨 1932 年至 1980 年，但人们经常用一句话来总结他，“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拉康思想的批评者们和追随者们通常都断言说，拉康的主要理论贡献包括了语言学的转向，其中弗洛伊德的充满能量和力比多的无意识被转化为一种可形式化的表象结构。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无意识的“语言化”相当于克服了弗洛伊德对十九世纪的生物学和物理学的不适当的依赖。对其他不太同情他的人来说，拉康声称自己是正统的“回到弗洛伊德”的唯一发起人，但这却被他在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范围内重新阐述弗洛伊德元心理学的错误努力所驳斥，而这种努力据说是与弗洛伊德自己的精神世界相悖的。此外，任何用拉康的工具重新考量力比多经济的元心理学基础的努力都必须克服的反对意见是，拉康对象征性无意识的描述中的一个唯一有争议的实体就是语言，这个问题就会指控说能指理论与驱力问题无关。如果对拉康来说，原乐总是享受-意义，那么能指链的逻辑和动力就必须被重新评估，以使享受（迭代轴）和意义之间（改变轴）的（非）协调成为可能。

当拉康引用语言学学时，他总是使用索绪尔的术语。特别是，拉康的无意识是由“能指”组成的（或者说，“是像（能指）一样被结构的”）。拉康的反对者声称他的立场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不相容。弗洛伊德在区分“词表象”和“物表象”时，认为无意识仅由后者组成，而否认无意识包含任何形式的语言单位的概念。要解决拉康理论对结构语言学的引用的捍卫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需要回答两个核心问题。首先，“能指”和“词表象”这两个词是同义的吗？第二，语言学所揭示的结构本身是否完全是语言的，也就是说，“结构”是否与语言本身严格地共存？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讨论几个话题——弗洛伊德对语言在心理中的地位的理解，弗洛伊德的语言观和索绪尔的语言观之间的关系，以及最后，作为拉康的能指概念的来源的罗曼·雅各布森对索绪尔的修改。第二个问题启发了拉康他后来的“后结构主义”的教学时期（主要是在 1970 年代）所做的一系列区分的研究，特别是 *la langue* 和 *le langage*（两者都被翻译为“语言”）之间的区别，以及“意义”和“能指性”的区别。

弗洛伊德有时对语言持有一种相对简单的概念。弗洛伊德是在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语言，即语言是用于指称非语言领域的事物（物体、事件等）的词汇体。根据这一概念，弗洛伊德使用了物表象和词表象之间的区别。作为表象，这两个概念都指的是心灵中的记忆踪迹。物表象主要是视觉上的，由精神装置保留的经验性元素，而词表象则包括具体语言单位的声音和/或图形踪迹。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无意识只保留了物表象，也就是说，保留了感知的而不是语言的踪迹。因此，在压抑的屏障之下，人们应该发现的主要是视觉上的记忆片段。此外，弗洛伊德认为，一个物表象达到意识状态的前提条件是，它要与相应的词表象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前意识充当了无意识和意识受限领域之间的通道。前意识是一个心理场所，在这里，来自无意识的物表象接收到了语言的印记，使它们有可能进入意识。如果由于压抑的审查，前意识不能为无意识的物表象提供一个词表象，那么这个物表象就注定是无意识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弗洛伊德关于意识的独特语言性质的断言是建立在相对直接的自我观察之上的。他注意到，伴随着一个人的所有意识状态的内部独白似乎总是涉及语言。从这一点出发，弗洛伊德推测，一个想法进入意识思维领域的先决条件是，它要有适当的语言关联物的护送。

然而，弗洛伊德并不仅仅把物表象与无意识联系在一起。有意识的思考包括两种类型的表达。在拉康所使用的索绪尔术语中，这意味着什么？像弗洛伊德一样，索绪尔把人类认知过程的表象构造分为两类——与对象主要的视觉表象相关的知觉踪迹（索绪尔的“所指”，类似于弗洛伊德的物表象）和语言单位的知觉踪迹，无论是声学的还是形象的（索绪尔的“能

指”，类似于弗洛伊德的词表象，但不完全相同）。能指和所指本身在严格意义上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把这两部分结合成“符号”，才能创造出语言的意义。因此，对于弗洛伊德和索绪尔来说，意识思维都涉及到符号，也就是说，基于特定语言使用者群体的任意而传统的实践的语词和事物的统一。在这个印象的最初层次上，拉康把结构语言学引入精神分析理论的有效性多少是值得怀疑的。一方面，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是通过词表象与物表象之间的二分法来表达的，这证明了拉康对精神分析中语言中心的强调。但是，另一方面，索绪尔的能指（“声音形象”）和弗洛伊德的词表象之间的相似之处，使拉康容易受到批评，即他将无意识简化为仅仅是语词的混乱，从而抛弃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图式。

拉康对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引入了某些修改。首先，他松开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被索绪尔假定为在语言共同体内是不可避免且持久的。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语言的所有（有意义的）使用都需要同时调动能指和所指。构成一个特定句子的每一个能指-语词都立即带有其适当的所指-概念。（而且，这两类单位之间存在着固定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拉康在关注“能指链的历时性”时认为，能指，一旦在其实际的时间部署中被看到，就会发现其不会自动地携带一个平行的、预先确定的符号。（对拉康来说，能指总是位于“链”中的，即涉及至少两个能指的非同步序列的）。用一个极其简单的例子来说，在“我是x。”这个句子中，能指“我”并没有得到它完整的描述性的符号，直到句号这个标点表明，非同步的后继“x”（句子的谓语）应被回溯性地视为将所指挂钩到句子的能指上的，这个能指在历时的前主体位置中最初是不确定的。在拉康派看来，在一个回溯性的锚定点的锚定操作将一个所指固定在“我”上面之前，它是一个“漂浮的能指”，是一个失去了所指的能指。我们应该注意到，拉康在1950年代提出的能指链的历时性的理论，即能指链同时具有差异性和延迟性，它预示了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因为拉康和德里达都强调索绪尔理论的历时性，以及其共时性的差异概念。此外，拉康还注意到，各种文学和修辞手段显示了人类语言的惊人之处，即在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传统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后它仍能保持向语言的其他使用者传递意义的能力。因此，对拉康来说，能指服从于一种动态功能，其规律相对独立于所指的领域。拉康在强调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分离时，对索绪尔将语言学建立在符号上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应该指出，拉康偏离索绪尔式的符号中心地位，不仅仅是他自己对索绪尔的偏离和一种弗洛伊德式的阅读。拉康在挪用索绪尔时最依赖的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他认为，语言中产生意义效果的可能条件的最小单位是音素。数量有限的不同音响特征的对立对子产生了一组有限的音位元素，而这些音位本身为构建更多的复合意指单位提供了必要的原始基础。如果没有这些音位原子组合成更大的总量所产生的声音和/或图形的差异，语言表示多种概念和实体的能力就不可能实现。与雅各布森不同的是，索绪尔对语言的分析是以语词—能指和概念—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开始和结束的——索绪尔甚至认为只有符号才有语言的现实性，而能指和所指是方便的理论抽象，它缺乏任何独立的存在或地位——雅各布森将意义的起源追溯到一个无意义的基底，即对立的音位单元对子。雅各布森认为，这些才是真正的“能指”。索绪尔把语词看作是必然有意义的符号，一个词总是和它的所指的意义联系在一起——另一位与拉康思想有松散联系的结构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在强调能指和所指的不可分割性时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因此其不适合作为能指理论的候选者，能指是可以从所指的层面分离的。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最知名的论点之一是，“差异”的作用是语言的一个不可还原的特征（由于巴特、德里达、拉康等人的努力，这个特殊的论点已经成为最容易与索绪尔的思想联系起来的观念）。对于索绪尔来说，能指之间的差异使一种语言能够识别、组织和代表言说主体的感知和认知现实中的多种对象和概念。雅各布森把结构之所以能将语言学建立在对与音素（而不是语词）有关的差异性特征的分析上是由一个单一的、基本的问题许

可的，即，是什么使词与词之间的区别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是什么使语词的多元性成为可能？雅各布森的回答是，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音位差异，就不可能构建一个足够大的词汇库以及在自然语言中看到丰富的表现力。换句话说，只有以音位差异作为雅各布森的能指，才得以构建作为语词差异的索绪尔的能指。通过音素和语词的排列组合所创造的能指数量越多，语言的能力就越大，就像拉康所说的那样，可分割实在（也就是识别和代表语言以外的指称）。总的来说，雅各布森从索绪尔那里保留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差异对于意义的产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把对单个语言单位的理解从肯定倒置为否定。“差异通常意味着肯定的项，在两者之间差异被建立起来，但在语言上只有差异，没有肯定的项”（索绪尔）。

简而言之，雅各布森的能指由以下两个特征来定义：其一，能指，它虽然是意义的必要前提，但它本身是无意义的；其二，能指是一个由差异网络所支持的功能，而不是一个惰性的、肯定性的材料。弗洛伊德赞同索绪尔的隐性偏见，即在精神生活中，有语言的东西通常是有意义的，他认为在心理中发现的语言元素是有意义的符号。然而，如果“能指”在雅各布森的意义被理解，那么它不一定等同于弗洛伊德的词表象。拉康的能指逻辑包括词与物——“表象从一开始就具有意指结构的特征”。这种逻辑不仅支配着主体的言语——言在的位置表述，也支配着他/她的经验记忆和力比多对象的选择。因此，拉康把词表象仅仅当作意指表述这个大类别下的一个亚种。

保罗·吕科尔关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不包含词表象的对拉康的主要批判，在今天得到许多回响，（让·拉普朗什和其他作者也沉溺于这种攻击的角度，尽管他把批评的重点主要放在拉康的结构概念上。）在《弗洛伊德与哲学》一书中，吕科尔指出：

弗洛伊德在论述无意识时没有考虑到语言，而是把它的作用限制在前意识和意识中，这不无道理。他在无意识中发现的意指因素，他称之为“本能的再现”（概念的或情感的），是有秩序的形象……本能达到心理的形式被称为“再现”，这是一个意指的元素，但还不是语言上的。至于所谓的“表象”，就其具体的结构而言，并不属于语言的秩序，它是一种“物表象”，而不是“词表象”。

虽然他认为这是自己对拉康式的对弗洛伊德的回归作出的致命的打击，但吕科尔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拉康对无意识的强调在于结构的观念上，而非在于以词为中心的辞说语言的概念上。拉康小心翼翼地从不断言无意识是“话语”的问题，即言说的主体在他/她的意识中所使用的词语和短语的集合的问题，在一个给定的由类似构成的对话者组成的语言共同体内的日常存在的问题。吕科尔规定，“‘语言学’一词可以应用于分析领域的条件是它是在普适意义上使用的”。拉康完全同意这一点，并利用能指的概念范围的扩大来实现对弗洛伊德的重塑，这种结构主义虽然在历史上是通过语言学来发现的，但却超越了仅以辞说和/或书面语言为中心的研究的局限。正如路易·阿尔都塞恰当地指出的，指责拉康将无意识简化为一组语词，就是完全错过了各种项目（拉康的，阿尔都塞的，巴特的，等等）使用结构主义作为人类科学的首要范例的要点。

通过求助于雅各布森对索绪尔的概念的修改，拉康将能指本身视为一个无意义的元素以及一个物质单位（能指的物质性的性质是可变的），它们仅仅通过它们与其他此类单位的不同关系来定义。针对有人批评他把无意识当作词表象的集合体，拉康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无意识是语词的集合体，而是说无意识恰恰是结构化的”。为什么雅各布森式的语言学版本把拉康从将弗洛伊德式的无意识转变为一个集合了主体的母性口语的字谜游戏的风险中解脱出来？鉴于雅各布森将音位描述为语言意义的组成部分，各种材料基础可以在这种音位能力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音素的听觉特性，或音素是由人类发声器官发出的声音这一事实，与它们创造意指系统的方式相对无关。在音素作为声音和/或图形标记的层面上，并不是它们所允许的在意指中构建更大的组合的肯定性特征。假设说，不同的材料媒介，只要它能标明最低数量的可识别的差异，就能支持语言的意义效果。（盲文证明了这一点，因为盲人可以利用触觉的差异来识别意指单位）。雅各布森式的能指的听觉、视觉或触觉性质是这个同



一材料层面上的差异性关系系统的可变材料基础。因此，通常被认为是非语言性的事物（例如，视觉形象）可以作为能指，前提是它们的价值是由与其他类似性质的事物的差异系统所决定的——“能指是一个形式而不是一个描述性的类别。”更具体地说，弗洛伊德的物表象，一旦在一个由众多此类表象相互关联的无意识中运作，从而相互影响其相对的心理价值，这就是雅各布森-拉康意义上的“能指”。例如，当拉普兰奇把拉康的能指等同于“辞说能指”时，他就错了，犯了一个阅读中的常见错误。拉康的无意识能指概念包括形象和其他非语言的感觉片段。

关于雅各布森对拉康的影响的最后评论值得一提。雅各布森试图证明语言意义是如何从严格意义上的无意义的底层音位构件的对立和组合中产生的。奇怪的是，非意义的基础有助于使意义的出现成为可能。同样地，当拉康谈到无意识的能指时，他并没有提出无意识包含着隐藏的意义。相反，无意识，保留着不断冲击、破坏和重组次级过程层面上的表象的方式的踪迹的初级过程，它修改和并置表意材料（声音、形象等等），完全不关心其活动的产品是否有任何意义。无意识联想的法则（也就是弗洛伊德的初级过程）是根据“类能指”元素之间基于其“材料的”（而非是有意义的）特质或特征而产生的联系展开的。或者说，无意识忽略了物表象和词表象之间的区别，常常把词表象当作物表象来处理。因此，拉康区分了 *sens*（意义）和 *signifiante*（布鲁斯·芬克把这个新名词翻译成英语“signifierness”）。前者指的是意义，即凭借共同拥有的词汇和一套商定的语法规则来形成语句的主体间交流。后者指的是反映无意识活动的联想、关联和唤起的特异性网络，这些活动并不受制于可交流性或可理解的意向，而是参照语言社区的共时现实。我们可以说，意义是主体间的意义，而能指是主体内的。拉康认为意义是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对象。在他眼里，精神分析忽略了说话者传达意义的有意识的意图。（用索绪尔的术语来说，这就需要把说话者所表达的符号中的所指部分括起来，以试图分离出“纯粹能指”的无意义游戏。）分析性的诠释——而不是一种深度的心理诠释学（就像人们对弗洛伊德的方法所假设的那样）——必须关注在主体所组织的话语结构的表面组织内悄悄发挥作用的能指性。

通过对弗洛伊德的词表象和拉康的能指之间的不同之处的考察，人们不可避免地被引向拉康的“结构”的含义这一与其相关的问题。针对1950年代结构主义时期产生的大量误解，拉康在第二十次研讨会（1972-1973）上澄清了他的结构主义“咒语”（“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你看，通过仍然保留的这个“像”，我就依然在我所说的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的范围内。我说“像”是为了不说——我一直都在说的——无意识是“被”一种语言结构的。

这个“像”被那些认为拉康将无意识的内容限制在完全是言语/语言的性质上的人所忽视。后来在第二十次研讨会上，拉康说：“Si l'inconscient est bien ce que je dis, d'être structuré comme un langage, c'est au niveau de la langue qu'il nous faut interroger cet Un”。这句话的翻译如下：“如果无意识确实像我说的那样，是像一种语言一样被结构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在语言的层面上审问这个‘一’”。这种翻译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即拉康为什么不是一个将自然语言作为终极系统性基础的结构主义者——*la langue* 与 *le langage*。

*La langue* 指的是日常意义上的语言，即人们所说的“方言”，*le langage* 指的是无意识的能指之间复杂、动态的过程。（简单地说，*le langage* 并不等同于仅由语言学定义的语言本身）。对这一区分的忽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拉康被广泛接受为语言学结构主义者的这样一种教科书式的描述。换句话说，现存的翻译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拉康并没有说无意识是“作为”或“被”英语、法语、德语等结构的。1968年拉康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时，一位听众这样评论：“我认为你说无意识是大家都说的普通语言，英语、法语”，拉康礼貌地回答：“我说的是像语言，法语或英语，等等。”拉康所使用的“语言”指的是一种结构逻辑

或有序的运动回路，尽管它通过自然语言被发现并反映在其中，但不能被视为与这些语言中的每一种都是严格共存的。由于这些原因，已故的拉康与语言学拉开了距离，而在他早年的时候，他曾把语言学当作精神分析的“科学”伙伴——“我说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这不是语言学领域的一部分”。

让·克劳德·米尔纳恰当地指出，“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这一说法有些多余。在拉康后期明确扩大了“语言”一词的范围之后，“语言”和“结构”几乎成了同义概念。因此，如果他真的想与语言主导的结构主义形式保持距离，拉康最好只是声称：“无意识是有结构的”。他的这一著名主张的删减版本简洁明了地继续了执行拉康在其教学的早期语言学转向所启发的结构主义任务，即强调无意识不是本我，无意识不是一个无政府的活力论的本能的大杂烩，并且与每一种秩序或形式化相对抗。在研讨班的后期（米尔纳建议称拉康为“超结构主义”的阶段），他对“像语言一样”这一部分再也没有真正的需要。似乎在他 1970 年代的理论中，拉康保留它只是为了听起来与他在 1950 年代所声明的相一致。在这一点上，为什么要继续提及语言？为什么要保留一套术语，而这套术语的缺点是在面对可以理解的误读时不断需要澄清？在拉康拒绝放弃索绪尔和弗洛伊德的字面术语时——尽管他将他们的概念进行了彻底的修改——拉康往往是他自己最大的敌人。

在研究让·拉普朗什与拉康的分歧时，语言和语言结构之间区别的相关性变得明显起来。拉普朗什对拉康的“结构”的主要批评在于，他把重点放在主体的去个人化的分析上，他认为这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事情——“我不相信语言的无意识。在这一点上我不是拉康式的，我不认为无意识是语言的潜在可能性。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无意识，没有人际的无意识会成为语言的潜在可能性。”拉普朗什把拉康的能指与索绪尔语言学的辞说符号混为一谈。从这种错误的混淆出发，他接着断言，语言的跨个体性使每个来访者的心理的特异性独特性黯然失色。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对无意识的结构主义式的处理是否能够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在主体和其周围的中介框架之间取得平衡。拉普朗什说：“随着结构主义被推到极端……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内在因素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人们想要取代无意识的独一性的内在因素是一种跨个体的内在性：它是语言的结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拉普朗什指出，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正是遮蔽“无意识的独一性”的东西，以至于一个人的发音都能算作是一个跨个体的秩序。在其他地方，拉普朗什说：

拉康的理论导致了在临床的实践中对语言的“跨个体”方面的特权……一种语言的无意识将是其隐藏的宝藏。很明显，一种语言有一个隐藏和转喻的宝藏：它的无限或不确定的文字游戏，它的双关语和谐音。但语言中的一切都同样存在于无意识中吗？我想说的是，在我看来，这种所谓的能指分析，完全建立在语言所给出的不确定的游戏上，是一种任意的、野蛮的分析。

拉康的“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是否会导致一种“任意的”、“野蛮的”分析滥用，一种胡乱的文字游戏？拉康声称梦和症状的安排与隐喻和转喻相似，这是否为一种治疗打开了大门，在这种治疗中，孤立的分析家的诗意被任性地、暴虐地叠加在来访者身上，没有任何严格的约束？

“语言”和“语言结构”的区别隐含在分析实践的经验内容和分析的元心理学的形式化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以及作为治疗和理论的精神分析之间的区别中。拉康试图在他的概念装置中为每一个概念分配适当的位置。拉普朗什完全相信，拉康认为一般元心理学所主张的“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与对单个主体进行辞说的分析之间没有区别。拉康确实在这里认识到了一种差异。无意识的元心理学基础相对于语言的结构，允许分析实践的后续转变，在其中主体的话语成为了解释的焦点。（然而，这远远不能排除在正在进行的分析中对被来访者的非辞说行为的审查。）弗洛伊德自己对物表象和词表象的区分也同样允许分析调查的方向主要围绕个人的言语：压抑是一种辞说上的障碍，是一个物表象与相应的词表象被拒绝联系的点。拉康指出，“我们只能根据所说的东西，根据来访者所说的东西来处理无意识”。因此，

拉康对“语言”，即言说的主体的实际言辞的关注主要是临床实践上的问题，是分析师接触其对话者的心理状态的有限途径的问题。（但拉康也会强调，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来访者的“内在”心理意图是由“外部”中介支持的，是由微妙的能指组织使主观认知“外密化”的，因此，分析师不应该像倾听他人的讲话那样，试图探测隐藏在表达表面“背后”的动机或欲望。）在分析实践的层面上，拉康只是强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确是一种“谈话疗法”，分析师必须将他/她的解释建立在病人的言语的基础上。这表明拉康在认识论上的清醒（这一点他通常不被指责），表明他对可能的分析经验的局限性的认识。这是否意味着——正如拉普朗什所言的——拉康主张分析师在来访者的言辞上，玩着随意的自由联想的文字游戏？拉康对分析实践的语言中介的关注，是否意味着他忽视了主体的个体特殊性，而支持由、跨个体的象征秩序所支持的荣格式集体无意识？

拉普朗什对拉康实践的批判，最终源于他对其理论基础的否定。这是一种哲学上的分歧，而非临床上的分歧。拉普朗什指出，拉康分析的“扭曲”的根源在于他的基本概念。然而，由于没有注意到“语言”和“语言结构”之间的关键区别，他拒绝客观的和抽象的“语言的”无意识，这是没有充分根据的。但是，有人可能仍然想知道，“语言”和“语言结构”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在这种从分析环节的语言性的言语——它总是由分析者和来访者以某种语言进行——到形而上学无意识的“语言结构”的转变中，发生了什么变化？然而拉康对“语言”的强调指定了一个特定的内容作为在分析实践中被解释的材料，他对“语言”的使用是严格形式化的。因此，没有一种特定的内容类型被假定为在无意识中可以找到的唯一的内容类型。拉康的公理并没有说无意识包含了什么或者它包含了什么材料——几乎每一个对他的“语言学”的批判都忽略了这一点——而是说，无论无意识包含了什么材料，它们按照能够精确理论描述的结构动态来发挥各自的作用并相互作用。“语言结构”指明了一种翻译结构而不是一种经验内容（即，一组特定的自然语言）因此，任何类型的记忆材料（语言的或非语言的声音，语言的或非语言的形象，等等），只要它们受到特定的心理过程（如凝缩，移置，和锚定点）的影响，就构成了无意识的能指网络中的节点。

此外，拉普朗什在个人与非个人、个人与跨个人之间的对比，实际上也反映在“语言”与“语言结构”的区别上。拉康用“语言”来指代一个预先存在的语言系统，说话的人出生在这个系统中。口语的语词和语法规则是象征秩序的一部分，是一个超越个人的语言、社会文化的意义的领域，她/他在成为主体时获得了这些意义。另一方面，“语言结构”指的是这样一种机制：由于象征秩序和个人生活历史的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主观意义的层层沉淀得以积累。其与“语言”相反，“语言”是一个过程或运动，而不是历史上偶然材料的具体集合。拉康的主体既不是纯粹的象征性大他者的非个体化的傀儡，也不是一个能够从理论上孤立于表象矩阵的心理原子，而这个主体在表象矩阵中被赋予其存在。

事实上，从拉康后来的教学中可以看出，实际上他对自己早期结构主义关于象征秩序的阐述的否定是惊人的。20世纪50年代的研讨班强调了这种跨个体秩序的重要性，这种大他者的中介赋予了个体以主体性和无意识。水平的主体间关系的多样性被具象化为一个整体，垂直地悬浮在这个单纯的集合之上。拉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特定主体的存在是如何完全依赖于这个普遍的他者的（在这一时期，科耶夫对拉康的影响相当明显）。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他在1960年代的“转向”的一部分，拉康随后发出了“大他者不存在”的隐晦声明。为什么拉康否认“大他者”，这个中介表象的超验矩阵，这个结构主义者重铸无意识概念的基石性的存在？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中，马克思宣称：“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这里对黑格尔的批判在于他把精神诊断为一个准宗教的幽灵，一个意识形态的幻象，它欺骗性地颠倒了具体人类的特殊性和社会历史力量的宏观潮流之间的感知关系。（简而言之，马克思指责黑格尔断言历史造就人，而马克思

认为这种断言掩盖了人造就历史的事实)。因此,精神作为一种自主的、具象化的“世界精神”的出现是人类主体的政治和经济异化的症状。

早期的拉康更接近黑格尔(他的象征秩序是心理主体性的“客观精神”),而后期的拉康则偏向于马克思。在指出“大他者不存在”时,拉康承认,一个独立于其组成成分的多元性的超验系统的概念(一个结构主义所珍视的概念)确实有些欺骗性。然而,拉康式的具体转向是,从主体的角度来看,其主体性的表象中介的显著改变是不可还原的。(可以研究一下拉康所有那些在他的行程中所说的不存在的“东西”在心理上的中心性和持久性上——大他者、女人、阴茎、性关系,直到对象a。)也就是说,精神分析对主体性的分裂排除了在这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克服异化的可能性,即拉康所说的主体和话的主体之间的分裂,也即主体在“象征的污点”中的异化所造成的分裂。(这种分裂的本质被乔纳森·李尔很好地表达了出来,他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描述为一个事实的结果,即人类在精神的上的“不安”所产生的意义多于他们知道如何处理的意义的结果)。

在更大的范围内,在二十世纪欧洲思想的总体背景下,对拉康所特有的这种结构主义的重新解释有什么影响?除了拉康理论领域本身,揭穿“语言学的拉康”这一流行神话的重要性在哪里?其利害关系是否仅限于精神分析诊所,仅限于作为病态无意识领域的治疗性干预的分析实践?围绕拉康回到弗洛伊德的特定问题的微观视角中的细节包含了向宏观视角开放的窗口,在这个视角中,当代哲学将自己置于与其同时代的历史的关系中。在知识界中,现象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被默认维持的界限正处于危险之中。

首先,拉康——与列维·斯特劳斯、巴特、福柯和阿尔都塞一同——是结构主义作为人类科学中的一种一般方法和研究计划的主要代表。尽管这些思想家经常被归类在这个标签下,但他们之间自然存在着关键的差异(正如任何一组有趣的理论家被安置在一个方便的标签保护伞下的情况一样)。然而,在这组思想家中,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概念(类似于“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是最经常与结构主义这一运动随意联系起来的。“结构”指的是叠加在个体主体上的社会文化意义、准则和制度的框架,是一种秘密地超决定意识存在的僵硬的外部秩序。然而,如果这种对结构主义的肤浅描述不适用于拉康,那么,也许结构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被其后来的解释者系统地误解了。

同样,拉康,和福柯一样,也是一位思想家,他自己的工作参与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变。例如,在他的第七次《精神分析的伦理学》研讨班(1959-1960)上,拉康通过强调他未明确定义的“实在”这一的范畴重要性来重新考虑他以前赋予象征的中心地位,从而开始了这种转变。(简单而不充分地讲,这相当于断言封闭的意指系统受到这些系统之外的非表象条件的影响。)通常,后结构主义自认为与结构主义所不同,因为它贬低了它所理解的结构主义理论赋予可正式划分的语言(或者,更广泛地说,赋予详尽定义的元素封闭秩序)的霸权中心地位。在目前的背景下,最好的例子之一是克里斯蒂娃作为对拉康对主体的严格语言学分析的一种细微的替代的她的(如她所说的)“跨语言”的符号学的导论。(同样,克里斯蒂娃和伊里格瑞都讨论了在精神分析实践中表面上超越拉康的必要性,即关注身体姿态和声调等事物,他们都假设拉康忽略了除了来访者独白的语言文本之外的一切。)然而,如果拉康被证明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他没有像结构主义的批评者所指控的那样粗暴地神化语言,那么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分界线(它至少是由后结构主义者划定的)就会失去一些明晰性。

对拉康使用语言学作为理解无意识的“先导科学”的批评,与可以被称为隐性的新柏格森主义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新柏格森主义于1960年代后期开始在法国思想中有了影响力。利科、拉普朗什、克里斯蒂娃、伊里格瑞、德勒兹和其他人都称赞弗洛伊德对精神世界充满活力的描述。拉康被认为剥夺了无意识的生命力和它的“能量”(力比多,驱力,情动,等等)。力比多生命流动的、波动的力从拉康的无意识中被抽干,从而成为一个死的、

机械的自动装置。就像柏格森对“持续的我”和“空间的我”的区别一样（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的”和“象征性的”和伊里加雷的“流动的”对“固体的”都是意指柏格森式的二元论，它们被对立于拉康）。本我的沸腾的大锅（一个有问题地归因于弗洛伊德的概念）被建立为反对有结构的无意识的固定的、僵硬的组织的对立面。

有人断言，对无意识进行结构主义的处理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丧失承认和解释心理生活的力比多机制的能力，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弗洛伊德本人明确指出，驱力既包含表象的成分，也包含非表象的成分。特别是，鉴于弗洛伊德的驱力-对象是由知觉的中介要素组成的。拉康的能指逻辑，从索绪尔语言学的系泊中解脱出来，旨在解释对象的选择、升华和其他力比多机制。拉康对后结构主义所援引非结构化的、无政府的本我来反对结构化的无意识的反驳，实际上是对其批评者的反击。考虑到驱力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包括相互关联的意识形态踪迹网络形成的无意识的精细编织的结构，如果没有类似能指的概念，人们就不能希望理解力比多经济的运作。在结构或能量、语言或力比多之间的选择是一个错误的两难境地，它不仅来自于对拉康的讽刺，也来自于对弗洛伊德的根本性缺陷的解读（它是弗洛伊德精神能量神话的牺牲品，而且还把无意识和本我混为一谈）。拉康的创新能力部分在于他雄心勃勃地试图克服“表象”和“能量”之间在哲学上可疑的区分，这种区分支撑着弗洛伊德的大部分思想。对拉康来说，“精神能量”（如果不是立即被否定为对幻想的分析图式思维的诱惑的话）并不脱离记录无意识活动的意识形态表象和精神踪迹而存在。反过来说，它们也是相关的，这些表象和踪迹并不是稳定的、可隔离的原子单位，而是在一个不断移动的历时流中被捕获的瞬间（因此，人们倾向于诉诸能量学，以隐喻的方式在形象中捕捉意指链条的这种几乎是动态的动力学）。

理解拉康能指对驱力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如果驱力对象，通常被认为是代表源头和压抑的物表象元素，是作为表象的能指，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需要对驱力进行重新认识吗？在拉康的叙述中，能指的逻辑包含了它自己的时间形式，代表了一个与它迭代的轴不相容的时间顺序。“能指”不可避免地调解了驱力之源头的必然性，负责了一个漂移/滑动的效果，在这种效果中，它所寻求的过去的意识形态踪迹永远不能以一种未经修改的形式在现在的限制中恢复过来。

看一下雅克·德里达的文本（尤其是《丧钟》）和黑格尔的文章和演讲，就会发现黑格尔和德里达是极其不同的两位思想家。黑格尔显然是德里达所认为的在场的哲学家，他致力于实现“知识不再需要超越自身，知识在此发现自身”，意识在此存在于自身之中。另一方面，德里达认为，一切在场的东西，在此，在现在，在这个时刻，所存在的一切，作为自身的构成特征，都有着不可赎回的过去的印记和踪迹。过去毫无救赎可言，因此，我们永远不能谈论诸如“我”这样的简单地或完全地存在于自身之中的实体。德里达在《多重立场》中声称，他努力将“差异”与黑格尔式的“差异”区分开来，事实上，“差异”完全可以被定义为“黑格尔式扬弃——无论它在哪里运作——的中断和破坏”。而且，至少从他的文本来看，他似乎已经成功地将他的计划与黑格尔的计划之间的差异毫不含糊地表达出来了。

然而，德里达在《多重立场》中也承认，他对“差异”的思考位于“一个几乎绝对接近黑格尔的点”，澄清他与黑格尔关系的艰难工作将“在某种程度上是无休止的。”那么，也许在仔细阅读之后，黑格尔和德里达之间的差异可能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样明显。我想在本文中提出的部分建议是，黑格尔和德里达之间确实存在着比一般人们所承认的更多的相似之处。

例如，当我们研究他们各自对死亡的态度时，在他的文本《从限制到总体经济：毫无保留的黑格尔主义》中，这些相似之处开始变得明显起来，这包括隐喻和字面意思上的。德里达在《写作与差异》中指出，黑格尔认为准备冒着失去自己和生命的风险——特别是在《精神现象学》中的生死斗争——是自由自身意识出现的一个关键时刻。然而，他也注意到，黑格尔抵制这样的想法，即挣扎中的意识实际上应该“纯粹地、简单地……冲向死亡（并因此）冒着绝对失去意义的风险”，因为这将使每个意识失去它希望从生命的风险中得到的承认。这对德里达来说——就像对乔治·巴塔耶一样，德里达在这里密切关注着他——黑格尔的意识毕竟没有真正准备好冒着死亡的风险，冒着完全失去自己的风险，但实际上是希望在其风险中得到回报，即承认和在生活中新发现的自由。德里达指出，在生死斗争中发生的不是意识的死亡，而是“通过生命的狡计，也就是理性的狡计，生命……一直活着”。因此，尽管黑格尔表面上对死亡和否定性持开放态度，但这表明他仍然是一个在场的哲学家，对他来说，目标不是失去自己和死亡，而是“保持（自己）的确定性”。因此——再次追随巴塔耶——德里达将黑格尔描述为对死亡和否定性有一种限制性的经济观点：也就是说，黑格尔的意识“为自己重新占有所有的否定性，因为它将‘生命的危险’变成一种投入”，一种它希望从中获利的投入。换句话说，黑格尔的意识之所以冒着死亡的风险，是因为它已经知道并预见到它希望从这种风险中获得和赚取的东西，即新的生命。

在德里达的判断中，黑格尔的意识并不真正冒着死亡的风险，并不真正冒着失去自身和认识的风险，因为它总是让死亡拥有意义，让死亡在意识的历史中做着重要的工作，扮演着一个可理解的角色。德里达写道：“如果不允许把处于危险中的东西作为机会或偶然，而是作为否定性的工作投入”，“冒着死亡的风险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作为人们期望得到某种有意义的回报的东西。因此，向死亡敞开自己的唯一方法，以及打破形而上学的欲望对自己的控制的唯一方法将是德里达所说的“对意义的绝对放弃”，这种放弃也许反映在一种写作风格中，比如巴塔耶的写作风格，它允许词语和概念在自己的控制之外和理解之外“滑动”。这样的写作将“不能保证我们什么，不能……给我们任何确定性，不能给我们任何结果，不能给我们任何利益”，不能给我们明确的、确定的意义来理解，而是使概念遭受“意义的变异”或“意义的丧失”，并在这一程度上挫败了通过理解掌握的形而上学的愿望。从这个角度来看，德里达自己准备让各种语义、语音、甚至词语之间的形象关联在他的文本中产生共鸣和相互作用。

用，这不是被视为不是自身放纵的标志，而是准备让意义和理解在写作过程中丧失或至少变得神秘。事实上，这可以说是德里达准备在他的文本创作中冒某种意义和认识的“死亡”的风险。

德里达认识到，黑格尔在他的作品中也一直强调冒着死亡风险的重要性。然而，他坚持认为，黑格尔的“经济”最终限制了自己对生命和意义的保护，而死亡在这种经济中的作用被扬弃的结构所控制，他（在《丧钟》中）将其定义为“对绝对损失的绝对再利用。”

因此，德里达似乎同意海德格尔的观点，即黑格尔对死亡（和时间）的思考被一种关于理性运作方式和理性预设目标的思想所支配和限制。他认为，黑格尔所预设的是这样一种想法：任何损失或死亡都将被“重新占有”，被利用于其自身的发展之中，而这个自身最终仍然是它自己——仍然是“切近它自己”——一直如此。因此，对德里达来说，黑格尔的意识只能被说成是“发展”，因为它更充分地成为或更紧密地返回到它一直所是的东西。“精神”，德里达在《丧钟》中写道，“作为精神，它总已经是自由的，但精神仍然要成为它将成为的东西：……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自己面前，解放自己，解放它的自由。”德里达在这些句子中使用了未来完成时，表明黑格尔的精神在他看来确实有一个未来，但只是成为它总是已经是，并且已提前是了的东西。事实上，我们被告知，自称是精神的东西只是“提前将所有内容内部化”的东西。

对黑格尔的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它假定死亡、损失和否定性被一种精神或意识赋予意义和价值，而这种精神或意识在损失之前基本上已经是其所是。它假定精神在一个发展或历史中为死亡找到一个角色，而这个发展或历史的结构已经在精神是什么、总已将是什么中得到预示和预期。然而，这种解释并不允许这样的可能性，即精神实际上通过向死亡和损失敞开自己而产生真正的可能性，实际上可以出现。也就是说，精神可以成为，不是它一直会成为的东西，而是新的东西，只有通过向死亡和损失敞开自己而形成的东西。但是，如果像我在其他地方论证的那样，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确实只有通过准备好放开自己和死亡才能产生，那么这表明黑格尔和德里达之间的相似性也许比德里达自己所意识到的更大。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告诉我们，精神的深度“只有在它敢于在它的展开中展现和失去它自己的深度”。《精神现象学》中描述的意识之路包括意识的“失去自己”。精神的生命恰恰不是“逃避死亡并保持自己不受破坏”的生命。如果我们进入《逻辑学》，会注意到这个概念被描述为“自由的爱”，如果我们还记得在《法哲学原理》中，爱被认为需要“为自身而放弃我的存在”，我们就会意识到，可以为这样一个命题提供有力的证明：黑格尔的精神与巴塔耶的“主权”或德里达的“解构”一样，都准备失去对自身的控制。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把注意力转向他们关于一种特殊的死亡的思想，即，在无意识的机械活动中的“死亡”或意义的丧失，黑格尔和德里达之间的这种相似性（以及他们之间的差异）将变得相当清晰。

德里达在他的文章《哲学的边缘》中的《陷阱与金字塔：黑格尔的符号学导论》一文的结尾，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黑格尔认识到活生生的精神意识根本上所反对的那些力量的价值和必要性，即“形式的、数学的、否定性性、外部性的和死亡的。”他接着指出，在这些根本上不具精神性但却很有价值的力量中，黑格尔把计算、机器和无声的写作算在其中。在注意到这一点时，德里达提醒我们，尽管黑格尔对“机器”的看法一般都很模糊，认为它们只是精神生活的外部东西，是死的东西，但黑格尔总是承认抽象的机器活动的意识的教育价值，如重复的数学计算和死记硬背。然而，德里达认为，黑格尔允许意识从事抽象的、实际上是异化的、机械的精神活动的意愿受到了他想要克服异化和使意识回归真正的精神生活的愿望的限制。或者，换个说法，黑格尔欢迎机械性的精神活动，但仅限于它有助于教育，只有这种精神的基本活动方式不被认为仅仅是机械性的活动，也就是说，只有在它可以被重新挪用、扬弃或陈述到精神的动态有机生活中的时候，才因此对精神有意义。

在德里达关于黑格尔的其他著作中，他坚持认为，黑格尔的思想实际上是全部的哲学思想，其特点是“在结构上没有能力进行没有陈述的思考”。但他认为，黑格尔从一切事物——甚至包括与精神相距最远的事物——如死亡和空洞的机械重复——中获得精神意义或“利益”的愿望，正是在它试图投入于机器本身时遇到了问题。因为，他问道，“在意义丧失的时候……在精神在自身中缺席的时候”，比如在纯粹的机械性的精神活动中，“活动的回报是否是确定的？”。黑格尔可能认为精神总是可以从机械性的精神活动中获益，但德里达用以下问题来面对黑格尔：难道异化的扬弃和对精神生活的回归不正是因为机器活动永远无法保证其结果，永远无法成为可计算的、机械性的确定性吗？难道没有机器就只是在工作，而“不为意义服务”，不为精神和生活的目的做出贡献？难道人类的机械活动就不能以这种方式变得毫无意义并且和精神无关吗？黑格尔对机器的投入意愿难道不比黑格尔所意识到的（或对自己承认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要大得多吗？这难道不应该让他怀疑并非一切都可以成功地为人类的自身意识和自身存在服务吗？

德里达的想法是，黑格尔在结构上没有能力在没有在世界中找到精神意义，没有释放的情况下进行思考，这使他无法对这种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即机器可能只是在无意义地运转，而没有任何精神的利益或回报。“黑格尔是整个哲学史的解释者，他所想的是一台可以运转的机器。它将在不……被重新占有的秩序所支配的情况下运作”。更重要的是，德里达的这番话还暗示着，与整个形而上学传统一样，黑格尔不能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人类的思想实际上可以成为，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台纯粹重复运作的机器，没有意义，没有目的。

德里达引用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一些句子，这些句子表明，黑格尔可以把思想设想为一台机器，因为他认识到，他同时代的一些人想把思想拉到抽象计算的架子上，“以便把它作为一台机器来完善”。但是，根据德里达的说法，这些话也表明黑格尔在重复——也许有点机械化？——“‘生活’、‘思考’、‘说话’反对重复”，这些我们在他的其他文本中都很熟悉。因此，对德里达来说，它们证实了黑格尔本人并不认为心灵从根本上是可以或应该仅仅是毫无意义的机械的东西。

在德里达文章的最后几页中出现的黑格尔始终是一个在场的哲学家，他在精神已经知晓的生命中，在精神成为它将总已经是的存在的过程中，为“死的”机械活动找到了一个位置。因此，这个黑格尔——连同这个黑格尔所属的德里达——并不理解一种新的意识形式，这种意识形式是无法预料的，是通过无意义的机械活动而产生的。也就是说，不理解放弃意义以及为了它们自己而变得无意识地重复和机械本身正是导致新形式的自身意识、新形式的自身存在的产生的原因。然而，在我看来，德里达关于黑格尔的意识的假设并不完全正确。

黑格尔讨论机器精神活动的地方在 1830 年的《哲学百科全书》中关于记忆的部分之中。我们被告知，记忆有三个阶段或层次：保留性记忆（或保留名称的记忆）、再现性记忆和机械性记忆。在这篇文章的其余部分，我们将关注后者。为什么黑格尔把机器记忆描述为“机械的”？因为他在这里想到的记忆形式是以一种纯粹的外部方式将词语或名称联系起来。这种记忆不注意可以提供词与词之间的联想性、想象性或概念性联系的意义，没有意识到这些词可能具有的任何意义，而是单纯地记忆，然后背诵——没有任何理解，像一台机器——一串完全不相关的词和声音。黑格尔坚持认为，这种记忆的价值和奇妙之处在于，理智将自己所有的感觉和理解都抽象化了，变得完全像机器一样。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只有当人们不给语词任何意义的时候，一篇文章才会被正确地记住。因此，背诵熟练的东西是没有重音的。因为如果引入正确的重音，就意味着意义。但所谓的意义或表现扰乱了机械的联系——并且很容易将背诵者所抛出。能够记住一系列没有可理解的联系或本身已经没有意义的词（例如一系列专有名称）的能力是如此的奇妙，因为心灵的本质是在自身中存在。而在这种情况下，心灵被外化于自身，其活动是一种机制。



那么，在这段话的基础上，黑格尔似乎可以想到一种不为意义服务而运作的机器，而且他对心灵成为这样一种机器的可能性相当开放。事实上，黑格尔认为，通过记忆和学习一串串无意义的词语，让理智学会成为单纯的机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种机器记忆是思维活动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和过渡。

然而，对这种对机器记忆在思维的出现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讨论，难道不意味着黑格尔事实上毕竟不允许心灵在对意义的服务之外运作，而是为意识而占有机械，在心灵的不可复制的精神生活中给予机器一个位置吗？也就是说，他把机器记忆理解为心灵更深入地进入自身、进入它是什么并且总是已经会是什么的过程中的一个时刻？德里达将精神解释为“提前将所有内容内部化”的精神，它将它所提出或遇到的一切作为自身和自身发展的一个时刻带回自身。而机器记忆对于黑格尔来说，难道不是像德里达所宣称的那样，实际上只是另一个这样的内部化或内部化的时刻，是持久的自身逐步内部化的另一个阶段？有迹象表明，这确实可能是一种情况。

黑格尔认为，心灵有它自己的内在性领域——表象和想象的领域——在它可能参与的任何死记硬背的活动之前。因此，机器记忆当然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即已经存在的心灵将一系列无意义的词语纳入自身，并再次——作为发展和完善自身内在空间的过程的一部分——将其带出。此外，黑格尔明确地告诉我们，“作为记忆的理智……”与表象一样，贯穿着内化记忆的活动。事实上，他把机器记忆的活动本身描述为表象的“最高的反思性”。我们被告知，背诵单词表是内化单词的过程，这样它们就可以从内部，从我的深渊中被带出来。因此，正如大卫·克雷尔所说，记忆所显示的是，“即使是极端的抽象，即使是自由漂浮的符号，也可以被反思，然后随意、机械地外化。”

那么，机器记忆似乎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持久的、有生命的精神的进一步的内化行为。但是，这样的解释是否触及了黑格尔所说的核心？记忆是否只是“随意地”将符号和文字内化和外化的能力？黑格尔是否只是把机器记忆看作是一个已经活着了的心灵更深入地进入自身的过程？这种解读不能被否定，但在我看来，它似乎错过了黑格尔的论述中最重要的东西。

主要的问题是，这种解读意味着心灵在机器记忆中从未真正失去自己，从未变得真正无意识或非精神。相反，通过暗示机器记忆是内化的心智传递到思想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暗示心智实际上一直作为内化的持久力量被保留了下来，即，再次引用大卫·克雷尔的话，“真正的记忆保留……了理智本身的内在性”。但黑格尔的主张似乎是，只有当心灵失去了它最初作为回忆、想象和意指的理智的内在性时，记忆才会真正成为机械化的。事实上，黑格尔认为，在回忆、想象、保留性记忆和再现性记忆中起作用的内在化过程本身就是导致心灵到此为止所享有的形象、表象和意义在内部世界消失的原因。因为“我越是熟悉这个词的意义，它就因此越是与我的内在联系在一起，意义的客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决定性就越是消失不见，因此，记忆本身，与它一起的语词一同，就越是成为失去思想的东西”。（因此，我越是对自己重复“辩证法”、“扬弃”、“黑格尔”或“德里达”这些词，我就越不知道这些词该怎么理解。）当然，机器记忆是作为一个持续的内化过程的结果而产生的。但对黑格尔来说，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内在化的主体性的特征被改变了。事实上，最初赋予这个内在化的主体性的其独特的丰富性被丢失了。当然，失去的是意义。想象力、记忆力和再现性记忆的内在领域是由意义激活的，而这些意义本身就来自于表象的陈述和内化的形象。只有当这些意义被内化，以至于它们完全消失，而且心灵活动只包含了连接一系列完全无意义的词语时，记忆才会适当的机械化。在这一点上，我们在想象和回忆中所得知的心灵——也就是由意义激活的心灵——消失了，而心灵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无意识的、非精神的机器。

在《声音与现象》中，德里达声称，形而上学一直是对在场的渴望，“意识中的绝对自身在场是完全在场的无限天职”。然而，黑格尔对机器记忆的描述的显著之处在于，它显示了一位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对一种心灵活动模式的美德的赞美，在这种模式中，心灵并不存在于

自身之中,在这种模式中——引用德里达有点故意断章取义的说法——我们必须谈论“一种具有构成价值的不可还原的非……在场”。事实上,如果我们把黑格尔在《哲学百科全书》中所说的和他在《逻辑学》中所说的放在一起,人们几乎可以认为他期望德里达有一天能读到他。因为在《哲学百科全书》中,他告诉我们,机器记忆是“进入思想活动的过渡”——我们知道他对这种活动的评价很高,但在《逻辑学》中,他提醒我们,“机器的思维方式、机器的记忆、习惯、机器的行为方式,标志着”(准确地说,)“精神的特殊的弥散和存在精神的认识或行动中是匮乏的。”

黑格尔也预见到了德里达在《陷阱与金字塔》的结尾所写的内容,他说,如果我们把机器记忆仅仅看作是“通过其效用,它可能是精神在其他目的和活动中所不可或缺的”来证明的,那么机器记忆的价值就被忽略了。对黑格尔来说,机器记忆的全部意义在于,理智清空了所有其他的意义和目的,只是集中精力把无意义的语词放在一起,除了把这些无意义的词放在一起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因此,黑格尔对理智的要求是,如果它真的要成为机器,那么它就要成为德里达所说的黑格尔不能思考的东西,即“一台在其纯粹的功能中所定义的机器,而不是在其最终的效用、意义、结果、工作中定义的机器”。那么,也许黑格尔的意识准备做的正是形而上学哲学家——在德里达看来——不应该想做的事情:即“失去自己,失去意识,失去对自己的所有记忆和自己的所有内在性”。也许它是通过成为机器记忆的纯粹外在性来这样做的。

然而,我这样说是不是有点虚情假意?毕竟,意识并没有在机器记忆中完全失去自己——它实际上并没有停止其存在——它也没有缺乏所有的内在性。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正是在其最高外在化的时刻,在成为单纯的机械和非精神的时刻,实现了“最高的表象的意义”。此外,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认为在机器记忆中实现的内在性是所有思想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然而,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机器记忆是否只是保留和深化了理智已经拥有的作为想象力和回忆的内在性,而且它总是希望保持这种内在性,尽管是以进一步“发展”的形式保持的。或者它是否使一种新的内在性成为可能,而这种内在性在这种记忆之前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它不能被设想或预期,而是只有通过心灵的空洞和机器记忆中涉及的想象的、有意义的内在性的丧失才能产生出来?换句话说:机器记忆是否只是被一种精神所重新占有,而这种精神作为其持续的、永远有意义的生活的一个时刻,预期并“提前内化”了所有的内容。或者说机器记忆——与巴塔耶和德里达相比——带来了一种新形式的内在性,而这种内在性是无法预测的,因为它只能通过机器记忆中的内在性的丧失和意义的丧失来实现?如果黑格尔所想的确实是后者,那么这就意味着,黑格尔对死亡、自身丧失和机器有一种限制性的、经济性的看法,认为它只能产生一种预期的回溯的说法被修正了。而德里达也将不得不修改他的假设,即对于一种准备失去意义和失去自身的思维(比如他自己的或巴塔耶的)来说,除了一种神秘的和“延迟的”自身存在之外,没有自身意识或自身存在是可能的。然而,为了表明一种新的、未曾预期且不可预期的、自身存在的内在性确实通过机器记忆中的意义丧失而产生,我们必须更仔细地看一下黑格尔的论点。

在机器记忆的阶段之前,对黑格尔来说,有理智,有内在性,有内在的自身。事实上,表象正是把直觉和感觉的内容带入心灵的内在性,带入“它自己的空间和它自己的时间”,并产生所见和所经历的事物的内部形象的过程。因此,心灵所意识到的表象和想象的内容是由心灵所形成的形象和表象,以及符号所指涉的表象——即意义——组成的。根据黑格尔的说法,除了意识到自己的内容之外,想象的、表象的心灵也意识到自己,“在自身之中”。然而,它只是作为连接它从经验中汲取和形成的形象、表象和意义的活动而意识到自己。正如黑格尔在《哲学百科全书》第456节的补充中所说的,形象有一个感性的具体内容,“它与另一个这样的内容的联系就是我所是”。因此,作为想象和表象,我确实意识到了我自己,我“为我自己”。但我为我自己所做的仅仅是连接、关联和联系——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通过构成我的

世界的材料的具体经验、形象和表象的符号。除了那些我所连接的形象和表象，除了我所拥有的具体的经验和我对它们所做的事情，我对自己没有任何感知。我自己作为一个纯粹的“我”，作为内部性，作为主体性，并没有明显的意识。

在机器记忆中，情况则不同。在记忆无意义的语词时，我把那些与我以前的经验、情感和记忆没有关系的词和声音连接在一起，或者更好的是，我是这些词和声音的连接和保持者。也就是说，我把那些与具体的形象和与经验没有关系的词语和声音连接起来，这些词语和声音的连接、联想、内部化和再现就是我迄今为止对自己的理解。在机器记忆中，我因此切断了自己与那些迄今为止构成我的主体性和内在生活的东西的联系，并失去了这些东西。事实上，如果我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记忆对我没有意义的单词和声音上（比如说，用一种我不懂的语言，如拉丁语），而忽略了到现在为止使我的单词充满生机并赋予其意义的东西，我就不再是我以前所经历的自己。然而，尽管我现在是，并且知道自己是，与我一直以来的身份毫无关系的，但我仍然意识到自己——即作为机械地连接和保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的东西的活动。事实上，这就是我现在所知道的自己：如黑格尔所说的“空的纽带”，它将无意义的名称以“牢固的秩序”固定在一起。我意识到我自己只是作为康德所理解的所有表象综合中的形式统一体的连接的抽象活动，即“先验统觉”。

但是，当然，说我“仍然”意识到自己是这种空洞的纽带是不对的，因为在这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这种空洞的纽带。我认为，这就是黑格尔认为机器记忆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只有通过切断我自己与到此为止构成我自己的具体经验和意义的联系，我才能达到实际上是对我自己的新的意识，即仅仅是抽象的、机械的联系的力量，或者说，“抽象的主体性”。而且，正如黑格尔在《哲学百科全书》第 464 节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只有这种对自己的新的抽象意识才使有可能转入纯粹思维。

现在，当我意识到自己是纯粹抽象的主体性，是单纯连接或“综合”的能力时，在某种意义上，我明确地意识到我一直是隐性的，因为我一直是连接构成我灵设备的表征的活动。但是，我实际上从来没有成为或意识到自己是纯粹抽象的、机械的连接活动。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成为纯粹的抽象的东西，因为我对自己的意识一直是我对我的经验中的具体形象和表象的连接、组合和再现的意识。因此，我不可能预见到这种抽象的自我意识，也不可能期待它成为我对机器记忆的投入的预期回报。我可能知道或被告知，机器记忆将使我能够意识到自己是“纯粹的抽象”，但我永远不可能理解这将意味着什么，因此，我永远不可能因为它将保证我的生命和意义的回报——正如我所理解和一直渴望的那样——而投入于这种记忆。因为我只有通过在我不得不视为完全无意义的、机械的精神活动中实际失去自身的过程中，才能发现这种抽象的意识是什么，意味着什么。

在进行机器记忆的时候，正如黑格尔所设想的那样，我不是在从事一个自身异化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我希望获得我可以设想和预期的回报。相反，这有点像巴塔耶的“牺牲的人”，我正在失去我一直认为有意义的东西，并且在不知道我正在做什么的情况下工作。然而，恰恰是这种我无法看到任何意义的活动，赋予了我对自己一种新的、未曾想象过的意识。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德里达认为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即通过失去自己，出现了一种自身意识和自身存在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可能是对机器记忆和死亡的投入所预期的结果。如果我把这种抽象意识视为这种投入所预期的回报，那么我就会认为它对我这个已经是（在机器记忆之前）并将一直是有的有生命的精神来说是有用的或有益的，因此我永远不会在机械的精神活动中真正失去自己，因为这种活动把我与迄今为止认为是有意义的一切都切断。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将永远不会成为我自己的完全抽象的意识，并希望从中获得回报。

黑格尔对机器记忆的论述表明，他所说的纯粹思维是一种自身意识或自身存在的形式，它不仅不能先于精神的死亡而存在，不能赋予意义，也不能因此而发挥作用，而且只能通过精神死亡，即机器记忆的精神死亡而产生。诚然，按照黑格尔的解释，在思考中，我们将“回

到”对我们自己的更具体的理解，即理性的自身决定的生命（并且确实恢复了我们在机器记忆中失去的整个想象性经验的领域）。但是，事实上，说我们将仅仅在思维中回到我们自身并不准确。而应该是相反的，我们进入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是我们从未有过的，也不可能以那种形式想象出来的。

我相信，这正是德里达在对黑格尔的解释中所忽略的，或者至少是没有强调的。对德里达来说，精神可能会在死亡或机器记忆中失去自身，但它总是由此回到它一直会有东西。对他来说，黑格尔的精神是一种遵循“回归自身的循环回路”的精神，一种“在失去自己之后，通过自己的适当产物回到自己身边的精神”。但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精神对自身的“回归”实际上不是一种回归，不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对自身的重复，而是转入自身，来到了自身，在其中，通过清空自身一直被视为有意义的东西，它变成了它之前从未实际存在过的东西。

必须指出的是，德里达似乎误读了黑格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解释失去了价值。事实上，在我看来，德里达间接地提醒我们注意黑格尔思想的一个方面，如果没有他的著作，我们很可能会忽略这个方面：黑格尔对通过意义的丧失——通过尼采所说的“虚无主义”——成为自由、自觉、自现的人的重要性的赞赏。

德里达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把注意力转向了他所认为的“非意义”的无根性，而意义的基础正是来自于此，也就是说，他认为“意义是被刻在无意义游戏的装置中的某个位置的游戏的运作”。然而，德里达的计划并不是要完全摧毁意义；他会认为这样的事业是愚蠢且不可能实现的。相反，他的计划是，在有意义的、可理解的话语中，让自己向所有这些话语中固有的或“铭刻的”失去意义的必要的可能性开放——他称之为意义的“绝对丧失”。而这则是通过提请注意那些不连贯性、重复和非意义的痕迹——而它们总是结构（和解构）了我们认为的、并将永远认为是可理解的东西——来实现的。按照我的理解，德里达追求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为了使意义和可理解性比它们迄今为止被认为的更加神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他认为指导着传统意义追求的权力意志。

在我看来，这就是德里达的计划，但它不完全是黑格尔的计划，我不建议我们忽视这两位哲学家之间的差异。毕竟，黑格尔关注的不仅仅是使可理解性变得神秘，而是展示自我意识和自由的新形式如何从先前形式的崩溃中出现。然而，如果我们从德里达的著作转向黑格尔的著作，我们肯定会被黑格尔的“准德里达”所打动，他对穿越无意义对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出现的重要性非常关注。事实上，几乎可以说，黑格尔也意识到，某种意义只有在“……非意义的无根性”中才有基础。例如，我们注意到，《逻辑学》是从纯粹存在的范畴开始的，也是从“空洞的语词”——“存在”——开始的。我们注意到，在《精神现象学》中，苦恼意识通过“表示和谈论”对他们来说一些相当陌生且没有意义的东西，从“感激”意识的欺骗中解脱出来。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机器记忆的重要性。

与德里达不同的是，黑格尔是一位拥护，而不是寻求解释神秘的自我意识的哲学家（尽管我应该指出，黑格尔实际上对自我意识有一个比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的更具社会中介性的概念）。黑格尔与德里达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不是一个先验的，或者说是“准先验”思想家。然而，正如我希望在这篇文章中所展示的那样，这两位思想家之间也有一些有启发性的相似之处。有些人无疑会怀疑，我所描述的黑格尔实际上从未存在过，而且，像尼采一样，只是在其本人死后（在一个尽管是不知情的德里达作为助产士的相当大的帮助下）才诞生的。然而，我相信我所描述的黑格尔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熟悉。事实上，我的信念是，根据德里达的著作来阅读黑格尔——尽管与德里达自己对黑格尔的解释背道而驰——只是使我们能够比以往更清楚地看到黑格尔本人“总是已经”是什么。

多年来，斯拉沃热·齐泽克反复强调，他的全部思想努力的基本关切以及压倒一切的知识野心是论证德国观念论的“类我思”的主体与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的死亡驱力之间的反直觉的同一性。与这种强调相一致的是，这种表面上的对立面（即主体与死亡驱力）的重合的短路也在《少于无：黑格尔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和《绝对反冲》中占据中心位置。在这两部分别来自 2014 年和 2012 年的哲学著作中，齐泽克关注的是将黑格尔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雅克·拉康的力比多经济学理论（涉及死亡驱力）进行对抗。齐泽克提出的死亡驱力以及拉康对驱力和欲望的区分，都要求黑格尔的哲学进行某些修正和改变，但同时也被这一哲学所预示。

在《少于无》一书中，齐泽克甚至将死亡驱力当作黑格尔主义的终极核心，是这种哲学既不能有也不能没有的东西。齐泽克强调毫无根据的偶然性作为黑格尔主义绝对性的原始模态相一致，他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即黑格尔体系的主要动力）认定为“死亡驱力或重复的强迫”。在其粗暴的、愚蠢的事实性——即一个反复循环的运动——中，表现出一种类似于机器自动装置而不是人类主体的无意识的、愚蠢的特征。齐泽克在这里展示了一个（看似）对立面的融合，其中意义/的高度（黑格尔辩证系统的绝对理念，作为逻辑和现实的范畴和概念的整个综合网络）与无意义/废话的深度（一种非辩证的重复性使黑格尔系统成为可能，但同时也永远逃避这个系统的理解）相吻合。齐泽克在《少于无》中提到的四位后黑格尔主义者（即索伦·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拉康和吉尔·德勒兹）中，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拉康，这并不奇怪。拉康精神分析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允许对黑格尔的哲学预设（作为对其“概念”的尊严的提升）进行事后的明确，并等待通过其延迟的假定（自为地）来实现。拉康对驱力和重复的精神分析概念被齐泽克作为“假定预设”的关键提出来，而这些预设确切地说是黑格尔关于偶然的绝对和它的辩证发展的隐含概念，其被一个不可辩证的否定性不断地重复它自己的运动所推动。稍后，我也会把齐泽克对德勒兹的引用，与拉康自己对德勒兹哲学的零星引用结合起来。

正确地理解和评估齐泽克对精神分析驱力理论的认同，用拉康的话来说，就是“在黑格尔那里比在黑格尔本人那里更多”，这显然需要考察齐泽克本人是如何将驱力总体上和死亡驱力具体概念化的。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默认，但大量地依赖我在《时间驱动：元心理学和驱力的分裂》一书中对弗洛伊德、拉康和齐泽克的驱力和力比多经济的描述的重建。我在《齐泽克的本体论》一书中进一步探讨了齐泽克在 2012 年之前对元心理学的驱力理论的解析，这些探索同样也是下文的背景。现在，在目前的干预中，开始这个特殊研究的最好的位置是齐泽克基于对拉康的某种解释，在驱力和欲望之间做出的区分。事实上，齐泽克的驱力概念完全依赖于这种区分。

在《少于无》中，驱力与欲望的对照被齐泽克多次引用。其中，对这种差异的第一个也是最实质性的阐述，也是一个最初的阐述，随后在《少于无》和《绝对反冲》中对这一主题的回归，是这样开始的：

从哲学的角度看，驱力意味着什么？在一个模糊的普遍意义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转变与从欲望到驱力的转变之间存在着同源性：康德的宇宙是欲望的宇宙（围绕着匮乏、不可触及的“本体”而结构），是无休止地接近目标的宇宙，这就是为什么为了保证我们伦理活动的意义，康德必须假设灵魂的不朽（因为我们在地面上的生活中无法达到目标，我们必须被允许继续无限地前进）。相反，对黑格尔来说，“物自体”并非不可触及，不可能确实在此时此地发生——当然，不是在天真的前批判意义上获得超越事物的秩序，

而是在适当的辩证意义上转移视角，将（将我们与“物”分开的）差距设想为实在。就满足而言，这并不意味着，与构成性的匮乏的欲望相比，驱力通过达到逃避欲望的对象而实现满足。的确，同欲望相比，驱力在定义上是满足的，但这是因为，在驱力中，满足是在反复到达对象的失败中、在反复围绕对象的过程中实现的。

齐泽克的开场动机是上面所讨论的问题，即拉康精神分析的驱力理论是在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的辩证法中回溯地设置一个关键前提（即辩证否定性的不断、持续的不安）的最佳手段。此外，他在这里将伊曼努尔·康德和黑格尔分别与欲望和驱力联系起来的方式，强化了他的黑格尔主义的异端性。换句话说，齐泽克的黑格尔以一种齐泽克著作的欣赏者所熟悉的姿态，突然将康德的认识论失败（等同于拉康的欲望的“歇斯底里”的“那不是它！”）直接转化为本体论的胜利（等同于与拉康驱力的“倒错”的“就是这样！”）。换句话说，齐泽克的黑格尔主义涉及一种无休止和强迫性地重复享乐的否定性，一种自动的、非人道且无意义的围绕某些重心的轨道，其类似于物理学中的黑洞和/或数学中的吸引子（即齐泽克的“纯粹驱力”）。

在《少于无》和《绝对反冲》中的许多其他段落都对这种将康德和黑格尔与欲望和驱力联系起来的方式进行了润色。对于齐泽克来说，这个推动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动力学的核心动力机制是驱力和欲望之间的元辩证的“视差”。换句话说，齐泽克对黑格尔哲学以对精神分析、驱力理论的重新审视，非常刻意地表明了一些非辩证的东西（即知性的二元对立）产生并支撑着辩证的东西（即作为思辨辩证法的知性）。同样地，当齐泽克说到“打破我们所处其中的连续的整全的‘驱力’，引入了一种根本的不平衡”，这可以被理解为准确地捕捉到黑格尔的后斯宾诺莎的、反谢林的坚持，即“不仅作为物质，而且同样作为主体来把握和表达真理”，而（被齐泽克确认为等同于（死亡）驱力的）主体性是实体性（即我们被嵌入其中的“连续性的整全”）从内部和外部（因此，后者以适当的黑格尔方式，是自我分裂和自动辩证的）破坏这种实体性。因此，在齐泽克的论述中，“主体”和“驱力”这两个名称，在德国观念论和精神分析中，分别是对同一事物的名称，即一种存在的否定性，既由接地的实体产生，又同时干扰了一连串的（粗略）等价物，包括：绝对、一、全部、无限、整体、整体、整体，等等产生。

在《少于无》中，齐泽克进一步丰富了驱力的概念，（除了已经与欲望进行的对比）他将驱力与本能进行对比。虽然在进行这种对比时没有直接提到黑格尔的名字，但齐泽克这样做的方式从根本上表达了他的一种矛盾心理。在这种矛盾的积极方面，齐泽克的特点是纠正了对黑格尔主义的某些标准的、通俗的（错误）解释。关于黑格尔对人类和非人动物的区别，齐泽克警告说，不要把这种特定的哲学人类学解释为一种目的论发展的直接进步的叙述，在这种发展中，简单的动物性被相对更复杂的人类所取代（零度的“人化”不是动物活动的进一步“中介”）。“人化”的零度不是对动物活动的进一步“调解”，而是将其重新归入一个更高的整体的从属的时刻（例如，我们吃饭和生育是为了发展我们更高的精神潜能）。齐泽克清楚地记得《哲学百科全书》中关于人类“灵魂”的著名讨论等例子。他认为，人类动物通过对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基础（即重复的、狭隘的、习惯的、固定的、被阉割的等等）的集中，成为适当的（作为（部分）去动物化的）人类。

此外，当齐泽克断言“人把对动物来说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视为直接目标”，这暗指了弗洛伊德和拉康对具体的人类力比多经济的独特特征的描述（此外还暗指黑格尔的哲学人类学）的各个方面。至于弗洛伊德，我们可以把弗洛伊德的口欲期概念作为一个典范的例子：在人类婴儿的情况下，获得营养的本能的饥饿感会投注于作为营养物质的乳汁，而口欲则寄生在这个本能的旁边，代替了诸如乳房的感觉-知觉表象和吸吮时口腔的重复运动（也就是说，用齐泽克的话说，是满足本能饥饿的“单纯的副产品”）。至于拉康，我不禁想起他在1950年代早期在《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中对镜像阶段的阐述中的一个幽默

的时刻。在那里，他对比了人类和非人灵长类对镜面反射的反应。非人灵长类动物很快就意识到镜中的形象不过是一种假象，是一个并不存在的真实同类的扁平的、肤浅的幻觉，然后很合理地对它失去兴趣，因为它是不真实的，而人类则永久地迷恋于这种形象，被引诱到虚拟现实的幽灵漩涡中，在这种漩涡中，外表、虚构、假象等等变得比任何“真实”的东西都更有价值和更重要。在这个场合，拉康不仅是在进行幽默的人类自嘲（人类的白痴属性使其一次又一次地愚蠢地落入海市蜃楼——和人类关系最紧密的动物近亲随时明智地拒绝这种欺骗）——他也在抨击他的死敌，伪弗洛伊德式的自我心理学家，对他们来说，“适应现实”是人类心理健康的一个黄金标准。拉康的反驳是，人类的一个标志特征是对现实的原初的不适，喜欢虚幻的图像和虚构的幻觉的非真实性，而不像非人的动物那样——包括其他灵长类动物——所喜欢的适应性的现实。这样说的其中一个含义是，自我心理学坚持要求病人“适应现实”，这实际上是一种非人的做法，这是对所谓的“人类状况”的基本方面惊人的视而不见和听而不闻的。

但是，回到黑格尔，在齐泽克对他消极方面的矛盾心理来说，他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有时恰恰陷入了在《少于无》中同一时刻的积极的、正确的黑格尔的言论所要纠正的伪黑格尔主义。尽管有相反的可能性，但这不应该成为一种冲击，因为齐泽克在《少于无》和《绝对反冲》中都明确表示，对于他所选择的基本参照点（如黑格尔、卡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一般解释方式是一一至少在合适的时候一一将它们与自己对立起来，从而使“X”（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拉康……）中的外在因素曝光出……比“X”本人更多的东西（“真正伟大的思想家的特点是他们错误地认识到他们自己的突破的基本维度”）。齐泽克把这种批判-注释的程序描述为“用弗洛伊德来反对弗洛伊德，或者用黑格尔来反对黑格尔”，并且他同样认为“超越拉康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拉康来完成的”。《少于无》指出了一些主题，如乌合之众的贫困、数学化的实验科学、精神分析的无意识和弗洛伊德-拉康的驱力（尤其是死亡驱力），可以说只有在黑格尔主义经历了涉及到了内在的自我批判的重大蜕变（即黑格尔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时，才能被黑格尔主义所解决和吸收。

在齐泽克看来，黑格尔把人类的性行为错误地处理成了一种要从属于家庭的社会-象征中介的准动物，而家庭本身就是伦理的要素。但是，由于其对人类心理主体的主要的无意识的、以驱力为中心的、性欲-力比多经济的概念化所带来的分析式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准确地看到了这种——在黑格尔体系中的其他地方，而不是黑格尔所意识到的——性欲，及其日常和非日常的迷恋和固着。（即在“主观精神哲学”的“人类学”中——而不是在后来的“客观精神哲学”中——灵魂和它的习性如此接近又如此远离动物性）。从齐泽克的角度来看，并不是说黑格尔的体系完全不能容纳诸如人类性行为的精神分析理论这样的后黑格尔的发展，且被它们所淘汰。相反，这个体系据说可以容纳它们，但其方式与黑格尔本人可能赞成的方式不同。忠诚需要一定程度的背叛——这一辩证法的真理既适用于与辩证法思想家的关系，也适用于与非辩证法思想家的关系。

正如我们所见，齐泽克对拉康式的驱力和欲望之间的区分的演绎，非辩证地将它们对立起来，而且将这种对立视为辩证过程的元辩证法发动机。在这里，我想提出，齐泽克的拉康式的“驱力”和“欲望”之间的区别，本身就是人类存在的本能的失败，是自然界的弱点的症状，它缺乏强有力的原则，它的粗心马虎、疏忽松懈使得足够有功能的畸形增生成为可能。为了更精确地了解细节，我可以首先指出，进化的自然史最终导致智人配备了中枢神经系统，它涉及情感、动机和认知功能，在神经生理学意义上分布于从脑干到新皮质的不同神经解剖学情景中。更重要的是，表观遗传学和神经可塑性使这个进化的大脑自然地倾向于后天培养而非自然——在躯体-生物-物质方面的预先编程——的主导地位，以便在心理-社会-象征方面重新编程。由于这些特定于人类进化的神经生物学中的自然变量——由于这些变量，进化中的本能动机和情感功能与进化中的新认知功能相联系，并以之为媒介——在人类个体内

部，本来是动物的本能总已经是被转变成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元心理学所说的人类的驱动力了。

更确切地说，特别是对于拉康和齐泽克来说，驱动力和欲望可以根据前面的内容理解为在非人动物中依然存在的、内部没有冲突的本能的两面的分裂和生成-对抗。也就是说，本能既要求意图和行为的固定模式的反复出现（就像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中的重复一样），也要求朝着特定的目标前进（就像弗洛伊德的快感原则一样，它有获得快感和避免痛苦的双重目标）。此外，这种动物的有机本能（与人类有机体的笨拙的“无机性”及其万花筒式的、拼凑在一起的驱动力形成对比）通常倾向于体现出重复和目的论的和谐综合。这些综合在非人类动物中偶尔会出现——主要是由于外源性的干扰——的断裂。换句话说，如果环境变化导致这些本能从适应变为不适应其变化了的环境时，本能支配的重复就不再有效地朝着某些目标发挥作用。

但是，在人类（而不是非人）动物中，动机/欲望力量和因素层面的不适应是内生的规则，而不是外生的例外。更具体地说，齐泽克对拉康驱力-欲望的区分可以被重塑为重复性和目的性的分离（即在非人类动物的本能中，除非受到外部突发事件的干扰，否则它们是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可以说，这个裂缝正是由神经生物学上的进化打开的，它将动物本能的情感和动机功能广泛地分配在人类在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上的异质的、多变的情感、动机和认知上。这种分配也许是一种过度的延伸，它在人类力比多经济结构中带来了裂痕和撕裂，这些裂痕和伤口成为了这些经济的组织原则。

简单地说，拉康-齐泽克的驱力可以说是包含了一无目的论和拉康-齐泽克的欲望——重复的。根据拉康在驱力的“目的”和“目标”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与驱动力和欲望之间的区别密切相关），一个被拘束了目的的驱力可以获得满足，就像弗洛伊德把升华的主要特征描述为一个被拘束了目的的驱动力的满足，正是因为它有一个被拘束了目的之外的“目的”（即拉康的“目标”）。拉康的理由是，根据弗洛伊德自己的主张，如果所有的驱力都以满足为目的，而且即使它们的在这些目的被抑制的情况下，也能通过升华实现“满足”，那么，在驱力中一定有一个“目的”——“满足”的回路，而不是快感和现实原则之间的那个。可抑制的弗洛伊德-拉康的（驱力）的目标将涉及“满足”，就像快感原则一样。“快感”是指满足、幸福、平衡、福祉等等这些。相比之下，拉康的（驱力）目标包含了另一种“满足”，而这不是快感原则的目标，这无非是无目的的重复（即没有目的论的重复）的愚蠢的原乐。换句话说，拉康，贴切地说，把作为满足的快感的目标与作为另一种“满足”的原乐的目标明确地进行了对比。

这一点，这种快感——齐泽克式的“僵局”——即没有冲动的“快感原则”所强加的目的论，也可以是来自于围绕着它的“固着”的无休止的旋转。从驱动力和欲望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有很大的区别，但都涉及目的论），这是一种对有时甚至是无意义的、适得其反的、自我毁灭的东西的快感。这样的“快感”（通常在意识上是不愉快的）可能在生物意义上是通过（即使承认远远这没有通过详尽的解释）神经进化的裂缝的开启而成为可能，这条裂缝使得脑干层面的情感、动机结构和动态（特别是那些所谓的情感神经科学的“寻找系统”，见雅克·潘克塞普和那些志同道合的研究人员）与新皮质层面的认知结构和动态脱钩。这条裂缝的前一边可以说是支持无目的论的情感上的强烈的、充满欲望的重复（即弗洛伊德的驱动力的源头和压力，或者说是拉康的无-无目的驱力，又和/或是我在《时间驱动》中所说的“迭代轴”），而同一条裂缝的后一边可以说是支持表象性的、类能指的差异/区别，并同时伴随着其目的论（即弗洛伊德说的目的的驱力对象，或者拉康的欲望及其相互关联的原质和对象-原因（对象a），又和/或是我在《时间驱动》中所说的“改变轴”）。

在单一的人类生物体的本体中，进化对生命的繁荣或凋零并不关心，以及在种群而不是个体规模上的有“足够好的生存时间来繁殖”的低标准，这些都允许出现这种代表远非最佳的



裂缝，它将本来是有机动物本能分割成人类特有的无机的分裂驱力。这样的自然-历史的起源大概带来了某些进化优势，即那些由于进化的新皮层（其本身允许智能生物比有知觉但没有智能的生物有得以从事更精细的、更长期的和/或更大的合作、计划、预测、反应等）而产生的智慧。但是，似乎也有许多缺点可归因于这个相同的起源。从神经进化的角度来看，这些缺点是由内在的自然或进化产生的前新皮层本能的重新组织而产生的，从而进化的新皮层使智人的本能的回路成为驱力的回路。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它们是《时间驱动》中详述的人类特有的力比多障碍，是该书副标题中提到的“驱力的分裂”的症候。然而，只要在整体物种规模的平衡上来看，这种劣势就不会导致智人作为一个整体——人口的规模聚集——而在生物学上无法生存繁衍而被赶至灭绝，于是，次优的、引起不满的驱力机制就被允许继续运行。在自然进化中，没有被禁止的东西就是被允许的。在这种允许下存在的东西的典范是一个奇怪的、孤立的物种，它的许多成员是悲惨的可怜虫，不知疲倦但不知不觉地以各种方式反对他们自己的幸福和繁荣——正如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适》中的著名的观察，即使这个物种凭借其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现代进步而迅速获得了适应能力，但这个物种似乎反常地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

除了驱力，按照拉康和齐泽克的说法，欲望呢？正如我在上面指出的那样，拉康-齐泽克的驱力体现了无目的论的重复，而拉康-齐泽克的欲望代表了无重复的目的论。我对后者的想法是，在这个精确的技术意义上，欲望永远总是以双面的目的为导向的，即在前时间的本体生成的过去中永远已经失去的真实之物——即原质，和在永恒的未来中永远尚未到来的幻想之物——即对象 *a*。此外，这两个目的——原质的不可挽回的丧失的原乐和对象 *a* 的对从未得到的原乐的预期——共同构成了彼此，这样，对象 *a* 是一个过去的原质的向前投射到未来，并且，相关地但相反地，原质是现在和未来不可实现的对象 *a* 的向后投射到过去。拉康的“欲望”，在它的许多其他特征中——其永久的、不安分的、超越自身的、在不可能达到的目的的方向上不断地感到不满足——的本质上是目的论的。拉康所说的欲望，本质上是目的论的，其在不断地不满足于其在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的方向上不断地、躁动地超越自身，正如齐泽克正确地强调的那样，欲望无一例外都是失望的“那不是它”。

有趣的是，这种欲望看起来似乎与本能和驱力的不同方面都有相似之处。更确切地说，本能和驱力有共同的重复性，即以某些固定的方式反复思考以及对行为的基本要求，这是弗洛伊德给重复的自动性贴上的一种力比多-动机的禁令。然而，与非人动物的本能不同——这些本能最终根植于进化中的原始哺乳动物的脑干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人类的驱力通过进化中的解剖学意义上的高级新皮质神经和神经生理学意义上的认知回路来实现这种重复性倾向。这种神经内的中介，通过跨越脑干到新皮层的差距，将动物的本能转化为人类的驱力，这同时也带来了神经外的中介——这是因为新皮层的表观遗传学和神经可塑性，作为某种实在，硬连接/预编程这个皮层，比身体更多的、非生物的、非自然化的维度进行重新连接/重新编程，包括经验-现象（即想象）和社会与社会结构的（象征的）。通过这些身体内部和心理外部的分配/再分配和中介/元中介，在自然和人类历史的纠结交汇处，本能被撕裂成为人类特有的分裂驱力，并被精神分析独特地理论化。

我不打算对拉康的欲望提供详尽甚至彻底的描述，但我想说的是，在目前的讨论中，这种欲望可以被描述为动物的本能，在智人个体成员的本体发育水平上，它已经脱胎换骨地成为人类的驱力。拉康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贯地将欲望的特征归结为一个相互关联的三要素，其中也包括“需要”和“要求”，这可以用 21 世纪早期（后）拉康的神经精神分析的后见之明来解释，即预见到我在这里提出的东西。按照这个拉康的说法，需要非常类似于本能，是一种定期重复的自然生理需要。对于一个甚至在生物出生的实际时刻之前就被扔进一个预先存在的跨主体的中介矩阵，并注定要成为一个“言说的主体”的生命体来说，这些实在是需要由周围的想象的他者和象征的他者强加给婴儿的限制，是被迫承认社会认可的、语言象

征化了的被（错误）形式传达的要求。无论是弗洛伊德的驱力-原因还是驱力-压力（即我所说的迭代轴），还是拉康的身体-需要，人类有机体的生物物质的各个方面都被成群的社会象征规则和表象所殖民和覆盖。因此，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心理驱力的目的和驱力对象（即我的改变轴）的超感官的意识形态表象使驱力的来源和驱力的压力非自然化和转移了。在拉康的术语中，这涉及到他者和他者的想象现象和象征结构所限制的真实的身体要求，这使得其（错误地）转化类能指的形象和文字（即需求被表述为要求）。弗洛伊德-的驱力源头和驱力-压力以及拉康的需求都是力比多经济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被描述为，单独的，人性的本能成分。当然，正如生物的表象和能指所已经引导和过滤的那样，自然倾向于培育自然的优势，这些本能的特征无疑从未被分析性的临床医生和元心理学家在某种未被稀释的纯净状态下直接遇到和处理（弗洛伊德和拉康都以不同的方式承认了这一点）。然而，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框架中，它们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令人信服的预设条件。更重要的是，对于任何弗洛伊德和/或拉康的继承者来说，如果他也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无论是齐泽克、我自己，还是其他什么人），这些生物力量和生物因素必须被承认，并给予他们适当的位置。

与拉康反复谴责将“驱力”误译为“本能”有关的是，他有时坚持认为“驱力”最好译为“漂移”。的确，驱力确实被很好地描述为漂移——因为自然本能在超越自然的中介（无论是作为弗洛伊德的身体来源和压力被转移到目和对象的心理表象中，还是拉康的身体需求被强行通过身体以外的能指表达）中漂移。但是，再一次，拉康的“欲望”呢？

弗洛伊德的驱力源头和压力以及拉康的需求都引起了重复，引起了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重复的自动性对欲望的冲击，而且它把欲望推向无休止但徒劳的尝试与再尝试，以试图掌握“它”（即原质，在对象 a 中的化身），但其结果总是令人失望的“那不是它！”除了这些无情重申的“要求工作”（借用弗洛伊德对驱力源头和压力的重复坚持的说法），拉康的能指理论是一个与欲望的解释不可分割的理论，它认为能指同时是重复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条件。一方面（即重复的可能性条件），（无论是文字还是图像的）类能指的表象使力比多经济及其主体能够将自己定位于某种追求，即弗洛伊德所说的“重新寻找失去的对象”，一次又一次寻找那些被标记和识别为“相同”的东西（即“它”）。但是，另一方面（即不可能重复的条件），能指结构的动力学使重复本身产生了差异，每一次重新寻找都是一次重新失去，每一次对同一性的持续回归都清算了这个相同的同一性（从而导致了“一次又一次”）。

拉康的欲望产生于对需求的强制（错失地）转化为需求的能指。因此，可以说，欲望被夹在两种重复性之间：第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类似本能的生命需求的重复的自动性，即反复坚持按照它们的要求进行劳动。以及第二种，由被印在人类动物身上的能指所促成和产生的可重复性，而人类动物也因此成为一个言说的主体。我在前面声称，按照拉康的说法，欲望可以说是涉及无重复的目的论的——这与拉康的驱力作为无重复的目的论形成了对比。然而，我现在可以也应该细化这一点，指出欲望的“无重复”应该更准确地说成是没有成功的、令人满意的重复（或者，正如拉康在第十次研讨会（1962-1963）上所说的，“欲望却‘并非完全没有’重复”）。也就是说，拉康的欲望——无论是否被认为与本能、弗洛伊德的驱力源头和驱力压力、拉康的需要和/或拉康的驱力有关——不断地被推向徒劳的、西西弗斯的努力，以达到目的，而目的的必然不可达性往往被欲望主体误认为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

在欲望的“这不是它！”的呼喊中，至少有一种音调是由动物本能中固有的目的论倾向的残余所促成的。换句话说，欲望的“一次又一次”可以被理解为包含了无能的（就像黑格尔的虚弱自然）自然本能对非自然化的驱力的无-目的论-重复——后者对失败的“反常的”原乐——的抗议，对不知疲倦地、毫无意义地绕过从未达到的目标的抗议。拉康的驱力是对偏离目的论的路线的享受，而拉康的欲望则不享受这一点，而是专注于其不断消退的过去和未来。就像本质上失败的本能总是在“快感原则之外”运作一样，欲望是在不可能的、注定

失败的目的论中的不满足的僵局。

我很想说，本体论的欲望通过需要进入需求而出现，而这部分地涉及到了本能成为驱动力的系统发育的重演（更准确地说，是新皮质的进化及其对情感和动机的大脑功能的中介作用的承担）。此外，后者可以说是前者的一个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力比多经济的非自然化的社会-象征的填充和规定（如用要求的能指覆盖身体的需要），部分是由于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而成为可能，其中高度可塑性的新皮层在内源性的基因编码和外源性的表观编码中发挥了与情感-动机的回路有关的关键作用。由于这样一个认知皮层能够接受生物体周围无数种环境的影响和铭刻，本能变成了驱动力，而驱动力本身则被分割成一个无-目的论-重复（即弗洛伊德的驱动力-目标和驱动力-对象，拉康的欲望和我的改变轴——都取决于进化的人脑的认知回路）和无-重复-目的论（即弗洛伊德的驱动力-原因和驱动力-压力，拉康的驱动力和我的迭代轴——它们都取决于人脑的情感和动机回路以及整个身体的其他部分）。

现在是时候绕回来与齐泽克本人重新接触了。在这次介入的最后，我将试图证明我对精神分析驱动力理论的重新审视，为什么，以及如何解决我认为是他在《少于无》和《绝对反冲》中重新创造的拉康的驱动力-欲望区分所导致的某些问题。但是，在这样结束之前，齐泽克对前面提到的僵局的概念的思考是值得考虑的。

伴随着驱动力-欲望这个对子，并且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僵局”是贯穿《少于无》和《绝对反冲》的始终的一个惊人的反复出现的主题。关于这个主题，齐泽克隐含地依赖于我不久前强调的拉康能指逻辑的一个特征，即在对立面的巧合/融合中，重复在类-能指的结构和动态中产生差异。齐泽克在 2012 和 2014 年的书中所提到的关于黑格尔的中心论点之一是，黑格尔的辩证-思辨哲学从根本上依赖于重复产生的差异：

我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黑格尔的一个基本常识性批评的错误之处：“黑格尔总是预设运动在继续——一个命题被它的反题所反对，“矛盾”被加剧，我们被转到新的位置，等等，等等。但是，如果一个时刻拒绝被卷入运动，如果它只是坚持（或者说任命于）其惰性的特殊性，那该怎么办？”好吧，我和我自己不一致，但那又怎样？“我宁愿呆在我的位置上……”这种批评的错误在于它忽略了一点：这远不是一种威胁性的异常，这不是一种“正常”辩证运动的例外，这——一个时刻拒绝陷入一种运动，它坚持自己的特殊身份——这正是通常发生的事情。通过坚持它是什么，拒绝承认它的对立面的真实性，他在这个时刻恰好变成了它的对立面。

这种将顽固的重复逆转为激进的差异，这完全符合拉康的能指逻辑。此外，齐泽克非常正确地指出，与各种抱怨和反对意见相反，黑格尔确实允许对他所追随的辩证-思辨轨迹进行抵制和反击。

但是，在《少于无》的题为“黑格尔的局限性”的一章（第七章）的开头，齐泽克指出，按照前面的整段引文所述，在重复与差异之间采用（拉康式）辩证法是黑格尔本人所不具备的一种自我解脱的举措。齐泽克在这里声称，黑格尔所错失的“纯粹机械重复的过度”，无非是弗洛伊德-拉康式的死亡驱动力。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在齐泽克看来，死亡驱动力是黑格尔主义的一个外在核心，是“在黑格尔身上比黑格尔本人更重要的东西”。显然，齐泽克相信，后黑格尔主义精神分析的驱动力理论与对 21 世纪所重新发明的黑格尔主义的兼容性来说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在这种情况下，“少于无”后来甚至把重复的死亡驱动力式的僵局的重复等同于对黑格尔本人来说如此重要的否定性。通过与广义的“东方”的对比——更具体地说，齐泽克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他最喜欢的“恶人”，即“西方佛教”——他将他的黑格尔辩证法与弗洛伊德-拉康的死亡驱动力融合在一起，作为“西方否定性”的象征（大概是与东方或伪东方的肯定性的非辩证地对立）。此外，回到我之前对弗洛伊德、拉康和齐泽克的（死亡）驱动力和欲望的讨论，我认为将齐泽克的西方否定性与拉康的欲望的类似死亡驱动力的维度（而不是像齐泽克那

样直接与死亡驱力/死亡驱力本身）联系起来更为准确。对拉康本人来说，纯粹的重复（即作为辩证的自我颠覆的重复）的不可实现性与一般的能指逻辑和具体的以能指为中介的欲望有关。诚然，欲望重复地坚持着它对被包含在对象 a 内的幻象性的伪装中的不可能的实在之原质的不愉快的追求。因此，齐泽克并不是在没有理由地重复源自弗洛伊德在 1920 年所说的死亡驱力这一概念。然而，鉴于齐泽克在《少于无》中所表达的，西方黑格尔式的否定完全依赖于将自身升华为差异/新奇的重复，这种当代（新）黑格尔主义的精神分析的灵感看起来并不像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反而更像是拉康的言说的主体的欲望。

当然，在精神分析和二十世纪法国哲学/理论也在发挥作用的背景下，将“重复”和“差异”这两个词联系起来谈论，不能不让人想到德勒兹和他 1968 的代表作《差异与重复》。众所周知，拉康本人不仅对《差异与重复》赞不绝口，而且对德勒兹的《冷酷与残忍》（1967）以及《感觉的逻辑》（1969）同样给予了高度评价。尽管拉康和德勒兹的取向之间存在着紧张和不相容的关系——正如我稍后要讨论的那样，但在《少于无》和《绝对反冲》中的齐泽克在重复、差异、驱力和欲望方面都尖锐地涉及到了拉康和德勒兹之间的这些摩擦——这与拉康对 1967-1969 年非-加塔利化的德勒兹的热情并不是错位的。德勒兹哲学的某些方面确实与拉康的精神分析产生了惊人的交叉共鸣。与此相关的是，鉴于他将黑格尔的否定性等同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驱力的滞后性，齐泽克认为《差异与重复》中对重复的描述——就其公开反对黑格尔式的作者而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相当黑格尔的。

在这个特定的语境中，适合强调的第一个方面是德勒兹的论点，根据这个论点，重复与它们展开的一系列差异性的迭代是不可分割的——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通过对弗洛伊德的重新审视（即当重复的自动性和死亡驱力成为明确的关注点）时，阐明了这个论点。此外，在《意义的逻辑》中，德勒兹指出一点，即“死本能”“不仅仅是其他本能中的一种，而是所有本能聚集的裂缝本身”。尽管德勒兹对弗洛伊德和拉康在驱力和本能之间的区分的漠视是很奇怪的，这一漠视是相当非精神分析的，这通过他说的死本能（而不是死亡驱力）表现出来。这一陈述已经在《冷酷与残忍》中被预示了，它浓缩了我之前提到的一些（弗洛伊德的、拉康的和/或齐泽克的）驱力理论思想的回声，即死亡驱力本身并不是一种驱力，而是每一种驱力的特征，（根据弗洛伊德关于死亡驱力的推测之一）是驱力的特征。这种死亡驱力的特征涉及到破坏快感原则的重复，在快感原则之外、背后或下面的重复的自动性。死亡驱力（类似于所有驱力的性质）的否定性的裂缝，它在力比多经济中形成一个重心（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驱力理论的基础上，我从《时间驱动》开始就将驱力之为驱力分为迭代和改变轴的驱力，这可以说与德勒兹的“裂缝”以及他对差异（改变）和重复（迭代）的配对相吻合）。当拉康在第十六次研讨会上对德勒兹的“空白”或“缺失”的形象表示赞赏的时候，认为它抓住了可称为“结构主义”的本质的东西（在《感官逻辑》以及相关文章，比如《如何认识结构主义？》中的德勒兹），这暗示了德勒兹式的否定性（包括德勒兹在《意义的逻辑》中与塑造所有与驱力的致命裂缝相关联的东西）与拉康式的实在相重叠，因为它无意识地扰乱了想象-象征的现实（尤其是象征秩序的大他者）。齐泽克赞许地对德勒兹进行了类似的解读。

在德勒兹的《冷酷与残忍》中，由于其对受虐狂的关注，所以包含了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死亡驱力的延伸讨论。事实上，它的第十章和倒数第二章的标题是“死本能”。在此，德勒兹准确地认识到，弗洛伊德在《超越快感原则》中，主要关注的不是这个“超越”，即彻底和完全地对立于或者直接取消快感原则，尽管人们对这本 1920 年的书的印象和解释都是这样相反的。事实上，德勒兹的论述得到了弗洛伊德文本细节的充分支持，其强调了与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密切相关的重复性（作为强迫性重复）——特别是在快感原则之前或之下的一个先验维度的意义上——是“超越”的。也就是说，德勒兹将死亡驱力具体地与重复联系起来，将其作为一种可能性的条件，通过弗洛伊德所认为的这种重复所带来（或试图带来）

的“约束”，将快感原则作为此后普遍主导心理生活的管理倾向。这种强迫重复是为一种可靠地倾向于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力比多经济铺平道路的无根据的基础。但是，作为快感原则的先决条件，这个重复的自动性本身并不受它之前和它帮助建立的法则的制约。换句话说，重复在促成快感原则的过程中，并不一定遵守这一原则。一年后，《差异与重复》重申了这些观点。

在《少于无》中，齐泽克重新阐述了拉康在驱力和欲望之间的区别，并将前者与僵局联系在一起，并且很好地引用了德勒兹。但是，当拉康和德勒兹关于驱力和欲望的立场的话题在《绝对反冲》中再次出现时，后者在齐泽克手中的表现比他在《少于无》中差得多。齐泽克在对德勒兹的批判中，重述了拉康的驱力和欲望之间的区别。在《绝对反冲》中，相关的参考文献和主题充实了驱动欲望的对立，这些是齐泽克理论戏剧中相当熟悉的组成部分：康德-黑格尔的关系、量子物理学的例子、拉康的性差，等等。此外，齐泽克在此 2014 年的背景下调用的视差分裂的主题（即黑格尔式的对康德式二律背反的本体化）与他最近的主要哲学作品中的论题产生了共鸣，根据这一论题，辩证法被非辩证法所激活，以不可能化约和不相容的对立作为任何投入辩证法的元辩证法的可能性条件。沿着这些路线，《绝对反冲》，就像之前的《少于无》一样，把拉康式的驱力-欲望的张力，一个所谓无法逾越的视差鸿沟，作为精神分析的力比多经济的辩证法的元辩证法动力。

齐泽克一开始就指名道姓地提到了德勒兹的力比多-经济问题。在西方哲学史的大背景下，齐泽克的言论隐含了他与（新）斯宾诺莎主义（以反俄狄浦斯的德勒兹的“欲望之流，这种无休止的生产运动……在所有否定性之前对生命的肯定性的主张为幌子）之间的对立。这是一种先于所有否定性的肯定性的生命主张，类似于巴鲁赫·斯宾诺莎的能动的自然，作为  $S$  的实体）和（新）黑格尔主义（以拉康的相互排斥的视差统一为幌子的类似于黑格尔的否定性，作为  $\$$  的实体）。齐泽克马上使用了批判性的手法，简而言之，他认为拉康的否定性（作为象征性的阉割、存在之缺失、对象  $a$  等等）是德勒兹肯定性的不被承认的可能性条件（与黑格尔的观点相呼应，即斯宾诺莎预先假定了斯宾诺莎，但他不愿意也不能够在他对实体的极端一元论中设定主体性），更重要的是，当齐泽克声称“德勒兹仍然在生成和（表象的）场景之间的典型的现代对立之中”，这暗指了更准确的指控，即从康德之后（再次）倒退到斯宾诺莎的可以说是知性-类的（或者，至少，不够辩证-思辨）的能动的自然（即，齐泽克的作为斯宾诺莎的实体存在的“生产”）和被动的自然（即齐泽克的作为斯宾诺莎的属性 and 模式的表象的“表象场景”）之间的二分法。

从齐泽克的黑格尔-拉康观点来看——特别是根据《少于无》和《绝对反冲》——德勒兹的新斯宾诺莎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有两个与黑格尔在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中所诊断的相同的缺点：第一，没有能力和/或拒绝询问和回答最终不可避免的问题，即存在的“一”（即实体）如何和为什么会产生表象的多（即属性和样态）；第二，一个不完备非绝对决定了它表面上（完全无限的）绝对的本体论——而这是由于对表象扣留了无条件的本体论的重量。齐泽克解决了德勒兹的第一个斯宾诺莎主义的缺陷，正如我刚才所强调的（正如黑格尔提出了斯宾诺莎同样预设了的主体性而没有提出那样），他提出了德勒兹自己预设但却避免提出的拉康式否定。齐泽克对德勒兹新斯宾诺莎主义的第二个缺陷的回应是，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已经研究过的，坚持认为任何绝对本体论都必须作为非附属现象承认和解释现象的怪异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齐泽克的拉康对德勒兹的作用就像齐泽克的黑格尔对康德的作用一样，即完全将结构和现象本体论化，否则这就会被视为本体论上的次要或无用的（“对拉康来说，表象绝不是一个以有限和扭曲的方式反映出生产过程的单纯的屏幕或场景”）。

然而，《绝对反冲》中稍早的一个时刻显示——尽管上面看到的表象与此相反——否定性的齐泽克假定德勒兹的新斯宾诺莎主义关于欲望机器的生产性、非领土化流动的肯定性的可

能性的否定的预设条件，而这并不属于拉康式的驱力与欲望之间的对立。相反，与《少于无》和《绝对反冲》中某些更加哲学化的抽象/推测时刻相一致的是，齐泽克思考着一个原始根据，一个最终的起源或源泉，从它那里产生了驱力和欲望之间的区分，他宣称：

与其将驱力所围绕的否定之空无定义为“纯粹”的死亡驱力，不如假设一种否定/不可能，它先于驱力与欲望之间的区分，并将驱力和欲望设想为应对这一本体论僵局的两种模式。

齐泽克的“本体论僵局”将是一个原始的“虚无（无-原质）”或“空无”，其是作为驱力、欲望及其差异的零级的无基础的基础。在其他时候，我曾对齐泽克著作中的这些时刻表达过批评性的保留意见（齐泽克在《绝对反冲》中也提到过这些），当时他看起来正沉溺于我所称的（套用威尔弗里德·塞拉斯的话）“非给定的神话”——即对漂浮在不可触及的时间之前的，以某种方式产生存在的生命的不可言说的否定性的那个“X”的理智直观——之中。现在，我觉得在前面所探讨的驱力和欲望的话题上，进一步强化和明确这些批评是适当的，也是重要的。

齐泽克正确地强调，谢林和黑格尔都离开了荷尔德林对费希特的准康德的主体主义先验观念论（即 1795 年《论一切哲学形式的可能性》中的批判）的新柏拉图主义和新斯宾诺莎主义特征。尽管这个荷尔德林帮助启发了后来谢林的客观观念论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这些观念论都留下了康德和费希特的主观观念论的痕迹。从《判断与存在》开始，荷尔德林在图宾根新教修道院的两位朋友认为他对康德和费希特的替代方案不令人满意，因为它重复了斯宾诺莎对实体如何以及为何表现出属性和样态（或正如《精神现象学》中的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成为主体”）的询问和回答的失败。也就是说，谢林和黑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这个最终不满是由于后者没有解释他的“存在”（类似于新柏拉图主义的“一”和斯宾诺莎主义的肯定性的“实体”）如何以及为什么在“判断”中并通过“判断”，作为对自己的判断（类似于新柏拉图主义的“多”和斯宾诺莎主义的属性和样态的否定性的“判断”和“判断”。直到并包括斯宾诺莎的（理智）直观的反身性、反思性的形而上学判断），将自己打成碎片。有趣的是，拉康也在一个场合默示，新柏拉图主义、斯宾诺莎主义和/或荷尔德林式的对弗洛伊德的“原初自恋”的描述（就像共生融合的力比多-情感的“失乐园”，“海洋的感觉”。在否定破坏这种假定的和谐并建立诸如内部与外部、我与非我、自我与他人的差异之前）作为本体论上个体发育的新生儿/婴儿期形成的基础（即，即主体性的出现），是不可理解，而且实际上似乎不可能的。齐泽克自己对（准）德勒兹式的“新唯物主义”的质疑有效地呼应黑格尔式、谢林式和拉康式的这些具体反对意见，反对这种对原始盈余的纯粹肯定性的诉求。

再来看看齐泽克在《绝对反冲》前一段引文中的思考，他关于一个单一的、唯一的原初-源头产生了驱力和欲望之间的反原子视差的假设，让我觉得有可能相当于无意中重新陷入荷尔德林的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宾诺莎主义——正如齐泽克自己正确强调的那样——黑格尔和谢林与之分裂。在这里，似乎某种（用谢林的措辞）“不可思考的存在”，即齐泽克的（少于）“无”的“本体论僵局”，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不可还原的和不可分析的起源统一体，驱力、欲望和其他一切存在都奇迹般地从这里产生。更准确地说，这有可能成为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宾诺莎主义，只是把能指从肯定性（“一”或实体的盈余）颠倒过来，变成否定性（“非一”的剩余或否定）。同样可以说，这是在弗洛伊德的确切的“否认”意义上的，在否定的标志下的新斯宾诺莎主义。因此，齐泽克的“少于无”最终也就不那么（完全）是黑格尔式的。

另一个不妥协和黑格尔主义替代方案也许是在齐泽克最近著作中的，其以驱力-欲望的区分作为焦点，我将用对这一区分的上述立足点，作为这一区分的无根基的根基，来取代齐泽克的原始空无。我对齐泽克所描述的驱力和欲望之间的趋同和分歧的另一种说明，调动了生物上证据，以便提供一个科学上兼容的、认识论上负责任的解释，说明这些趋同和分歧是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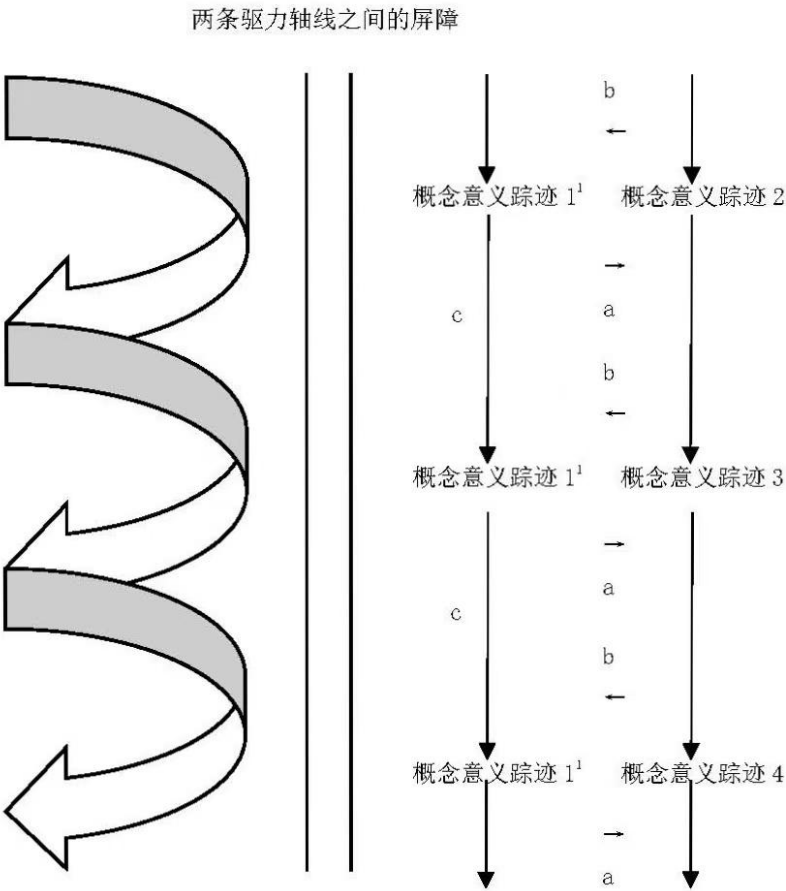
何从一个弱小的自然界的功​​能失调的、不可靠的、拼贴式的本能中演化出来的。而在这些本能的反转的事实中，只有一种软弱的本性。这不需要对无形的“无”的理智直观。无论我的这些思想实验在美学上的吸引力或投机性上有多大的欠缺，它们都以其合理性和可辩证性加以了弥补。

为了明确我的驱力理论的具体版本中所隐含的最大的本体论图景，在“起初”所能辨别的外部极限中，分散的自然——质的多元实在性的复数的肯定性是在这些众多被给予者内部和之间形成的任何和每一个否定性（作为“多”的被给予性）的最终事实基础。将这种原初事实性与先验唯物主义的“多即少”原则结合起来，根据这一原则，否定性是在肯定性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例如，在人类本能的神经进化中，驱力和/或欲望的否定性部分来自笨拙的大脑干和新皮层之间的对立和不相容）中产生的，人们有了一个完全非神秘的、彻底的后批判（而不是前批判）的基础来建立一个整合哲学、精神分析和科学的辩证-思辨理论大厦。齐泽克虽然在《少于无》中接受了“先验唯物主义”这个标签，但两年后在《绝对反冲》中却尖锐地拒绝了它。我很想说的是，在这本 2014 年的拒绝的书中，也出现了令人不安的立场，在修改后的术语的幌子下出现了类似于黑格尔所否定的新柏拉图主义、斯宾诺莎主义和荷尔德林浪漫主义的这些基础形而上学模式，尽管齐泽克自己也有这些失误，但他同样试图超越这些模式，这也许并不是完全巧合的事。因此，我最后提出了以下选择：要么先验唯物主义（其软弱性仅表现为物质的偶然性以及多即是少的辩证法），要么倒退到辩证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思辨的前面，进入前康德的黑夜。

- 1 迭代轴（S-P）
- 2 改变轴（A-O）
- 3 驱力轴线之间的屏障

迭代轴（S-P）

改变轴（A-O）



迭代轴（S-P）

弓形箭头的循环模式代表了驱力-原因和驱力-压力反复施加的“要求的（心理）工作”。准生理性的驱力-原因反复坚持去——弗洛伊德用他的能量模型所说的——“释放一定数量的兴奋”。

在驱力-原因那里，在目的和/或对象的层面上取得一定的满足是这



种释放的条件。（因此，迭代轴总是以改变轴为中介的。）

驱力-压力被包含在迭代轴的标题之下，因为它总是伴随着驱力-原因。特别是，当驱力-原因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令人不快的影响（疼痛和/或焦虑）的增加就是驱力坚持释放的“信号”。因此，在箭头的每个峰值（在此作为原因和压力的视觉表象）处，驱力-压力的化身（即否定性的影响）就是在运行中的。

此外，这个模型的周期性应该被用来描述这个驱力轴线的时间结构。尽管改变轴的驱力表象（或“能指”）不断遭受变动和修改，但迭代轴对这些变化毫不在意。它是心理生活的一个维度，它从不厌烦地要求“同一满足的永恒回归”。弗洛伊德用各种名称来称呼它——精力充沛的平衡原则、不可摧毁的婴儿期愿望、驱力的保守特性，以及最后，死亡驱力“恶魔般”的重复。

通过关注驱力的时间维度，关于驱力是否可以被同化为生物学的问题就变得次要甚至多余了。在讨论驱力-原因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驱力结构的这个方面导致它成为那些赞成通过精神分析寻求先天本能能量的人来的最佳候选。在弗洛伊德对驱力的元心理学阐述中，他故意让驱力的位置问题悬而未决。驱力是一个边界概念，它模棱两可地徘徊在躯体和心理之间。沿着时间线考察驱力，可以保留驱力的边缘性——这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应该被视为这个概念宝贵的独特性的一部分，而不是被视为一种有待纠正的犹豫不决——同时通过强调弗洛伊德本人基本忽略的问题（更具体地说，与时间和时间性有关的问题），从根本上重塑它。

### 改变轴（A-0）

在讨论这个轴线如何作为一个整体运作之前，有必要对图中这一部分的某些细节进行评论。首先，“概念意义踪迹”这个短语被选择来暂时涵盖广泛的精神分析概念——症状的踪迹、表象的驱力、词和/或物表象，以及拉康的（包括“一元特征”以及“文字”的）能指。事实上，拉康对“能指”的概括性使用——他对这一术语的理解包括了扩展了的范围，其远远超出语言学的限制领域——使能指最接近这里的“概念意义踪迹”所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说，任何心理元素——只要它的价值/意义是由它和其他元素之间的差异关系网络所决定的——它就是一个能指。“能指-性”是一个关系功能的问题，而不是依赖于这样被结构的元素本身是语言性的东西。例如，视觉记忆的踪迹是一个无意识的能指，因为它在心理经济中的意义取决于它与其他踪迹的互动关系。它不一定要是一个词（或词表象）才能以这种方式运作。（所有类型的心理材料中最能对能指的性质作出清楚说明的例子是在歇斯底里创伤的“延迟行动”以及屏幕记忆中所体现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时间辩证关系中所找到的。）在这里的这个驱力模型的具体情况下，作为能指的概念意义踪迹可以被理解为目的和对象所引导的表象（这些表象受到这种不同定义的元素의滑动和位移的影响）。

为了解释每个概念意义踪迹的编号（ $1^1-2$ ， $1^2-3$ ， $1^3-4\cdots$ ），由箭头

“a”、“b”和“c”所指定的互动需要阐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所倡导的一个最基本的论点是，过去的经验影响（而且往往过度决定）现在。在驱力的情况下，过去的对象会参与产生一个模板，它决定了随后的对象选择的过程。（弗洛伊德通常的例子是母亲形象对男性个体的成人关系的影响）。然而，通过其他各种现象——屏幕记忆、延迟行动、梦的运作中的日间残留，等等——弗洛伊德被迫承认现在对过去的影响。假设概念意义踪迹确实像能指一样，（除了拉康的解释之外，在弗洛伊德自己的许多概念中都可以看到）一个“点”的动态允许后来的材料改变过去的意义，而这正是所谓影响现在的背景。这样一来，尽管精神分析中经常有这样的简化，即现在完全由过去塑造，没有相互影响的可能性，但在过去和现在的概念意义踪迹之间存在一种不稳定的辩证张力。因此，箭头“a”代表过去的概念意义踪迹对现在的影响，而箭头“b”代表后来的踪迹对过去踪迹的回溯性改变。

箭头“c”表示原始的、过去的思想踪迹通过与新的踪迹的连续互动而发生的转变，它是在主体的生活历史中积累起来（弗洛伊德称之为“再转录”）的过程。在与概念意义踪迹 2 建立关系（ $a \rightarrow \leftarrow b$ ）时，概念意义踪迹 1<sup>1</sup>的心理价值/意义上发生了转变（ $\downarrow c$ ），成为概念意义踪迹 1<sup>2</sup>（概念意义踪迹 1<sup>0</sup>没有在图中描述，它将是不可恢复的弗洛伊德的“失落之物”和/或拉康的“原质”）。一个众所周知的分析概念可能会使这一点更加清晰。正如许多人（最明显的是拉康和拉普兰什）所强调的那样，创伤场景的记忆——其中最常见的是性创伤（如童年的诱惑）——是像“定时炸弹”一样的，这个场景包含了被处理的可能性。然而，记忆中的场景在其创伤的外表下是无法辨认的，直到第二个、后来的场景作为与原初的记忆有相似性关联的场景而出现的时候，只有到那时，通过在两个踪迹之间的回溯性运动，第一个场景才会成为被压抑的症状的核心。在这个象征词汇表中，非压抑的、创伤前的记忆踪迹（概念意义踪迹 1<sup>1</sup>），通过它与第二个场景的联系（它与概念意义踪迹 2 之间的  $a \rightarrow \leftarrow b$  的互动），变成了（c）被压抑的、创伤性的记忆（概念意义踪迹 1<sup>2</sup>，从 1<sup>1</sup>到 1<sup>2</sup>的变化代表了一个单一踪迹的象征性转化）。

最后，最右边的箭头（连接 2、3、4...）的垂直移动只是代表了时间的流逝，即在驱力的历史化、本体论进展过程中发生的连续的对象选择和目的抑制。与迭代轴不同的是——时间的流逝对他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考虑到驱力表象对修改的易感性，）改变轴是永久变化的场所。

### 驱力轴线之间的屏障

弗洛伊德理论的最终版本以将两种基本驱力——厄洛斯（生命驱力）和死亡驱力——的对立起来而告终。然而，在考察了驱力的基本元心理学结构的四个方面之后——据推测，生命和死亡驱力都符合这些作为驱力的定义标准——将驱力分为两个一般类别可能会被认为过于草率。特别是，对驱力的各个组成部分（原因、压力、目的和对象）的

时间组织进行探究，可以让人认识到驱力本身的元心理学结构中的一个更主要的内部冲突。

一方面，迭代轴忽略了时间上的推力。在它盲目地坚持重复原初的满足时，就会发生变化。（用拉康的说法，这条轴线不知疲倦地寻求不可能的、无法触及的、永远失落的原质）。然而，在另一方面，这种重复必然要通过的中介却总是—已经阻挠了纯粹的重复的可能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精神分析引入了一个与此相关的主体的理论。主体性不是“现成的”，而是从一个经验性的、结构化的环境中产生的。因此，正如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所说的，精神分析的主体是“在过程中”的。因此，由于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分界线是由遗传构建的，“同一”对象从未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被体验过。在对乳房满足的原始体验中——口欲期被它的第一个对象所开启——乳房可能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独特的对象与一个完全形成的、有分界线的自我相对立的意义上的对象来体验的。但是，“同样的”乳房，当通过一个经历了某些构成性转变的主体性经验框架（例如，镜像阶段）遇到“相同的乳房”的时候，它就不能很好地重新呈现为原初的、非对象性的乳房体验了。这种在同一对象的两种经验之间的暂时性损失（拉康的对象 a 所指定的损失）将被定位为改变轴的意指动态的内部不可避免的效果。因此，这条轴线禁止无中介地恢复迭代轴线所要求的原初失落之物。

在图中，尽管有条形的视觉位置，但迭代轴标题下的拱形箭头的每一个峰值都指定了驱力-原因与驱力-对象之于驱力表象的相遇点。每条弧线的峰顶与水平方向上的概念意义踪迹的结合，标志着 S-P 通过 A-O 实现释放的时刻。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每次 S-P 与一个驱动表象（意念轨迹）相遇时，这个表象都与前一个表象所不同（ $1^1$ ,  $1^2$ ,  $1^3$ ...）。因此，驱力轴线之间的屏障与其说是空间或地形上的分离，不如说是时间组织之间不可化约的差异，这种差异使这两条轴以不同的速度运行，彼此之间永远不同步。这种差异就是驱力的分裂。